

## 問題緣起

以這個題目作為論文主題，最初是以「文化生產」的實踐，包含文／藝創作、論述書寫等生產行為與行動者本身意志、與社會結構的分配涉入之間的對應關係。這個問題的起點在於將文化生產實踐本身視為並非止於個人化的行為，而是行動者對社會結構分配的回應。因此，本論文最一開始以「一個文化行動者進行各種生產實踐所需要的條件有哪些？」此問題作為起點發問。

作為提問，這個問題最雛形的觀察非常簡單，憑藉的是 90 年代「文藝青年」社群的觀察與討論，在過程中我發現即使是在十分靠近我們所處時代的「文藝青年」，要成為文化行動、生產者仍有著文化品味、教養的門檻。亦即，在不同的文化教養與社會位置條件下，「文藝青年」們所懷持的品味信仰也並不相同。這個觀察讓我進入對「文化生產場域」概念的探索。最後在時間範疇上選擇拉遠到戰後初期，則是出於對這個以中文為主的「文化生產場域」最一開始的雛形究竟為何的好奇與提問的必要性，而試圖捕捉這個場域最初始的面貌。

然而也因為此一提問拉遠到戰後初期，在研究過程中問題本身已經含匿在各種史料堆疊之中變得不再切身、甚至是高度距離化的，因此藉此機會特別提出來這個最原初的發問動機。

## 第一章、序論

本論文所關注的是 1945 年末至 1946 年底為止，在戰後台灣社會中的中文文化生產空間的生成及轉變。日本在五十年統治中，對台灣所施予的語言、文化同化政策與現代化建設，使得台灣成爲一個與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有著相當隔閡的社會。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轉爲由國民政府接收、統治，在這個政權轉換的過渡時期，不僅在社會中掌握政治權力的群體也隨之轉變，同時由於語言的改變，也使得文化合法性的正統典範也隨之改變。因此，在台灣社會中，戰後的轉變同時發生在政治場域與文化場域之中。也可以說，這兩個場域彼此相互作用、影響，轉化了日治時期已經成形的文化生產空間內的位置分佈，而生成戰後的文化空間。

本研究的提問核心在於戰後的文化場域的生成過程，特別是這個時期裡政治場域內部的變動對文化場域生成的影響。一方面我們希望耙梳原來在日治時期的政治場域中累積了資本的本土仕紳、知識份子社群，進入由不同政治權力支配的戰後社會時，所產生的位置變化；同時我們也針對戰後隨著政權變動而新加入台灣社會的大陸來台知識及官僚社群，如何在戰後初期至二二八事件前這段政治統治尚未穩定的時期裡，開始支配、佈局，佔據重要位置進行釐清與考察。更重要的是，這兩大集群在戰後初期的彼此遭遇，是如何在合作、碰撞、結盟、排擠等各種正反動態關係中，產生動力並進一步促成戰後新文化場域的生成。

在時間上，本研究鎖定以終戰的 1945 年八月開始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前爲止的時段作爲研究範疇。這段時期的台灣，以陳儀爲核心的行政長官公署作爲治理的代理機關，恰好呈現出過渡時期的轉折景象：在此之前，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以日治官僚與知識份子、以及具有日語能力的台灣知識份子、仕紳佔據著文化生產空間，而在此之後則因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而導致陳儀政府整體受到剷除，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社會景況。在終戰後到二二八事件前，台灣社會則難得出現在治理上相對鬆散而自由，並且因不同社群的群集而展現出蓬勃的文化生產動力，因此本研究

試圖透過戰後最初期這個時期的過渡、轉折為起點，探勘以中文為典範的文化生產空間是如何構建、生成並演化，以及它曾開展出什麼樣的可能性。

在本論文中所論述的「戰後台灣文化場域」，是受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生產場域概念所啟發。布迪厄的場域（field）理論是一套以「關係」來思考的觀點，場域的內部構成即是由不同位置所負載不同條件與資本等關係而形成網絡。一個「文化生產場域」，即是由文化生產者——包含生產者本身（如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生產機構（如出版商），與其他社會條件如政治權力的支配與其餘特殊資本（包括教育制度所生產的文化資本與資金、成本等經濟資本）累積與流動的作用，所形成的網絡空間；並且這網絡空間是一個充滿各種動力、其間交錯動態不會休止的鬥爭空間（Bourdieu, 1993: 30）在這套文化生產場域的概念中，布迪厄建立起包含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累積的相對關係、以及政治場域對文化生產場域的支配權力而生成的文化場域基模。而其中，政治權力作為一個支配動力，是布迪厄描繪場域早期所需的動力之一。在商業市場成為左右文化生產的重要動力之前，文化生產者多半依附握有政治權力者、或者間接握有政治權力的社群<sup>1</sup>，隨著政治權力鬥爭而分化。

由此，我們注意到在文化場域形成的初期，在文化生產尚未受到工業化帶來大量生產的商業化市場之影響前，政治權力是位於文化場域外部、由外介入文化生產的重要動力。根據布迪厄的理論視角，本研究試圖進入戰後初期文化場域的生成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角力關係。在討論此一關係前，必須先理解：一、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場域中，政治權力的主要來源為何？二、戰後初期的政治權力主要以哪些方式產生作用？三、在戰後初期台灣，政治權力的作用與文化場域的生成之間的關係為何？也就是說，在本研究中，我們注意到戰後初期的台灣，由於日治政權的退出與國民政府政權的進入而造成的政治變動，不僅改變了政治權力的組成，同時也改變了文化場域生成的作用力。透過討論政治權力的變動與其對文化生產所產生的作

---

<sup>1</sup> 此處所說的是布迪厄對法國十九世紀前半葉的沙龍的看法。他認為在十九世紀前半，沙龍是作為政治場中間人、負擔政治場域控制文化生產者的角色。其間由於政治鬥爭的對立，而使依附沙龍中的文藝人士，藉由政治鬥爭排及而亦形成派系分化（Bourdieu, 1996: 51-53）。

用，我們試圖描繪出在如是變動之下，戰後初期脫離日治政權後的台灣，在政治權力轉移與文化及語言支配典範論述的轉變下，是否形成了專屬於中文的、具有其自主性的文化生產場域。

一般而言，對於戰後台灣文化發展的主要關注都在政權轉移，亦即「光復」或「回歸」的脈絡所導致的變動。此一政權轉移的過程包含了原來台灣社會內部自日治時期留下的文化／政治中間群體、以及新進入台灣社會的大陸文化／政治群體，都透過政治、社會地位上的位移展開各式資本的競逐。戰後初期這段時間的台灣文化場域，在徐秀慧看來，有著依循兩種不同文化典範所生成的文化資本在其中流通，並以此進行文化、論述支配權的再生產，以佔據或者競逐場域中更具支配性的位置。這兩種文化典範分別是台灣本地在原有日治時期的文化運動中逐漸分裂、左右派鬥爭而產生的政治與日治教育下的文化資本，另一則是以大陸五四白話文運動脈絡為主的文化資本與國民政府內部派系的政治鬥爭。（徐秀慧，2007：27）

但若以文化場域生成的介入動力——即除了文化資本的生產與累積之外，經濟資本與政治場域對文化生成的影響來檢視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則首先必須注意到由於戰爭而導致經濟資源匱乏與社會普遍貧窮的情況，使得此一時期經濟資本特別集中在握有政治資源者之手中之情況為背景。這裡所指的政治資源並非僅只是以官銜的形式出現，而亦可能是在意識型態上的接近或者社會關係上的親近，本研究將此一政治資源的持有稱為「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其範疇包括具體地持有官銜、與持有官銜者在社會關係上的親近，以及對於官方意識型態的高度認同與支持。由此，我們得以更進一步地理解到，此一時期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之間的高度依附關係，使得政治資本具有可兌換性、並相對於經濟資本更具影響力。

因此在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場域的分析中，與其延續布迪厄的研究本身著重分析經濟資本作用的作法，不如轉而分析此一時期政治資本的兌換方式與流通，試圖修正布迪厄的研究取徑來提高其對戰後台灣社會的解釋效力與對話性。特別在戰後初期的台灣，這個在經濟系統與市場規模上都尚不足以詮釋文化生產的社會中，政治資本如何主導、創造出當時文化生產的信仰價值，以及創造引發競逐的資本流

動，是本研究試圖透過與布迪厄對話的重點。這個作法拆解文化生產的結構性條件，進而使場域理論得以更有彈性地與不同經濟、政治條件下的社會對話，而非僅止於針對大量生產、具有商業化市場的工業化社會具有解釋力。

並且同時，此一方法也試圖進入台灣文學討論中「政治」條件的曖昧性，闡明政治主導的時期中所生產出來的文化信仰與價值並非全然只爲了服務政治權力，而是在生產空間中仍然有夾縫似的空間，促使文化人與政治權力者互動、創造出彼此的信仰競逐遊戲，甚至仍然可能擁有其自主性的生產。

也就是說，在本研究中，試圖將「政權轉移」或者「光復」、「回歸」等脈絡視爲政治場域的變動；並在此一劇烈變動中，先前已退敗政權所持有的政治資本大量貶值、而新政權的進入則帶來新的政治資本投入戰後台灣的社會場域。本研究的主要問題即是，這些政治資本的角力如何作用在文化生產的機構與生產者身上？文化生產的實踐是否能夠抗拒政治資本施加的支配、而生成具有自主法則的文化生產場域？

而欲探究戰後初期的文化場域內部的生產實踐，就不能不注意到戰後初期百花齊放的報紙與刊物創辦現象，也必須進而界定報紙刊物的文藝生產意義。以下將以兩個小節來說明：第一節將透過「文藝生產空間」的脈絡化來定義研究資料、確立研究對象並進行文獻探討，第二小節則以描繪活躍在文藝生產空間中的社群與集團來素描此一時期的空間中所流通之政治、文化資本的大致輪廓。

### **第一節、研究方法：「文化生產空間」的脈絡化**

在本研究對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實踐的討論中，爲何選擇報／刊來作爲研究的主要素材？其作爲文化生產實踐具有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分別爲何？另外，透過報／刊所建立起來的文藝空間在文化生產場域的視角中又該如何進行解讀？以下將分別以兩個次小節來進行本研究所使用研究資料的定義，以及文獻回顧。

## 1.1 定義研究資料

本論文所使用的主要素材，是以 1945 年戰爭結束後、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不到兩年的時期中，蓬勃創辦、發展的各種報紙刊物為主。報紙刊物在這段短暫時期中的萌發所綻放的活力<sup>2</sup>，一直都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學者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而這股活力同時也是本研究所欲捕捉、在文化生產實踐上的重要動力。尤其是其動力來源組成，以及政治資本在這股動力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受到本研究的關注。

在具體數量上來說，這一時期所發刊的報／刊究竟有多少？則根據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所出版《台灣一年來之宣傳》中的卅五年份十一月為止的〈台灣省新聞紙雜誌調查表〉，包含當時正在發行、已辦理登記手續即將發行、已登記發行但因故停刊等，共有九十九個報紙與雜誌<sup>3</sup>。這些雜誌包括有每日出刊的報紙、三日刊、五日刊、週刊、旬刊、半月刊等，在內容上也包括一般報紙，宣傳畫報類、文化雜誌、政經議題雜誌，但同時也包括特定主題的雜誌如《台灣金融經濟月刊》、《台灣國醫藥報》、《原子能週報》這類以專門領域知識為主的刊物。而本研究則在這些刊物中，以「社會政經、文化論述」相關、且具有重要性的報紙刊物為縮限，並以「報／刊」同時含括報紙與期刊兩種範疇，作為進以聚焦、描繪、定義文化生產空間的各項條件的材料。

報／刊之所以得以作為定義文化生產空間條件之素材，主要是由於其作為一個「書寫、論述」生產的物質空間，包含了生產者（發行人、編輯、供稿者）與生產成本（資金）的累積與堆聚產製出產品，以及作為產品的再生產——即文藝作品與文

<sup>2</sup> 對於這段時間的辦報／刊狂潮的描述，有陳國祥、祝萍在戰後報業發展研究中提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到九月半年間，「僅台北一地就有十家報紙創刊，其他縣市也有五家報紙相繼創立」，但也提到亦有僅維持一年半載就宣告關門的報社。（陳國祥、祝萍，1987：28）葉芸芸則就雜誌的部分提到，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以後，至一九四六年春天、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台灣已有八十種左右的報紙雜誌，其中有正在出刊的，少數出刊後又停刊的，也有辦妥登記尚未出刊的，更有出刊而為得合法登記的。」（葉芸芸，2006：44-45）陳俊彬則提到這樣的風潮展現了「台灣民眾對戰後新時代充滿期待與歡欣」（陳俊彬，2007：24），而陳國祥、祝萍也提到這段時期的辦報熱潮，是由於「政府對報業採取『創刊不需許可、言論不受檢查』的制度亦廢止了新聞許可檢閱制度，言論自由受到充分保障」所致。（陳國祥、祝萍，1987：27）

<sup>3</sup> 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台灣一年來之宣傳》，台北：行政長官公署，1946，頁 25。

化論述的生產，及其後續在文化圈中引發討論、回應的再生產等環節，構成了完整的生產線。並且，報刊透過紙面展示出來的「書寫、論述空間」，會投射出現實社會中這些生產者的社會關係：包括在意識型態上的結盟、敵對，文藝流派上的爭鬥，以及來自不同政經關係的網絡。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是欲透過進入報／刊的紙頁空間，進而探討其論述實踐所投射出的生產者社會空間，分析其中流動的各種實質與抽象資本分配。本論文的主旨，不僅將創／辦報刊視為一種文化實踐，同時也將文化生產空間與其中活動的生產者群聚結構加以脈絡化，並以此檢視戰後初期文藝生產空間的轉變。並且，在描繪這個空間生產條件與人事轉變的同時，亦關注其間生成的蓬勃文化活動力如何與紊亂、高度鬥爭的政治環境互動；最後，在當時困窘的戰後經濟蕭條處境下，台灣文化空間是否曾經形成以中文作為語言主軸的自主性文化生產空間，則為本研究欲探問的主要問題。

對本研究所使用報／刊資料的探討，主要在於建立作家之間的人際關係與社會交遊網絡，並以文化社會學的取徑探問此一社會空間中各種動力的角力關係，因而將本論文定位為初探性研究，試圖描繪、展開戰後初期場域空間的論述地景，標記不同社群之間的流動與實踐角力。就此前提，儘管報／刊的文化生產空間也包含書寫文本內容，不過由於時間與學識能力的限制，本研究無法進入處理細部的報／刊內部文本分析，留待未來有機會再進行，而在本研究中全力鋪展出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地圖。另一方面，在資料使用上，包括自傳、傳記、口述記錄等，由於其關注到作家或書寫者個人的社會環境及人際交往，則將特別著重其文本內部的描述。

### 資料的範圍

本研究在鎖定研究資料範疇時，首先援引以目前現有其他研究者或者機構，已整理出來的幾種戰後初期文藝或者文化雜誌目錄的版本做為參考：其中，較為完整者有陳建忠、沈芳序所編寫、刊載於《文訊雜誌》第二一三期的〈台灣新文學雜誌

年表初編)<sup>4</sup>、2007 年於國家圖書館所辦之「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945—1987)」提供的展覽目錄<sup>5</sup>，以及葉芸芸所寫、收錄於《餘生猶懷一寸心》中〈試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知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一文裡提，以「從史坦福、耶魯、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等幾家大學和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數位前輩的私人收藏中發現，1945 至 1949 年間，台灣出版的期刊雜誌有四十三種(日報十五種，週刊和月刊二十八種)」(葉芸芸，2006：45-49)此段描述所整理出來的列表。

上述列表彼此間皆互有補述，難以說明何者為「最」完整者，因此本研究以上述幾份雜誌目錄相互補充，分別擷取本研究所欲關注的 1945 年至 1947 年的部分，製成賴以蒐集的刊物目錄(請見【附錄一】)。並輔以 1949 年十月出版、台北報業工會印行的《台北報業一覽》以及祝萍、陳國祥所著、於 1987 年出版的《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兩本書籍，補充 1945 年至 1948 年底全台各地所發行的報紙部分，以建立對本論文所欲分析戰後初期熱絡報／刊生產的初步掌握。

## 性質

本研究欲進行分析的範疇是「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場域」，因此資料素材是以戰後初期的文藝／文化類型雜誌為主。然而在當時主管機關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新聞紙雜誌一覽表中，未有雜誌分類的項目，並且所謂的「文藝」與「文化」的分類範疇亦很模糊：以 1945 年廿月廿五日、光復不久即由陳逸松等人所出刊的民間報／刊《政經報》為例，其內容雖以政治經濟問題的深度論述，但亦有賴和〈獄中日記〉遺稿、以及呂赫若的首篇中文小說〈故鄉的戰事〉等文藝作品。此一現象所展現的其實正是戰後初期當時的文藝生產狀況，即在當時文藝與文化生產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下，活躍於兩個場域中的生產者與生產條件彼此緊密關連，以致其間界限尚難清楚明劃。

<sup>4</sup> 陳建忠、沈芳序，〈台灣文學雜誌年表初編〉，《文訊》第 213 期，台北：文訊雜誌社，2003 年 7 月。

<sup>5</sup> 展覽期為 2007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10 日，展場位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一樓。

因此，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並不欲拘泥於究竟是以「文藝」雜誌或者「文化」雜誌為主，以及所討論的生產空間是以「文藝生產空間」或者「文化生產空間」為主的問題，而是認定只要是以「文化人士」作為主體成立的刊物，或是以文化論述、文藝論述／創作，以及與文化生產相關的各種社會條件論述<sup>6</sup>為內容的報／刊，都希望能夠囊括在本研究針對「文化生產」的論述範疇之中。

### 研究對象及其素描

根據前兩項條件，在本研究鎖定的 1945 年光復之後、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這段時間裡，所能含括之報／刊十分豐富且數量龐大。然而由於當時刊物留存齊整不全、以及本研究人力所限，無法一一檢視、討論的情況下，哪些報／刊是本研究真正進入閱讀、討論以及援引來分析當時文化生產空間的研究對象？

首先，在資料的取舍中，「是否尚有現存覆刻本」為第一要件。因此筆者以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國立台中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圖書館等五地館藏及微縮片資料為主，根據【附錄一】所列之刊物目錄，盡可能蒐齊完整期數。下表即為本研究閱讀、分析的期刊列表（表一）。

【表一】

刊名	創刊時間
政經報	1945.10.25
前鋒	1945.10.25
新青年	1945.10
新新週刊	1945.11.20
新風	1945.11

<sup>6</sup> 這部分包含對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批判討論、語言政策的爭議等涉及文化生產的條件論述。

台灣青年	1945.11.12
大同	1945.11
現代週刊	1945.12.10
新台灣畫報	1946.1.31
海疆	1946.2
新台灣	1946.2
台灣訓練半月刊	1946.3
正氣半月刊	1946.4
日月潭週報	1946.4
台灣之聲	1946.6
台灣評論	1946.7
新知識	1946.8
圖書月刊	1946.8
台灣文化	1946.9
正氣月刊	1946.10
台灣學生	1946.11
台灣月刊	1946.10

內外要聞	1946.11
文化交流	1947.1

另一方面，除卻定期發刊的雜誌類之外，每日發行的報紙同樣作為當時文化生產空間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活力。然而日刊報紙在數量上的龐大對研究進行造成了困難，因此在資料選擇上必須對報紙進行取舍。其中，《民報》與《人民導報》在光復初期 1945 年底發刊、而在二二八事件被勒令停刊，不僅在時間上恰好落定於本研究鎖定的時間範疇中，同時相對於《新生報》作為官方報紙，《民報》與《人民導報》作為民間發刊報紙，在生產條件上更能展現文化自主性的活力，因而在報／刊的報紙部分，本研究以目前所能蒐集到的《民報》與《人民導報》為主要素材。

在實際資料蒐集上，《民報》目前所能蒐集到的資料是以 1945 年十月十一日、即發刊隔日開始，至 1947 年二月二十八日為止，包含 1946 年六月一日開始、至同年九月卅日的晚刊部分。《人民導報》則是由 1946 年一月一日創刊開始、至 1946 年六月三十日為止；1946 年的後半年部分則尋無館藏。

### 限制

以本研究的研究取徑而言，資料本身能蒐集的範疇即定義並限制了本研究能論述的範圍。而檢視本研究的主要提問，由於探問的是文化空間中的生產者所形構的縱向與橫向社會網絡，資料指向應涵蓋更廣泛的面向，除了釐清所有報／刊的生產脈絡以及資本流動分配外，生產者的個人史脈絡同樣是需要納入檢視的環節：亦即，包含家譜、書信等資料都應該納入作為研究資料之一。而在生產結構的面向上，除報／刊的生產之外，書籍的出版著作亦是文化生產的重要空間，然而這些部份皆限於人力與研究能力而不得不割捨。

另外，戰後官方資料的闕漏與刊物保存不全同樣是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所遇之重要困難。根據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所公告之政令，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前所發行之新聞紙或雜誌均應向發行所在地之地方主

管官署聲請登記，而廿五日後發行的新聞紙或雜誌則須向地方主管官署辦理登記始得發行；且登記聲請書中應載明包括雜誌名稱、社務組織、資本數目及經濟狀況、發行人及編輯人之姓名、年齡、經歷及住所。<sup>7</sup>並且此份聲請書將由地方主管官署轉請內政部發與登記證，並同時抄送中央宣傳部登記。因此，官方資料中應留存有自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前後登記發刊的新聞紙與雜誌之詳列表，並內容將包含發行人、編輯人之經歷、社務組織與資本數目。此一資訊若仍留存，將能完整呈現本研究所欲描繪的報／刊生產空間面貌。然而筆者曾去電行政院新聞局詢問是否仍有此份資料，則得知「可能已經被銷毀」。官方檔案資料的保存不全一直是戰後初期研究的主要困難，並也限制了研究者僅能從私人保存資料或者有限的資料中進行追溯，在資料論述的範疇上便不免有所偏頗。

由以上幾點，可以歸納出本研究所的主要研究素材，是包含了【表一】所詳列的刊物，以及 1945 年十月十一日開始、到 1947 年二月二十八日為止的《民報》日刊，1946 年六月一日開始至同年九月卅日的《民報》晚刊，以及 1946 年一月一日至 1946 年六月卅日止的《人民導報》。本研究將於下一節進一步闡述以這個報紙文本為空間，其中活躍的各種群體、人物以及其各自扮演的角色。

## 1.2 研究架構及理論

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P. Bourdieu）曾對文化生產與社會分化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寫就《藝術的法則》、《文化生產的場域》等書，將社會內部各種不同資本累積空間化，討論文化生產與政治、社會階層所據有的資本類型之間的分化關係。而前述學者徐秀慧的論著《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一書，即使援引布迪厄此一討論觀點，對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生產狀態——特別是台灣左傾知識份子在行政長官公署的管理之下的報刊生產進行分析。此一分析將複雜錯綜的戰後初期台灣文化生產空間化，藉由左傾知識份子與行政長官公署之間的微妙距離，描繪了當時台灣主要的知識份子與政治場域之間透過遠近而展開的文化生

<sup>7</sup>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三十四年第一季第六期，附錄類公告，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產空間。然而徐秀慧的嘗試也揭露了布迪厄理論對台灣戰後初期的不完全適用，間接地展現了台灣戰後初期文化場域的特殊狀態。

布迪厄在對文化生產場域的主要論述，是著眼於文化生產場域在整個社會空間中的結構位置與作用。他將社會空間視為一個場域（field），也就是一個以相對關係構成的空間；若行動者在場域中佔有位置，那麼此一位置是透過與其他位置相對定義而來。因此，場域是一個關係結構的空間，並且在這結構中存在著各種力量與不對等關係，而這一不均衡的內在也形成場域內部的動力。（Bourdieu，1996：231；布迪厄、華康德，2008：163）

若以文化生產場域來看，在文化生產內部以及外部——也就是除生產活動本身之外、決定文化生產的外部條件，都有著不同類型的資本分配關係決定著文化生產的位置與結構。文化生產場域作為一個社會關係的空間，它被包含在權力場域之中，屬於社會結構裡頭的支配端（dominant position），擁有社會各種資本總額較高的支配位置。然而在位於社會的支配端中，文化生產場域並非是全然掌握權力者。它在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與文化資本之間拉扯，也就是受到所謂的市場空間所決定。在布迪厄所論述描繪的文化生產場域裡面，另外存在著存在著自主法則與他律法則的運作；也就是，越受到經濟資本支配的文化生產，則趨向於以他律法則運作，追求經濟資本的再生產；而反之以文化資本為其支配的文化生產，則無須受到經濟資本的支配，而以文化資本作為再生產的目標者，則是以文化自主法則為其運作原則。布迪厄認為，文化生產空間中若分化出這兩種不同的原則，則會在文化生產空間裡區分出來兩種不同的市場空間，即是大量生產（large-scale production）與限量生產（restricted production）兩個次場域。

兩個市場空間的存在，說明文化生產場域並存的兩種經濟形態，一種是回應大眾市場需求的一般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以「大眾」（wide audience）為觀眾；另外一種則回應同儕需求的經濟模式，它與大量生產的市場相反，以其他的文化生產者為觀眾，回應的市場需求是美學的需求。布迪厄認為，正是在大量生產、限量生產兩種生產模式中，「再生產出了有限生產場域的根基。」（Bourdieu，1993：121、142）也就是說，一個具有自主法則的「文化場域」，是在有限生產模

式下，以其他文化生產者為需求對象，並且由已經掌握文化合法性的權威者來決定場域資源分配的條件下所生產出來，因此有其獨立於權力及經濟主導的法則。也因此，「文化生產者們越能構成一個競逐化合法性的封閉場域（closed field），則場域內部的分化便越不能簡化為被單一外部的經濟、政治或社會差異的因素所決定。」（Bourdieu，1993：115）

在此，布迪厄在此所言的「封閉」指的便是相對於文化生產場域內部相對於追求「大眾式成功」——也就是俗稱「暢銷」，反向追求由文化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團體所構成的認可，所構成的自主性法則。這種封閉，一方面透過縮小握有評論價值權的群體，而使得「價值」因有限掌握而凸顯其獨特性，提高擁有評價權者的象徵價值；另一方面縮限於文化生產者社群的合法性，確保了外部因素對文化生產場域介入影響程度的有限。

透過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域討論可以發現，若我們欲進而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進行描繪，則必須要掌握生產者的生產位置、生產者歷時的位置軌跡，以及共時地觀察其所匯聚的雜誌、沙龍、群體，還有與其對立的群體。而在戰後初期這段時間裡，台灣社會百花齊放的雜誌刊物創立、發行以及參與其中的文化人士則得以作為文化生產空間裡最主要的觀察對象，特別是這些刊物在大陸／本省、台灣本地左派青年／本地仕紳、以及官方／民間等幾條相對軸線上展現出來的樣貌，是描繪戰後初期文化生產場域的重要線索。而以此一觀點所描繪出來的戰後初期這段時間的複雜性，或許能對統治／被統治等官方文化體制以及文化霸權觀點所描繪出來的戰後初期的文化版圖，提供不同的觀點與視野。

然而必須注意到的是，在布迪厄對文化生產場域的論述中，首先「閱讀市場」即為一重要關鍵。由於他所論述的法國社會與其文化生產狀況是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也就是社會開始進入工業化的大量生產市場階段，因此大量生產市場與有限生產市場的分化已經存在。然而在百廢蕭條的戰後初期台灣社會，這樣的生產模式分化似乎尚不明顯，同時也缺乏完整的出版、發行數字等市場證據來瞭解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閱讀市場結構，也無法確定是否已經出現所謂的「大眾」——特別是

透過布迪厄所闡釋的法國社會結構中的「大眾」<sup>8</sup>。然而也正是因為對照布迪厄所描繪工業革命發展以後的法國社會，本研究試圖更為具體而明確地描繪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狀態。

其中，在文化生產場域的基本設定上，本研究試圖為戰後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而對布迪厄的設定所進行的修改是將「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放入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重要支配資本類型之一。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中，由於社會因戰爭而貧困，因此在權力場域中，除經濟資本作為文化生產活動的重要支配資本外，政治資本也是在當時台灣社會中佔有支配位置的重要資本類型。這一方面是出於國民政府對戰後初期台灣的基本目標是以「文化重建／重編」為主，而這個文化重建工作的主導，在政策面由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以及台灣省編譯館三個官方機關單位為主要核心(黃英哲，2007：81)，因此所謂的「官方」所持有並代表的政治資本，便成為在文化場域中具有左右存亡的支配力。同時另一方面，儘管這個文化重建、整編的過程中由所謂的「官方」主導，但在這個「官方」內部，則存在試圖透過文化場域的資源爭奪與瓜分來進行的派系鬥爭及勢力競逐；這些官方派系進而個別拉攏在地的文化人，也使得原來台灣本地自日治時期以降的文化人士在此一時期與不同的官方派系合作結盟，以在獲得文化生產的合法性與分配資源。(徐秀慧，2007：129，147-150)因此，對台灣本地的知識份子與文化生產者而言，「與官方相關、甚至受到官方承認」所代表的政治資本，也成為他們在當時所必須持有的重要資本之一。

同時政治資本的有效性，也就是其與象徵資本之間的兌換，也會隨著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結果而有所變動。陳翠蓮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中便描述了中國國民黨自 193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國民黨內部包括中統派、軍統派、三青團、政學系、孔宋集團等各派系的生成，以及其在接

---

<sup>8</sup> 在此，本研究意圖強調的是，戰後初期儘管百廢待舉，但是有書籍報刊流通，即存在著「閱讀市場」。然而在布迪厄意義中的「讀書市場」，是一個已經存在大眾市場與相對的小眾——及有限市場的分化所產生出來的，具有高度區分(distinct)性格的市場。戰後初期是否存在著這樣的「閱讀大眾」與「閱讀市場」，由於無法尋得當時官方所登記的各報刊發行數字，因此無法直接

收台灣的工作中所進行的勢力爭奪，還有與「半山」、台灣本地菁英之間的連繫關係。她認為「派系鬥爭是復歸祖國之後帶來的主要政治次文化之一，它嚴重地衝擊著並改變著台灣原有的政治面貌」，並且提出「派系鬥爭縱使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但其所形塑出的具有潛在尖銳衝突性質的政治環境，卻是危機事件爆發之後不易迅速彌平的負面因子。」（陳翠蓮，1995：211）陳翠蓮對國民黨內部派系的討論是針對其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作為一個影響的因素，以及派系透過接收工作進入台灣後，在二二八前後的鬥爭情形。本研究試圖透過陳翠蓮的派系研究，所欲捕捉的是這些派系與文化生產工作之間的關係，以及其所建構出來的一個複雜的權力鬥爭網絡中，如何左右文化重建的政策、支配了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

徐秀慧在援引布迪厄文化場域理論時，也提及布迪厄的理論無法完全相應於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環境；特別是在文學市場的消費機制尚未形成、以及國家機器暴利介入而無法使文藝實踐進而發展成熟等（徐秀慧，2007：33）。然而，她所欲與布迪厄對話的部分，是著眼於戰後初期台灣場域內部的文化資本的再生產與轉化，一方面除了包括台灣本地文化人對日治時期三○年代的「新文學」遺產的繼承，另一方面也涉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主導的文化重編工作裡所帶來的五四遺緒；最終這兩者在「魯迅」這個文化象徵上開啓了對話的平台，而使「魯迅思想」成為文化資本再生產的基礎。由於著眼於「日治時期新文學遺產」以及「五四」兩種文化資本，徐秀慧所描繪的戰後初期文化場域，是以「官方文化重編」與「文化人的民主抗爭」兩種視角展開（徐秀慧，2007：107），也因此僅是略微觸及派系鬥爭的問題。

而之於本研究所更為在意的是，在戰後初期大陸文化人士與台灣本地知識菁英的大量交流中，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與台灣本地知識菁英與仕紳之間是呈現什麼樣的關係？而這對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生產場域又作用了什麼樣的影響？也就是，在本研究中，更為在意在文化生產場域內部存在著「政治資本」的流動；並且認為，在討論「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內部究竟是否存在自主性文化場域？」

---

地解讀出戰後初期的閱讀市場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市場。也因此，「戰後初期的閱讀市場面貌為

這問題之前，必須先理解作用在戰後初期文化生產場域的權力場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對文化生產進行支配，而後才能進一步討論透過對這個支配力量的屈從或反抗，來理解在戰後初期文化場域中的他律原則與自主原則的運作，進而才能確定在戰後初期的這個文化生產場域中，是否存在著自主性文化生產。

### 1.3 相關文獻探討

那麼報／刊文本在戰後初期的文化空間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作為一個匯聚、累積生產者、資本、生產物以及再生產的空間，本研究所鎖定的這些報刊是如何參與在這些生產環節之中，並且其參與的作用與意義又該如何以文化生產場域的角度來詮釋？本小節透過與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對話，針對現有戰後初期報刊研究進行整理與討論，並將報／刊素材進而脈絡化。

論述戰後文化政策、思潮以及報刊發行的研究不在少數，然而在本研究中，特別關注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與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以及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等分別對戰後初期報／刊在文化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的分析：同樣在「政權／文化主權轉移」的前提下，黃英哲提出了報／刊作為國府官方文化整編的平台工具與手段，徐秀慧論述在官方進行文化整編的過程中，報／刊如何成為非官方的台灣文化人在有限生產條件下的挪用空間與根據地，繼而進行台灣文化主體性建立的工作。陳建忠的則直接透過日治與台灣兩個時期在文化生產場域的「接軌」上，更進一步地環繞「文化領導權」描述場域的變更與演化。

黃英哲認為在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透過官方機構與政策部署了以「民族主義」為主的文化重建工作，此一工作是相對於日本「皇民化」運動的中國化運動（黃英哲，2007：37），並且分別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以及台灣編譯館三個機構針對國語政策、政治宣傳與教育政策等三方面進行政策施行。然而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是以官方意識形態作為主導訴求的文化整編，卻是

---

何？」轉而成為本研究所欲探求的問題之一。

以官方政策為表象、而實質以主事者的文人思想為內裡來作為文化整編的調性。也就是說，從黃英哲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窺見在「官方」這個頭銜底下鬆動的環扣：在「官方」內部對於所謂的「民族主義」或者「中國化」的詮釋並非固著而一致，民國初年五四思潮以來的左右翼分裂使得來台接收的「官方」無論在文化、政治觀點上都成為一個複雜的組成。

而相對於「官方」組成結構的鬆動，徐秀慧則論述出相對於國府官方、另一個「台灣在地文化圈」複雜成份。她從民族認同的角度出發，認為在這段過渡時期接收政府的「中國化」過程中，台灣在地文化圈與國民政府的政策並非完全同調，而是在中國化的文化重建政策前提下，同時極度關注台灣的特殊性與主體建立。並且，在國民政府以官方機構與政策建立中國化重建陣線時，台灣在地文化圈知識份子儘管作為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投入於其中，作為國民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橋接，但同時也透過這個雙面身分挪置了官方資源與空間。她認為，台灣在地文化圈的知識份子利用了在日本時期累積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以社會的意見領袖姿態進入了新政權橋接在地社會的政治版圖中；而大陸來台的文化知識份子則以五四以來所累積的文化資本，使得兩種文化脈絡的資本在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中交織並且彼此互動、作用。（徐秀慧，2007：23-27）

而陳建忠在耙梳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文學場域構築時，同樣發現到戰後初期文學場域的「再構築」現象：亦即一方面日本文學隨著失去統治權及其依附的國家機器而失去了場域的主導權與影響力，但卻仍然透過文化資本與教育資本的留殘而作用於文化生產場域；另一方面中國來台的文化人士則伴隨著新的國家機器而建立新的文化主導權。（陳建忠，2007：174）亦即，在過渡時期中，治理官僚與國家機器成為文化生產不可或缺的實踐環節。黃英哲與徐秀慧個別著眼在戰後初期不同的社會場域；前者以文化政策的施行與政策實踐的行動者為主，後者則是關注在地社會的行動者如何回應這些政策實踐、如何在這些民族主義的意識綱領下挪取來再生產出台灣主體性論述的文化實踐作為。然而這兩者論述之中有著非常相似的看法。

首先：戰後初期台灣「回歸」的「中國化」運動之中其實含帶極為複雜的作用。黃英哲認為戰後台灣文化重建，以官方機構為起點，連結本地社會的知識份子與仕紳階級，建構出了「由外而內」並且「由上而下」的重建工程。（黃英哲，2007：220）而徐秀慧則認為這段時期台灣在地的知識份子中握有日治時期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本地仕紳及知識份子，以及秉持五四思潮中的左傾知識份子集結、交流、結盟、互動，構成了一個結合了政治論述的複雜文化論述場域。也就是說，無論是從接收政府的官方層面、或者從在地知識份子的實踐行動來看，戰後初期的文化場域是一個無法脫離政治論述的空間，甚至可以說，戰後的文化場域是一個從政治論述的挪用與再生產中所生發出來的空間。在這裡的政治論述包含了政策／政治宣傳、左翼／右翼論述，民族主義的國族意識形態與民主政治論述等。因此在論述戰後初期文化實踐與知識份子行動的過程中，政治論述在其中的作用與影響是在論述過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元素。而這陳建忠所關注於戰後初期這段時間的文化「再構築」同樣證成此一觀點，即治理機構與環繞於其邊的群體所擁有的政治資本流動於場域之中，影響著文化場域的形整與生成，連帶地影響著行動者的動向與社群聚組的版圖。

再者是報／刊在此一時期文化整篇、重建過程中的重要性。無論是從官方「上而下」的文化意識形態主導，或者是台灣在地文化圈的內部集結、分割等動態，報／刊都作為現實空間中的另一生產空間，具體地凝聚了人員與資源。黃英哲論述中將《台灣文化》視為在官方主導文化事務的大陸來台官僚／文人與台灣本地左傾知識份子、仕紳階級之間交流結盟的平台；而徐秀慧則強調了左翼文化人創辦的刊物包括《民報》、《人民導報》，《一陽週報》、《政經報》、《台灣評論》等以左翼文化論述為主軸的刊物。

無論是以官方「上而下」或者由在地「下而上」的兩種傾向的文化刊物來看，兩種方向的雜誌刊物都為當時的文化論述提供了發表、開展的平台，不過左派傾向的刊物所維持的時間多半很短暫，其中流動的主導人物卻有高度的集中傾向，也就是同一批人力以前仆後繼創辦新刊物的方式展現了文化團體的活動力。相對來說，

具有官方身分的刊物多半在時間上維持較為長久，如《台灣文化》或者《現代週刊》等。在這樣的現象之中，我們可以提出兩個關於雜誌作為文化實踐空間的問題。第一，左派傾向的雜誌刊物看似創辦時間短暫，但是卻有著前仆後繼的活力，維繫這個活力生產的源頭為何？第二，官方刊物在時間上維持相對長久，其中活躍其中的台灣文化人或者左翼文化人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亦即，不同於黃、徐的研究取徑之處，本研究並不單以官方「上而下」意識型態主導的文化生產、或是「下而上」的在地文化圈如何回應意識型態來作為研究目標，而是將兩者皆視為場域內部形構生產空間的動力，更具體地以報／刊生產作為對象，掌握具切的生產群體彼此間的結盟、競逐與在場域中的位置流動。

而上述兩個問題牽涉到的即是戰後初期文化場域資源分配與資本轉換問題，以及其與官方／政治資本之間的微妙對應關係。這亦是本研究欲透過報刊耙梳戰後初期文化場域所欲描繪的主題。下一小節將以報／刊空間作為範疇，描寫當時進入舞台的人物與角色，簡述活躍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論述／實踐空間中的群體究竟有哪些，各別佔據在什麼樣的場域位置、持有什麼資本，以及彼此間在報／刊空間中展現出來的鬥爭張力。

## **第二節、戰後初期速寫：進入舞台的人物與角色**

那麼，在終戰之後到二二八事件為止這段政權轉移、回歸的時間裡，活躍在台灣文藝生產空間中的生產者，究竟有哪些？彼此之間的人際連帶關係又是如何？而我們應該如何捕捉他們形構的社群或集團，以及其所佔據的場域位置？最重要的是，從這些進入當時文化舞台的人物們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如何勾勒出當時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分配、交換與結盟？

對這段時期文化生產空間舞台上活躍的成員，一般的分類分為大陸來台知識份子、台灣在地知識份子以及半山，不過不管是由大陸來台或者是台灣在地知識份子，在這個時期的政治位置以及資本組成都十分複雜。

以徐秀慧與黃英哲分別所提到在文化重建中的重要報／刊來看，徐文所論述以左翼刊物為主要對象，突顯出台灣左、右翼文人在戰後集團化的複雜成分：傾向民族主義路線的《民報》以台灣仕紳、文化人如林茂生、楊雲萍結合日治時期左翼運動成員許乃昌、黃旺成，而《人民導報》則是以返台的半山人士如宋斐如，結合部分大陸來台報業人士謝爽秋、以及台籍左翼知識分子呂赫若、吳克泰、蘇新等人。另外這些人物同樣也出現在數個短期的左翼刊物中。而黃文所聚焦具有高度官方色彩的刊物《台灣文化》中，同樣成為台灣本地左傾知識分子、仕紳階級，以及大陸來台官僚／文人交流、結盟，進行文化重建的重要空間。因此對戰後初期台灣文化舞台上出現人物進行描述時，必須同時理解到，在這個時期雖然不同的社群各自占據其不同社會位置，但此一時期也是一個位置流動頻繁、並且彼此手中握有的資本高度結盟、重建社會文化與政治位階秩序的時期。

在本研究中，暫將大陸來台、活躍於此一時期文化圈中的人物分為「大陸來台官僚」以及「知識份子」；前者主要以擁有行政長官公署頭銜為主，後者則是沒有官銜的報業人員及文藝、知識份子。而台籍文化生產者則分為在國民政府內任職的「半山人士」、「台籍資產階級仕紳、文化人」以及「左翼知識份子」。此一區分方法主要是先以原所屬政權（即國民政府／日本殖民政權）作為區分，因為政權轉移前後對照所導致的語言政策、社會位階以及因語言改變而導致的文化資本增值／貶值問題，對戰後文化、政治場域的組成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再以其文化教養與思潮（即左／右翼認同、民族主義傾向或者左翼認同傾向）作為次分類，因為左右翼的文化、政治傾向認同關係到場域內部不同位置的社群或個人之間的連結或敵對。

本節以下將區分為三個次小節，分別簡述此一時期大陸來台人士、半山人士以及台灣在地人士三個向度，分別勾勒其與報刊空間之間的連結，並加以論述其中個別所持有的文化與政治資本形式。

## 2.1 大陸來台人士

根據橫地剛的研究，1945年九月負責台灣接收的特別行政機關行政長官公署在大陸成立之後，九月開始已有國民政府相關人士來台，至1945年十月廿四日陳儀來台、廿五日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收、十一月一日接收工作正式展開為止，來台接收的成員除軍警外不到八百人。另外也提及該年度來台的除了接收官員、軍警之外，還有一部份的新聞報導人員亦進入了台灣社會，包括重慶《大公報》的李純青、上海《大公報》的費彝、《中央日報》楊政和、《掃盪報》謝爽秋以及中央社的葉明勳，而該年底開始，因為交通狀況而無法遲遲無法來台的民間報紙的記者也開始漸漸抵台。（橫地剛，2002：55-56）

亦即，終戰最初一批抵台的大陸人士以官僚、報紙從業人員為主。在這批官僚、報紙從業人員中，知識份子不在少數，但是實際真正從事文藝創作生產的人士並不多。然而在當時政權轉移、以中文為官方語言與新文化典範的場域中，他們所持中文的文化資本都相對於當時受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要高；並其所擁有的政治資本在辦報／刊上亦有實質資源上的奧援優勢。在報／刊成為「文化重建」的重要媒介時，不僅在統治政權這端亦有官方報紙發刊，亦有部分的官僚人士參與在民間報／刊創辦行列中。不過，必須注意到的是，由於這批人士主要以官僚為主，因此國民政府內部複雜的派系在行政長官公署內部的權力位置分配與爭奪，同樣也影響到這些資源分配。

在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中，以陳儀為主的政學系主導著政治統治集團、而軍警則由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的軍統派為主導，台灣省黨部則以中統派領導人陳果夫的主任秘書李翼中為主要負責人。而在位處中央權力核心的長官公署之外，一九四〇年代逐漸壯大、以軍統黃埔系所把持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與在地社會的連結也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活力。（陳翠蓮，2003：211-233）這些不同派系在台灣報／刊空間中皆佔有一席之地，並且將報／刊視為派系鬥爭的工具之一。這一方面使報／刊逐漸無法只是作為文化生產空間、而是同時也成為政治角鬥的舞台與資源，將報／刊的文化生產與匯聚文化資本的功能與政治場域中的資本分配緊密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政治資本進入了文化生產空間後，也為當時在戰後社會經濟蕭

條、經濟資本匱乏的情況帶來改變：掌握政治資本相對地便相對能親近、獲得經濟資本。而原來以金錢作為辦刊主要成本的情況也有了鬆動，擁有政治頭銜或者與官僚親近的人，越容易接近甚至進入報／刊生產空間。

具體地將這些派系與報／刊社群作一簡單連結舉例，能夠更為清楚地看見當時的報／刊空間有一部份完全地掌握在這些官僚人士手中：當時的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的主事人即是由陳儀親近的青年黨人李萬居所主持，軍統派的柯遠芬於一九四六年三月成立了外圍團體正氣學社，於同年四月中創立《正氣半月刊》，並於該年十月轉為月刊。而中統派則結合台灣在地仕紳成立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其中的蔣渭川、王添灯曾進入省議會擔任議員，而王添灯更曾擔任《人民導報》社長以及《自由報》的創辦人。

而除官僚派系之外，大陸來台另一部份的報業從業人員與知識份子，則與台灣社會展開另外一個層面的連結。如大陸來台左傾知識份子王思翔、樓憲、周夢江等人參與在初期被台共所把持主導的《和平日報》中，而後又參與創辦《新知識》、《文化交流》等左翼刊物。而前述提及首批來台的新聞人員中，謝爽秋則是參與了《人民導報》的創辦、李純青則與台籍左翼知識份子蘇新、王白淵共同以合作編輯的方式創辦了《台灣評論》。

## 2.2 半山人士

在政權自日本總督府轉移至國民政府之後，另一批活躍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空間中的群體即是在日治時期曾赴大陸或受教育、或投效國民政府的台灣人，亦稱為半山份子<sup>9</sup>。他們由於赴大陸受中文教育，因此在轉換成中文語境的戰後初期台灣

---

<sup>9</sup> 根據李筱峰《戰後初期台灣的民意代表》中提及，半山份子原來在戰後初期帶有貶抑之意。而在此處沿用其語意上的界定：即指（一）曾居留中國大陸一段時日（非旅遊）而後返台的台籍人士；（二）該人士並在國民政府體制內任職、或在行動上擁護國民政府。（李筱峰，1986：148）而陳翠蓮在派系鬥爭的觀點上更進一步地闡述半山份子所佔據的社會／政治位置：「這些台灣人多事在戰爭時期因不滿日本統治而前往中國大陸，在大陸求學、從軍、或任職；他們在大陸時就曾組織種種團體，如『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義勇隊』、『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陳翠蓮，1995：235）

社會中，相對於台籍知識份子更親近新文化典範、而擁有相對較高的文化資本；並且在任職國民政府的身份上也擁有介於大陸來台官僚與台籍仕紳之間的政治資源。

不過，這群半山份子因其台籍身份而成爲國府與台灣社會之間親近的橋樑、因此與過去在日治時期中同樣有著中介功能的台籍在地仕紳或知識份子之間產生競爭關係；另一方面則由於任職國府之中，同樣受到國府內部派系的分配與主導而據有不同的政治傾向與資源分配。陳翠蓮便認爲，這些半山份子雖然早期在離台前在地方上各有其淵源與交遊關係，不過在隨國民政府返台後，主要仍然是「援引在大陸所歸屬的派系來自我附麗、並效忠派系以鞏固地位。」（陳翠蓮，1995：211）由此可以看出「半山」份子在身份上的雙重性與當時社會位置中的曖昧狀態：介於台籍仕紳與大陸來台人士之間。一方面作爲中介份子，但一方面也投入在戰後初期的權力重組的版圖之中。

這群半山份子在戰後初期報／刊場域的活躍，主要以執掌《新生報》的李萬居、《人民導報》創辦人之一的宋斐如爲最重要，另外如《前鋒》雜誌則是由組成「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的廖文毅、廖文奎等人所創辦。

### 2.3 台籍在地人士

台籍在地人士大致上可分爲左翼知識份子以及台灣仕紳兩個次群體。這個群體在戰後初期的重要意義是，他們歷經政權轉移所導致的資本貶值與位置轉換，但在新政權的統治下又重新以中介於新政權與在地社會之間、掌握在地社會資源分配的位置，佔據並兌換其所有擁有的文化與政治資源。這個特點尤特展現在報／刊場域之中。

整體來說，台籍在地人士在戰後初期的報／刊場域中是高度活躍份子，其中又以左翼知識份子爲最。終戰後無論是作爲與殖民政府與在地社會中介的台籍仕紳，或是透過受日本教育、留學日本等教育途徑取得文化資本累積的左翼知識份子，都因爲政權轉移以及中文文化典範的建立而在政治資源、文化資本上有所貶值，然而這並非意味著這個群體在社會場域中的整體資本歸零。正因政權轉移以及中文文化

典範亟欲重新建立，新政權必須高度倚賴在地人士的協力推動，而積極學習中文的知識份子也因為國府內各個派系本身缺乏文化人才、加上亟欲拉攏台灣民心而必須借重省內外知識份子辦報刊雜誌所致（徐秀慧，2007：149-151），大量而積極地投入戰後初期的報／刊生產空間，並且多作為第一線的記者，或是創辦、論述撰寫等重要的內容生產角色。

然而在論述台籍在地人士的時候，必須特別注意到其內部所含的多元性。由於政權轉移而受到的資本轉換所致，在創辦報／刊上，有一部份台籍知識份子在政治資源的掌握上並不如大陸來台官僚與半山份子穩定，而必須透過與之結盟才能夠取得由政治資源所兌換而來相對優勢的經濟資本。但另一方面亦有作為資產階級的台籍仕紳，其所擁有的在地資產、人脈也同樣成為大陸來台官僚與國府所倚賴的在地資源。另外，除二、三〇年代左／右翼思潮的分野外，進行農民運動、或者是與日共親近爾後組織台共的運動份子，同樣在報／刊空間中佔據了重要的角色。

### 第三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從政治結構轉變與文化場域間的關係切入，並以時間區分，分章描述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場域從接收、不同文化群體遭遇、文化典範的變更以及場域流通資本的價值增貶來討論場域內部的結盟、流動、分化、競逐，以及自主空間的形成與消散，來試圖回答在 1947 年前的台灣社會是否生成以中文為主、具自主性的文化生產場域。本文將以四章節試圖回答此一提問。

第一章中，本研究試圖提出問題意識、研究方法指陳以及使用材料分析，架構本研究的主要提問。以相關研究脈絡化本文所欲討論的 1945 年接收後至 1947 年初為止的「文化生產空間」，並概略描繪活躍在當時社會舞台上的社群。

第二章則描述 1945 年自接收開始至年底為止的社會空間中各種群體與資本的流動，從中勾勒出戰後最初期這段充滿動能的時間。此一時期各種新政權的權力團體進駐，無論是官方接收工作或欲建立與台灣社會之間的各種關係，都必須仰賴與在地社會意見領袖的連結。於是各種來台的政治權力團體與台灣在地社會意見領袖

與行動團體之間，彼此遭遇、結盟的趨勢成爲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動能之一。另外，在這個時期中，新社會場域的資本分配結構逐漸成形，包括舊政權政治資本的貶值、新政權政治／經濟資本的進駐，以及民間社會各種不同資本的消長，都使這個時期的場域充滿流動活力。本章以（一）戰後初期有哪些政治群體進駐台灣？它們在權力空間劃分以及在地社會連結兩個面向上展現什麼樣的面貌？（二）在地社會的社會空間結構如何轉變？（三）語言典範的變更在此一時期如何發揮作用？（四）整個台灣社會中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資本結構產生如何轉變？（五）報刊在其中做爲什麼樣的角色？等以上五個問題作爲主要提問。

而進入第三章後，我們試圖討論這一時期場域內部分化、競逐與空間整合的情況。在權力結構方面，「官方」的位置佔取行動在 1945 年底接收工作前後到達高峰，至 1946 年開始則派系位置趨於穩定；亦即進駐台灣的派系都找到結盟的節點、佔據了所屬的發言位置，並且透過外圍團體與機關刊物拓展屬於自己的發言空間。而投射這一狀況的便是 1946 年開始報／刊創辦數量的穩定攀升。不同於 1945 年底的報／刊以人員流動作爲整個報／刊空間的活力展現，結盟多過於敵對；1946 年的報／刊一方面作爲單位的發言空間，另一方面亦漸漸產生做爲政治工具彼此擠壓的面向：本章試圖以報／刊拉出各條異質分化、對立的軸線來建構接收後、二二八事件前這段時間的政治權力空間與文化生產之間的結構變化，進而討論在這個政治權力空間逐漸壓縮文化生產空間的一年中，文藝生產所展現的面貌與可能性。

在前三章中，本研究試圖透過歷史資料建構出相對完整的場域脈絡與轉換，第四章則回過頭以對布迪厄場域理論的回應，以及場域內部的結構表現來闡述結論。下一章我們將直接進入 1945 年八月接收初期的權力分布與政治資本分配，來討論戰後初期的場域面貌，討論特別行政機構行政長官公署的初期治理與台灣社會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及此一時期中哪些文化群體彼此遭遇，特別是透過「報／刊空間」作爲平台如何彼此結盟。

## 第二章、接收初期:遭遇與萌發（1945 年底前）

1945 年九月開始，國民政府軍官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員陸續抵台，包括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李友邦以及台灣義勇隊、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等人皆在十月底前到達台灣。接收工作除軍事方面以外，皆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而軍事部分則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sup>10</sup>。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始接收工作，直至 1946 年四月完成所有接收手續。（黃英哲，2007：34）這段接收的時間裡，是國民政府與台灣社會在日治時期結束後的第一次正式遭遇，接收工作中除了行政、軍事等各種政治事務的接收外，民族思想的重建、中國化運動也隨之展開，同時也是日文教育典範的終結以及中國化、中文文化典範在台灣重新建立的起點。在此一政治權力轉移的時期中，「辦報／刊」作為言論權力的象徵表現，無論是雜誌刊物或者民營報紙皆在台灣的文化場域中開始活躍起來，呈現熱鬧的蓬勃現象。

這個時期的台灣社會空間中，統治社群率先進駐，爾後文書官僚與部分報社記者、文化人隨之進入這個社會場域。究竟有哪些群體進駐台灣、其間的政治網絡關係為何？並且，其進駐台灣的先後順序及與台灣在地社會空間連結是否形成相關性？以及，這些社群如何劃分權力空間？這幾個問題將成為在這個遭遇初期首要提問。

以上述問題為開展，就 1945 年十月至 1945 年底的報刊為範疇，本章將描述在台灣社會與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彼此遭遇的經驗。透過「抵台接收」作為起點，討論以下幾個問題：（一）原來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場域加入了哪些人物群體、台灣的社會空間內部結構產生了什麼樣的整合與重新分配？由上而下的這些整合與重新分配如何展現在報刊創辦的現象上？（二）原來台灣社會脫離了日治殖民的統治之後，在地勃發的旺盛活力又如何由下而上地產生作用？（三）語言轉變的文化典範變更又使此一時期的文藝／文化表現產生什麼樣的樣貌？（四）最重要的，語言轉換與場域整合使整個文藝生產場域的資本結構產生什麼樣的變化，而活躍於這一時

<sup>10</sup>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 年第一季第一期，民國 34 年 10 月 29 日。

期文化生產空間中的人物又是持有什麼樣的資本、以什麼樣的資本進行位置與資源的兌換？（五）報／刊空間又如何成爲這些資源與資本的交會、兌換、結盟的空間？以上是在本章中所欲初步描述、回答的問題。

在本章中，主要論述 1945 年終戰後經歷接收初期的台灣社會空間變化，並將這段短暫而複雜的時期切分爲 1945 年十月與十一月兩個部分來討論。將 1945 年細分爲十月與十一月至年底前兩段時間，主要是因爲這個時期出刊刊物太多；另一方面，作爲描述戰後社會場域的起點，必須細緻耙梳此一時期刊物與參與群體的關係，並相對詳細地敘述其中不同群體的結盟關係。本章結構將首先描述接收初期的權力版圖建構，並以 1945 年十月中發刊的《民報》、《新青年》、《政經報》、《前鋒》以及《新生報》來描構最初的文化生產空間與政治、文化社群之間的關係，試圖描繪台灣報／刊的文化生產場域最初的版圖。透過對這些刊物中重要組成人物背景的分析以及個人的位置流動，將展現接收初期的文化板塊的分配樣貌。接著，根據此一最初版圖，揭開 1945 年十一月至該年年底前的接續創辦的報／刊熱潮，包括《新風》、《新新》、《台灣青年》、《大同》、《現代週刊》等刊物，來觀察 1945 年底前這個各方面動力都持續變動的社會中，文化生產空間循著什麼樣的軌跡進行變動。

### 第一節、權力進駐——接收的起點

1945 年八月廿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根據橫地剛描述，國民政府接收工作的時序大致如下<sup>11</sup>：

1945.9.1 黃燈淵、黃昭明、張士德三人乘美軍飛機到達台北。

1945.9.16 張亭孟等十七名中國空軍到達台北

1945.10.5 葛敬恩等八十餘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成員乘美軍運輸機到達台北。同乘者有五名報社記者。

1945.10.17 柯遠芬率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總部人員由基隆登岸。陸軍第七十軍及行

<sup>11</sup> 轉錄自橫地剛整理，2002：55-56，並加入陳翠蓮描述，1995：229。

政長官公署的二二一名人員分乘四十餘艘艦艇到達基隆港。

1945.10.23 李友邦等台灣義勇總隊到達。

1945.10.24 行政長官陳儀抵台。憲兵三百餘名、憲兵第四團第一連隊、警備司令部特務團一千三百餘名、警察一千名經福州到達基隆。另外政府軍亦分乘廿七艘艦艇到達基隆。

1945.10.25 日軍投降式。

1945.11.1 接收工作正式開始。

1945.11.10 第廿六師四團到達高雄。

在上述時序敘述中，可以梳理出在接收最初期來台的國民政府人員中，即已含有複雜的政治角力關係，而這層角力關係是以在大陸的國民政府內部派系為基礎、進而在台灣在地統治的脈絡上進行與本土勢力的結盟與劃分。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員與其他來台黨部官員在來台前即已分屬不同派系、彼此之間有不同的利益爭鬥關係，但是在來台後的結盟情況則亦會因在地治理的資源分配需要而改變其間的勢力結交關係。在這小節中我們特別參照現有針對國府內部派系的研究，關注、討論接收後這些國府內部派系與在地派系關係的交接、連結與轉換，以及報／刊在其角力關係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透過初期來台順序來看，同時在接收初期進駐台灣的政治派系勢力有哪些？其中不同身份群體的成員又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回頭檢視前述接收工作時序，會發現終戰後第一批抵台的人物列表中，包括負責接受台灣政權的行政長官公署在內，出現了幾個派系代表人物：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李友邦、張士德，行政長官公署陳儀與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以下將分別針對其所屬政治派系團體，亦即附屬於黨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與台灣在地知識份子的關係、主導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學系<sup>12</sup>，以及掌握軍警實力的軍統派個別彼此間與台灣社會銜結的面向。

以黃埔系為主要成員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是一個 1937 年即開始籌備，以黨為核心、階層化並網絡化的組織，以中央團部為主，分層設置支團部、區團部、分團部，分團部以下再設置區隊與分隊<sup>13</sup>，以高度組織化的結構形成一股與中統派為主的國民黨組織的中央及地方黨部相互抗衡的組織勢力。接收初期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代表人物張士德與李友邦的身份頗為使人注目：他們是以台灣義勇隊的隊長與副隊長身份來台，張士德為戰後第一個以中國官員身份返台的台灣人，並且在日治時期為農民組合成員；李友邦同樣是台灣人，日治時期就讀台北師範學校、與後來台共的主要領導人林木順曾一同罷課、亦進行反日運動。（陳翠蓮，1995：230-231）張士德與李友邦兩人後來皆入黃埔軍校，被視為軍統派黃埔系成員。也就是說，這兩個代表以國民黨為核心、由中央而地方高度組織化的團體的人物，不僅是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甚至有參與左翼、農民運動背景，爾後則進入國民黨派系核心的軍統基地黃埔軍校。此兩人在身分上的多重面向，與戰後初期三青團在台灣展開接觸的接點有著密切關係。

最早來台的張士德初到台灣，先透過管道接觸了台北執業律師陳逸松。根據陳逸松回憶錄，他與張士德並非舊識，為何會找上陳逸松作為與台灣在地的知識菁英份子之間接點無法得知<sup>14</sup>。不過透過陳逸松，三青團台北分團的籌組以其人脈很快地與在地知識份子、特別是左派社群牽上線，包括如參與台灣共產黨建黨運動的林

<sup>12</sup> 政學系原來是民國初年由北京國會議員谷鐘秀、楊永泰等人籌組的政團，在北伐時期與國民黨結合，於抗戰初期已聲勢顯赫，成員包括當時的湖北省主席楊永泰、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福建省主席陳儀、青島市長沈鴻烈、上海市長無鐵成以及行政院外交部長張群等人。抗戰勝利前夕勢力到達高峰，原上述各省主席不僅紛紛進入中央行政系統與接收歸還復地（張群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則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熊式輝則赴東北接收、陳儀掌台灣等）。根據陳翠蓮的派系描述，「該系沒有明確組織，成員間也缺乏特定的信仰與嚴格的約束關係。」抗戰勝利前曾一度試圖組黨，不過最終未付諸行動。（陳翠蓮，2003：216-217）

<sup>13</sup>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使資料第一輯初稿》，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出版地不詳，民國 35 年，附錄一，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系統表，頁 101。

<sup>14</sup> 根據回憶錄所述：「不知是軍統自己的情報，還是日方提供的資料，八月三十一日傍晚，張士德透過一個電器商人請我到『梅屋敷』和他見面。」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 300。

日高、抗日運動份子謝娥、楊遠，日治時期《台灣民報》記者陳旺成（後為《民報》總主筆），台南文化人吳新榮等人。

在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有著台灣人身份的三青團主要人物在日治時期參與反日運動與農民運動的身份，與後來接收時期三青團所拉攏的成員性質亦有高度相關，才會產生包括謝雪紅、謝娥、林日高、蘇新、呂赫若等左傾的台灣知識份子，甚至包含是台共成員卻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特殊情況。以三青團在接收時期於台灣進行的組織運動來看，三青團與台灣在地左翼運動、知識份子之間的結盟，就是一個國府派系因循在地人脈而變更結盟關係的例子。而這個結盟關係，也為活躍於當時的文化生產場域的左翼知識份子提供了在場域中流動的資源與空間，包括蘇新、呂赫若等人在各報刊的角色，以及謝雪紅與《和平日報》的關係等，此一部份將於下一章再敘。不過左翼知識份子、甚至台共成員在在這樣的結盟關係中，有機會親近政治資源，而成為二二八事件前台灣社會場域中重要的文化與政治動力。

除了結盟之外，以陳逸松作為接點，亦有一些群體被排除在三青團的人脈網絡之外：

「青年團」成立的時候，一些日本時期的御用紳士也想加入，都被我們拒絕了。御用紳士的頭頭許丙還特地來找我，說要把他寧夏路的大房子給我們區團部座辦公室。我敬謝不敏，我說：「青年團用御用紳士的房子辦公，那成體統嗎？」（陳逸松，1994：302）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在行政長官公署來台，三青團在台灣在地知識份子中的網絡，主要是以抗日、左翼運動份子為主，相對地排除親日的台灣仕紳。

相較於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部等實際握有接收實權的單位來看，隸屬於軍統派黃埔系的三青團並非作為接收行政執行單位，而是以黨團為名義的外圍團體，但是因為先於接收執行單位來台、在接收執行上在政治真空的情態下維繫了社會秩

序。有研究者認為，正因三青團在過渡時期維繫日產、社會秩序之角色上與行政接收官員之間有所衝突，因而深受行政長官公署排擠。（陳翠蓮，1995：230）

而軍統派的另一群體則主要集中於警備總部、以參謀長柯遠芬為中心，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及軍隊。以柯遠芬與警備總部為主，後於 1946 年三月成立外圍團體「正氣學社」，包含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中央社台灣區特派員葉明勳等人皆參與其中，發行《正氣半月刊》、後改月刊。有關警備總部與正氣學社相關回憶、傳記資料較少，將於後續進入 1946 年的刊物論述，則較能清楚看見其作用於文化生產場域的位置與脈絡。不過不同於三青團的高度組織化，正氣學社作為外圍團體的形式，在官僚資源的近用上是非直接的，亦即並非是以官方團體直接地擁有預算等經濟支援，甚至在刊物中宣稱「並沒有與政府或任何機關發生任何關係」，是「超然的」立場<sup>15</sup>。這個宣稱一方面是為了區隔正氣學社與軍統派的關係、以維持文化上的獨立性，但同時某種程度也削弱了可以直接獲得的資源。

不同於軍統派人員包括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是第一批來台的官員，正氣學社的機關刊物《正氣》半月刊及月刊創刊較晚，是遲至 1946 年 4 月份才發行，已經過了接收工作的初期。就這點來看，會發現正氣學社作為軍統派的外圍組織、組成以軍統派官僚為主，但其文化生產、言論發表的角色建立較晚；而至於原因如何，或許可以初步解釋為軍統派在接收工作中文化宣傳的角色並不明顯，而主要是以軍隊、警力等武裝勢力為主要管理範疇，創辦文化刊物對其掌管範疇來說並非必要，而就這點來說，原來並非扮演文化宣傳角色的軍統派「為什麼到了 1946 年卻有創辦刊物的必要性？而這個刊物的作用與角色又是什麼？」則成為後文中進一步檢視與質疑的問題。

---

<sup>15</sup> 〈刊前語〉，《正氣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46 年 4 月 16 日，台北：正氣出版社。

以正氣學社的組成來看，亦有在地知識份子參與其中，但在數量上極少，在第一屆社員大會速寫<sup>16</sup>中就其組成所佔據的位置來看，是相對靠近統治階級、官僚色彩較重的群體，組成的單位則以警備總部成員加上部份台灣省訓練團成員為主。

最後，戰後主要統治單位則為政學系主導行政長官公署，以陳儀為核心，依據公署內部的官僚結構進行部署。根據陳明通研究，陳儀治台班底約可大致分為執管財經、人事、宣傳等不同職處的四派<sup>17</sup>，多半是陳儀留日或者赴歐考察所識；其中特別就文化宣傳與教育方面的主事人物則特別以國家主義派受到重視，包括《新生報》社長李萬居、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另外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與民政處處長周一鶚，以及教育處長曾琦。而作為台灣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內容重編的專門機構台灣編譯館（黃英哲，2007：81）之館長許壽裳則是陳儀留日時期所識。

一般認為，原來在大陸國府內部的派系來到台灣後，鬥爭情況同樣延燒台灣。以政學派主導的行政長官公署、主事黨部的中統派以及執掌軍警以及三青團的軍統派之間關係緊張。透過這些進駐台灣接收的勢力分佈，我們得以進一步詮釋「在文化宣傳政策上的多頭馬車」現象（徐秀慧，2007：129）：即使文化宣傳方面的政府人事是以陳儀班底作為安排，但是其他派系亦同時組織各自外圍群體，創辦報刊則成為其進行文化宣傳發言與人脈結盟的平台。在這個組織結盟的過程中，在地知識分子的文化觀念也因這些角力競逐的縫隙間得獲取資源，流通在台灣的文化生產空間中。

<sup>16</sup> 〈正氣學社第一屆社員大會速寫〉，《正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47年1月，台北：正氣出版社，頁85。其中所提及的社員主要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台灣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長官公署秘書王策、警備總部文書組組長徐康、總司令部第二處處長林秀樂、總司令部第三處處長盧雲光、總司令部秘書田叔達、憲兵團少將團長張慕陶、中央通訊社社長葉明勳、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訓練團部主任秘書林舒謙、訓練團講師葉新華、訓練團科長何奮、訓練團講師曾紀焜、台灣糖業公司科長鍾餘泉、台灣省立法商學院院長周憲文、總司令部處長王成章、青年軍台灣通訊處總幹事林戈夫、總司令部中將參議黃國書，以及總司令部參謀總長柯遠芬。

<sup>17</sup> 分別為通曉日本李澤一派、執掌財經部門的徐學禹派、主管人事部門的沈仲九派，以及國家主義派。陳明通，〈派系鬥爭與陳儀治台論〉，《台灣光復初期歷史》，賴澤涵主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1993，頁244。

以接收初期的權力部屬與報刊生產空間的配置交錯來看，相對於行政長官公署本部，其餘國府派系包括軍統、三青團都積極地朝在地知識份子與社會意見領袖進行交往，這些立基在派系鬥爭上的結盟關係也構成了戰後報刊生產空間中重要的重組動力，也提供了該時期台灣在政治鬥爭實景外的另一些文化面向。下一小節我們希望透過進入報刊空間組成分析，進而勾勒出報刊生產與權力空間之間的對應關係，描繪出當時的場域風景。

## 第二節、接收當下的報／刊空間

本小節主要先描述 1945 年八月終戰後到十月接收團隊來台為止所創辦的報刊，以及其間的人物、群體關係。這段時間代表並再現了接收初期的文化發生空間版圖，一方面從官方創報單位可以看見政治權力空間的部署，另一方面結合在地知識份子的內容生產也表現出在地知識份子的回應。

這段時間中創刊的報刊包括：九月在台中、由楊達創辦的《一陽週報》；以及十月十日由台灣人創辦的第一份民營報紙《民報》<sup>18</sup>，同月廿五日開始發行的《政經報》、《前鋒》與《新生報》。除《新生報》為官方機關報之外，其餘皆由台灣在地知識份子所發行，由此亦可看出終戰後台灣在地知識份子對文化生產場域的積極投入。不過這段時期除了政治權力的移轉交接之外，同時多數的台灣知識份子也正歷經語言轉換，因此在接收前甚至接收初期這段時間中，「有能力發行中文報刊」的族群也意味著是最迅速掌握了語言典範轉換優勢的群體。換言之，這批人若非是在日治時期即有家族漢學基底或赴中求學者、就是在終戰後積極克服語言轉換的日文教育知識份子。而這兩種群體，前者代表了在經濟資本上較為豐厚、並在社會位置上也相對較高的仕紳群體，後者則代表了在日治時期即以透過教育累積文化

---

<sup>18</sup>關於《民報》的創刊時間，本研究在搜尋資料的時候發現有兩種版本：分別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以及一九四六年七月。採用一九四六年七月創刊的學者包括葉芸芸的〈試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知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2006：47）、應鳳凰的《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1985：10），但是 1946 年由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出版的《台灣一年來之宣傳》中則在「現在發行之新聞紙一覽表」中列出民報發行年月為「三四、十、十」（1946：26），而林瑞明的〈台灣文學使年表〉中也將民報創刊列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1987：277），同樣採用的還有何義麟與

資本、並在戰後亦尋求透過積極的語言學習來維持其原有文化資本的價值、不使之貶值的知識群體。

前者所創辦之月刊以中文為主，即《前鋒》；後者則多半中、日夾雜，如《一陽週報》<sup>19</sup>、《政經報》。而《新生報》創刊初期以中文為主刊行、保留日文版面的作法，則顯示了官方語言轉換的過度期。

因此，在本節所欲探究的問題包括：戰後初期資源有限的台灣社會中，有能力辦報的人／社群如何克服語言障礙，亦即，其語言作為文化資本的累積過程與哪些條件相關？他們所主導的刊物所關注的議題與所持資本分配如何結構了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場域？這些問題，本節將透過進入個別刊物的脈絡與內容進而捕捉。本節中所引用的報刊影本資料包含《民報》、《政經報》與現有覆刻版之《前鋒》創刊號，以及部分《新生報》影本；至於《一陽週報》則因未取得影本，不作個別刊物的論述，而以黃惠禎及其他相關研究者所耙梳資料作為論述其他報刊時的參照。

## 2.1 兩種不同背景在台籍知識份子

為描述接收初期的台籍人士們的活躍，則必須要從接收後最早的幾個報刊作為起點，特別是《前鋒》與《政經報》。這兩個報紙在成員與其所代表的資本組成上雖都以台籍人士為主，但是結構與傾向上卻有所不同。

《前鋒》以一批在中國求學的台灣人為主要成員，由廖文毅<sup>20</sup>、廖文奎兩兄弟，以及林金波為主組成「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而發行刊物《前鋒》<sup>21</sup>。而《政經報》則是以陳逸松與蘇新為核心人物，兩個人都是在台灣出生，後留學日本，在

---

徐秀慧。本研究實際勘查藏於台中圖書館的民報影本，第一份《民報》影本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

<sup>19</sup> 因未獲得《一陽週報》影本，因此參考自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231。

<sup>20</sup> 參考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著，《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0。

<sup>21</sup> 以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前鋒雜誌》創刊號覆刻版中，由張炎憲所寫的沿革介紹為根據。

日參與了左翼團體。若單純以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教育背景來說，這兩個刊物代表了兩種不同背景的台籍知識份子養成過程。

就目前在台灣可得的《前鋒》覆刻版首期來看<sup>22</sup>，著手寫發刊辭的廖文毅是台南西螺地主之子<sup>23</sup>，在中學時期曾經於日本就讀，後轉向中國南京就讀金陵大學，並在大學畢業後於美國深造；於戰時返台，戰後出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長，同時亦於台北市政府就職並擔任接收委員之一；而林金波則是板橋林家成員，父親是經營臺華興業信託的林嵩壽。而在《前鋒》上發表文章的作者群中，則有同時擔任《民報》社長的林茂生，以及在戰前積極參與台語話文運動、並且編輯《南音》雜誌的郭秋生<sup>24</sup>，另外還包括楊肇嘉的姪輩楊基振<sup>25</sup>等。

從人員上的背景而論，《前鋒》是一個在組成上較傾向以台籍仕紳、有著地主身份為背景的刊物，而且其中有與大陸官僚連結的接點。就內容上來看也可以看出這點傾向。創刊號裡面包含了轉載宋美齡與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的文章，也刊載了三篇介紹中國國民黨的史料文章〈孫中山先生略傳〉、〈國旗黨旗概說〉、〈三民主義圖表解說〉，以及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的兩篇演講稿；其試圖作為台灣人理解國民政府或者中國國民黨之媒介的意味鮮明。儘管《前鋒》的出刊維持到二二八事件之後，然而由於在台灣除創刊號外極難取得，可供分析文本十分有限，因此針對其進行分析之研究極少，關於創刊的經過描述也不多；而其中有關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參與成員的資料亦十分有限。

<sup>22</sup> 根據張炎憲所言，《前鋒》雜誌創刊兩期後，改為週刊形式發行了十八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所覆刻僅為創刊號。而莊惠惇在其論文《文化霸權·抗爭論述——戰後初期台灣的雜誌文化分析》中所做整理，在美國胡佛圖書館尚存有第十四、十五兩期。

<sup>23</sup> 根據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與廖文毅相熟的林奉恩所言，「廖家在地方上不是最有錢的，不過也算是名列大富戶之一。廖家的土地大約有千餘甲之多，大概分布在西螺、二崙、崙背、麥寮、虎尾、斗六、刺桐、林內一帶。」（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297）然而廖家的地主身分是在廖文毅的父親一輩才建立起來。根據廖文毅之姪廖史豪的回憶，「曾祖父去世時，只留下幾甲田和現金幾百元，祖父勤儉持家，相當有生意眼光，有餘錢就買土地，四處買農田，買到嘉義斗六，一度還買到高雄去。他算是白手起家，一代間，成為大地主。」（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17）

<sup>24</sup> 張炎憲，〈《前鋒》雜誌創刊號〉，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四之三：《前鋒》雜誌，台北：傳文文化，1998，頁9。

<sup>25</sup> 廖文豪訪談回憶。（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29）

在這個刊物中，我們嘗試提出幾個問題：（一）相較於同一時期其他台灣人主事的刊物來看，何以這個由台灣人創辦的報刊得以存活至二二八時期？（二）為什麼在創刊內容中看來如此親近國民政府的刊物，所留下的資料卻如此有限？（三）這個刊物的存在、結束與轉變，及主事者在思想、主張上的轉變之間關係為何？而這個運作軌跡是否亦說明了台灣知識份子的某一個群體在社會場域空間中的變化？若是，那麼我們如何描述這個群體的軌跡？

從背景上來看，廖文奎與廖文毅兩兄弟出身西螺望族廖家，是地主也是漢學世家<sup>26</sup>，在台灣的社會場域中屬於擁有厚實的經濟能力、同時持有高文化資本的群體。兩兄弟皆有到中國讀書的經驗，或許又因其漢學世家的背景基礎與曾受初級日治教育之故，在戰後初期即熟諳中文而有能力創辦全中文刊物，這是《前鋒》的背景上與其他台灣人為主的刊物相當不同之處——對《前鋒》的編輯成員來說，並不會經過語言轉換的障礙，而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刊物能夠在甫接收就以全中文內容創刊之故。另一方面，曾留學海外，熟諳中、日、英語的語言能力也與這兩位核心成員除在中國求學之外，亦皆出國留學有關。不過以其出國後又返回中國任教<sup>27</sup>的經歷來看，在日治時期與中國關係算是相對密切。特別是有傳聞提及廖文奎在上海任教時期曾為陳立夫《維生論》代筆<sup>28</sup>，無論此傳言是否屬實，都可以看出來廖文奎在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中特別是中統派間的關係匪淺。在地望族的經濟基礎、社會

<sup>26</sup> 「廖家第十六世祖廖龍院（一八三五～一八九三）讀漢書，開私塾，教授漢學為生，娶程笑為妻。...（略）留下十四甲田。其子廖承丕善理財，大量購買土地，多達千餘甲，成為台南州數一數二的大地主，一九一六年被任命為台南州虎尾郡西螺區長。...（略）兩代之間出了六位博士...成為西螺望族。」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0，頁 2-3。另有廖史豪（廖文毅之姪）口述：「西螺屬台南州，祖父是台南州裡數一數二的富人，擁有幾千甲地，收租有幾百萬租。西螺廖家那棟四合院是美麗的洋樓，也是祖父蓋的。他一手培養廖家兩代，栽培三個弟弟赴日留學，繼而栽培五個兒子赴日本、中國和美國留學。廖家兩代數房的學業和生活，都靠他一人的經濟支援。到我這第三代，經濟上也是依靠祖父留下來的地產。我和父親一樣，不會賺錢，日本回來以後，一直從事政治運動和台獨運動，以及坐牢，不會賺錢，都靠祖父留下來的祖產生活。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0，頁 17。

<sup>27</sup> 廖文奎曾任教於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中央陸軍官校、金陵大學教授；廖文毅則曾擔任浙江大學教授。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0，頁 4-5。

<sup>28</sup> 同上，頁 4。

象徵地位以及文化資本、語言能力以及與國民政府內核心派系的往來似乎已經構成《前鋒》創刊的重要基底。

而在終戰後到二二八事件為止，《前鋒》核心成員的活動一直都十分活躍。不但在戰爭一結束就參與了台灣人東京同鄉會，負責台灣人回鄉的事務，以及在戰後台灣物資匱乏時期與日人交涉配給制度。另外亦組有文化團體「鵬南會」，集聚了「蔡子民、陳進興、林鐵等原本在東京《中華日報》的同志與幹部，以及音樂家蔡江霖和舞蹈家等藝術家。」（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23-24），相關資料中並未明白闡述鵬南會的功能與所進行活動，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戰爭一結束，西螺廖家的青壯年一輩靠著家族的經濟、文化及象徵資本，便積極迅速地投入了戰後台灣的文化事業；不僅實際接觸戰後與日人交接事宜，亦辦了刊物、組織了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影響的文化團體<sup>29</sup>。

除此之外，亦參與在《前鋒》中的廖家兄弟之姪廖史豪提到，當時其父、同時也是廖文奎、廖文毅長兄廖溫仁在京都時算是京都台灣同鄉會的核心，並未參與主要在東京運作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運動核心人物吳三連、林呈祿等人沒有往來；不過因為母親娘家長輩與蔡惠如、楊肇嘉、蔡培火等人熟識。（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15）從這段描述，加上廖文奎、廖文毅在日治到戰爭時期主要活動都以在中國大陸大學教書為主，可以略微瞭解廖家在日治時期的議會請願運動等政治活動中並未熱中參與、也並非運動核心。相對於日治時期對台灣民族運動始終維持距離的態度，戰後廖文毅在 1946 年八月參加了台灣省第一次國民參政員選舉。終戰前、後廖家兄弟對政治參與的態度轉變或許可以從與兩個統治集團的親近程度來解釋。儘管廖家兄弟在戰後因與國民政府在戰爭時期有所接觸、親近了政治資源而積極投入戰後台灣政治場域的重建，卻也因此無法擺脫國民政府內部鬥

---

<sup>29</sup> 以廖史豪自己的說法，「我們已組織『鵬南會』，原來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影響和建樹。」（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25）但是因為成員中多為記者、音樂家與藝術家等文化人士，因此仍定義為文化團體。

爭問題所帶來的阻礙。1946年參政員選舉的開票，廖文毅因一票具爭議性的廢票而落選<sup>30</sup>，一般認為是受到民政處長周一鶚的阻撓。

從以上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各種資源累積來看，《前鋒》相較於同一時期其他台灣人主事的刊物來看，其背後廖家望族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都成為刊物本身的生產基礎與支援，另外其與國民政府內部中統派的關係也可以視為是其所擁有的政治資本；不過正是此一政治資本同時也壓縮了這個刊物、連帶其主事者在政治場域中的位階。從《前鋒》與廖文毅等人到二二八事件為止的軌跡來看，可以發現此一時期國民政府的政治內鬥導致了政治資本的不穩定特質，而成為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元素。

而另一名編輯成員林金波後來則擔任《人民導報》副刊「南虹」之編輯，早於黃榮燦擔任編輯時期<sup>31</sup>。林金波為板橋林家出身，與廖家望族所據之高經濟能力與文化資本的地主位置相近。因此整體來說，《前鋒》是一個以地主、仕紳階層為核心的刊物，代表的是台灣仕紳、漢學世家以及地方望族等三者交集的資本。而以此資本組成來看，《前鋒》的存續時間長達一年多，後來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則在海外印刷，其擁有豐富的經濟支援以及海外人脈是其重要原因；然而相對於時間縱軸，而以空間橫剖面來看，《前鋒》在同一時期與其他刊物之間的結盟與連結性就遠不如同一時期以左翼知識份子為主要組成的《政經報》。

根據陳逸松的訪談，《政經報》的組織則是他「先召集一批年輕人組織『政治經濟研究會』，以此為基礎來討論寫稿。<sup>32</sup>」（葉芸芸訪，收於《餘生猶懷一寸心》，2006：273-274）。蘇新亦在自傳中提到，籌辦《政經報》的時間大約是在

<sup>30</sup> 一般認為是因為廖文毅的聯省自治主張讓民政處長周一鶚阻撓廖文毅當選省參議員。「其中有一張選票是筆跡未乾時對折，毅字不清。周一鶚將之當廢票計。」（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29）另外民報亦有報導，「關於參政議員選舉不明票，日前林連宗省參議員及高良佐民政處副處長赴京，向中央請示，內政部未敢判斷，呈請最高國防委員會審議，昨三十一日由中央政府來電，決定廖文毅楊肇嘉兩氏二票無效。」《民報》，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第二版。

<sup>31</sup> 此為《台灣歷史辭典》中於「人民導報」一條目中所提及，然其中將林金波誤植「中國大陸人士」。林金波為板橋林家林嵩壽之長子，雖出生於廈門，實應為生於廈門的台灣人。

<sup>32</sup> 陳逸松在訪談中提到，「《政經報》是台灣戰後台灣第一個刊物。」不過在此前（1945.9）已有楊遠在台中所辦之《一陽週報》，因此後也有人認為《一陽週報》才是戰後台灣第一個刊物。

1945年九月，以陳逸松為主要號召中心，介紹他包括顏永賢、王白淵、陳逢源、王井泉等人，決定組織「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發行《政經報》；蘇新並提到這些人「都是新聞記者、編輯、工廠的經理、銀行的職員等上層知識份子」。（蘇新，1993：60-61）從這個組成來看，可以發現《政經報》的組成與《前鋒》截然不同，儘管《前鋒》的創辦人廖文奎、廖文毅也是留學海外的知識份子，但在終戰之前一直都是在大學教書，是知識階層頂端的知識份子。儘管蘇新把參與政經報的新聞記者、編輯、工廠經理與銀行職員稱為上層知識份子，但相較於《前鋒》成員，《政經報》的成員是以活躍在文化生產前線的行動者為主。

在這同時，蘇新也提到，兩位編委顏光、胡錦榮在當時都還不會寫中文，因此大部分的編務以蘇新為主。因此可以看出在語言上《政經報》尚有語言轉換的困難，成員中儘管亦以知識份子為主，但卻是日文教育背景的知識份子；從這個立場上來看也可以發現，正因為成員內部的語言轉換問題，使得這個刊物在語言使用上較為貼近台灣當時的民眾，主要使用語言為中、日文夾雜。

後來於第四期加入編務的編委，同時也是鹽分地帶新文學作家林芳年之弟林金莖「和蘇新是同鄉，是蘇新帶他來《政經報》擔任編輯的。<sup>33</sup>」（葉芸芸訪，2006：274）另外參與在《政經報》創辦社群中的重要人物還包括在日治時期赴美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後返台，成立了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為主持「一個糾集台灣人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的實業家陳忻（李筱峰，1996：49）；而陳逢源在戰前曾經是傳統漢詩社南社成員，戰後則曾任省議員、投入金融事業<sup>34</sup>。

另外，陳逸松提到，在蘇新主編之前，其實《政經報》的頭兩期是由他與辜顏碧霞的弟弟顏永賢主編，其餘參與寫稿的人還有蔣時欽、呂赫若、郭水潭、黃啓

<sup>33</sup> 不過在何義麟為《政經報》覆刻版中所附的〈《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中所提，在何義麟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三日於林金莖宅所做的訪談中，林金莖表示是受陳逸松之邀加入《政經報》編輯工作。推測是由蘇新引介而陳逸松以發行人身份邀請。

<sup>34</sup> 根據謝國興所著《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983-1982）》（台北：允晨，2008）以及吳三連基金會所製作「台灣人物小檔案」網頁（<http://www.twcenter.org.tw/wu12/02.htm>）。

瑞。蔣時欽為蔣渭水的次子<sup>35</sup>，同時他戰後自上海返台之初也擔任過《民報》記者。郭水潭則在日治時期即是鹽分地帶的重要作家、並且被龍瑛宗譽為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功勞者之一」，認為他的日文程度與日本人沒有差異。而黃啓瑞的資料則較不清楚，龍瑛宗曾經在〈崎嶇的文學路——抗戰文壇的回顧〉<sup>36</sup>中將黃啓瑞列為「日文作家」之列，另外在陳逸松的訪談中則提到，陳呼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時候，黃啓瑞擔任青年股長；而在《政經報》現有覆刻版中，也並無署名黃啓瑞的文章。而王井泉與呂赫若，陳逸松提到，他 1942 年辦《台灣文學》刊物與王井泉即已熟識，而彼時呂赫若才剛從日本回來，由張文環引介而認識。後來《台灣文學》刊物部分成員於 1943 年成立「厚生演劇研究社」，呂赫若與王白淵也加入其中（葉芸芸訪，2006：280），呂赫若在戰後初期亦曾一度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鍾逸人，1993：300）。

從這個編輯、發表的核心群體來看，《政經報》的成員較為多元，是以日治時期即已活躍在文化生產場域的知識份子與文化生產成員為主，包含中、日文作家、在日本參與左翼活動的知識份子，以及資產階級仕紳家族的成員；也有實業家、或者參與在政治場域裡面的人物，是一個混雜了日治時期不同類型的知識與菁英階層的組合。若再加上在政經報發表文章的作者，則還包括在廈門集美中學讀書、與翁澤生一起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王溪森<sup>37</sup>、東京大學畢業的台灣實業家石錫純<sup>38</sup>、戰後在台灣擔任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灣「半山」宋斐如、擔任《台灣新生報》社長的李萬居，以及《民報》社長林茂生、戰後首任台北市長以及後來的參議會議長黃朝琴、日治時期參與農民運動的謝春木等，另外也刊登了已亡故的日治時期議會請願

<sup>35</sup> 根據何義麟的考察推測，《政經報》從第二卷第五、六兩期應是由以蔣瑞仁為筆名的蔣時欽負責編務，分別為 1946 年五月十日、1946 年七月廿五日出刊，這兩期同時也是《政經報》的最後兩期。

<sup>36</sup> 刊登於《文訊》第七期，1983 年 12 月。

<sup>37</sup> 徐秀慧在研究的註腳中提到，根據柳書琴的推測，王溪森應該是王白淵的化名。（徐秀慧，2007：197；柳書琴，2001：110）

<sup>38</sup> 由張炎憲、曾秋美對賴永祥先生的訪談稿中提及。《台灣史料研究》第 22 號，2006 年 12 月，頁 183-191。

運動重要主導人蔣渭水的舊詩與賴和的獄中日記遺稿；也轉載<sup>39</sup>過一次蔣介石論不平等條約的文章<sup>40</sup>。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若以《政經報》為一個空間，則交錯在《政經報》之內的身份與組織成員涵蓋了當時活躍於文化生產空間中的所有台籍人士的各種身份，表現出了「台籍」的標籤內含的複雜性：可能是往日本留學、或者往中國留學、亦有往美國留學者；他們也許可以書寫中文、也許僅能書寫日文；可能參與左翼運動但卻未加入共產黨身份；或者是台灣在地資產階級出身但卻參與左翼運動；他們之中也有著中介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省民之間的官僚成員，也有以民意代表身份進入議會的公職人員。

若將時間點往下拉長，仔細檢視參與成員同一時間或者後來的經歷，《政經報》的出資者陳逸松與編輯委員之一的黃啓瑞後來投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團部（簡稱「三青團」）的成立工作，呂赫若也參與三青團的台中分團；而蘇新則在《政經報》出刊中途退出，於 1945 年十二月轉向《人民導報》的創辦籌劃；蔣時欽同時在《民報》擔任記者、而林茂生同時擔任《民報》社長；宋斐則如擔任了《人民導報》社長。由此可以看出《政經報》作為戰後首批創辦的雜誌，其與後來報刊與政治團體之間的緊密連結性；幾乎可以說，《政經報》是接收初期最快並集合了台籍人士並創造出成為後續報／刊空間與文化人士活躍空間的基地之一。

並且從《政經報》成員的特色來看，這些「非純文藝」而參與在文化生產中的多種身份、頭銜標籤，也說明了在戰後初期這段時間裡，台灣社會中的文化生產面向是一個同時橫跨在經濟場域、政治場域的跨領域生產。這些其他「非文藝」人士在這個時期大量地介入、甚至是作為文化生產的主要投資、或實際參與運動的主導者的現象，也說明這個時期的文化生產在主題上之所以與民族認同、語言文化重建、政權轉換過程中的社會政經穩定等這些政治、經濟問題汲汲相關，也跟這些非

<sup>39</sup> 轉載自《中國之命》，刊登於《政經報》第一卷第一期，1945年十月廿五日。

<sup>40</sup> 蘇新曾經在其自傳中提到，「當時辦《政經報》的這些人對國民黨懷著相當大的幻想，所以《政經報》的政治傾向起初完全表態無條件地擁護國民黨、國民政府和陳儀。……稱蔣介石為『委員

純文藝人士的投注有關。亦即，此時促成文化生產的動力在當時尚非來自文化場域本身。而這股動力的去向，以前述核心成員同一時期的橫向活動與後來的動向來看，一方面他們仍然持續地以三青團為與政治場域連結的節點，另一方面也在後來的報／刊如《人民導報》繼續集結。

就文化場域在社會場域內部的地位來看，原來文化生產就位於權力或者經濟等外部條件主導的被支配位置；然而正是如此被支配的文化生產如何在權力、經濟等資本條件的迎合與悖反之間往來，才是文化生產如何產出自身內在動力的主要關注。也就是說，哪些領域交錯、交換資本或資源固然重要，但是在這些動態的社會重組中，文化生產如何與之相應產生自身的內在運作動力，由哪些人、進行哪些活動來來回產生動力、拓展空間，才正是拓展文化場域內部動力的重要原因。

在此，我們的提問便是，這樣的內部動力是否發生在《政經報》的組成成員與群體之中？透過其核心成員的流動傾向或許能試著釐清此一問題。從何義麟的說法來看，

蘇新與蔣時欽是決定《政經報》言論方針的中心人物，兩人又分別投入其他左翼刊物的編輯。因此，《政經報》基本上可視為本土左翼人士之雜誌。再以時間前後順序來看，戰後左翼文化人之言論活動，最初以《政經報》為據點，其次集結於《人民導報》，最後才有《自由報》。<sup>41</sup>

這段評論的意義指出了這股以台籍左翼知識份子所產生的文化生產動力，是透過前後幾個刊物為據點集結、延續下來。而透過這些延續下來的軌跡脈絡，在下一章中我們也將試著討論在《政經報》時期作為被政治、經濟等外部條件支配的文化生產動力，如何在接下來的不同刊物遞嬗之間重組？其間是否相映產生文化生產空間內部的運作動力？

---

長』，稱陳儀為『陳長官』等等。但是不久，這種無條件的擁護就變成對政策的批評。……第三期就開始發表一些批評的文章。」（蘇新，1993：62）

<sup>41</sup> 此說法收於何義麟在《台灣評論》覆刻版中所發表〈《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一文中。台北：傳文文化，1998，頁10。

而《政經報》作為戰後第一個雜誌刊物，組成成員兼容半山、台籍知識份子、台籍資產階級仕紳，可以視為是在此一時期中，最初始、尚未開始進入全然割據或者位置爭鬥時期的文化版圖縮影，同時也是文化生產場域自主動力的最初雛形；雜誌的主體以台灣在地的本地知識菁英與資產階級為主要的核心成員。在大陸文化人士漸漸隨接收官員渡台、而半山份子也夾雜在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僚體制中，開始參與文化生產之後，台灣這塊小島上的文化版圖則似乎進入繁盛而活躍的「百花齊放」的交融階段。各種不同的群體與動力逐漸參與其中，也漸漸改變了文化生產場域雛形的構成面貌。

## 2.2 官方報紙作為磨合面

與《前鋒》及《政經報》同時出刊的《台灣新生報》，是與前兩者的民營與雜誌性質都不相同的刊物；它是官方出資的報紙，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台灣新報》後更名而出刊，李萬居出任社長。此報不僅隸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同時亦作為「指導報館」以「收宣傳之實效」<sup>42</sup>；至 1947 年三月宣傳委員會結束，該委員會業務劃歸民政處主管<sup>43</sup>，五月份行政長官公署撤廢、省政府成立後，九月《台灣新生報》便改組為公司，按照公司法成立董事會，而李萬居改任董事長。

作為一個官方報紙，從《台灣新報》接收而來的《台灣新生報》的接收過程中即已有著接收資產瓜分爭議。《台灣新報》為日治時期六大報社結合而來<sup>44</sup>，其所持有的各項資本都相當豐富；根據許旭輝的研究資料指出，當時《台灣新報》的接收包括了現金存款 512772.971 元、股票 78625 元，另有債卷 428.10 元，以及大批的印刷器材、廠房等（許旭輝，2007：29），幾乎是接收了日治時期報業發展在科

<sup>42</sup> 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所編著《台灣一年來之宣傳》所言。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頁 34。

<sup>43</sup>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 年春季刊，第 53 期。

<sup>44</sup> 於民國 39 年出版的《台北報業一覽》中提及：「日據時期，日本政府為便於新聞管制，曾於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間，將台灣全境較著規模之六家報社：計台灣日日新，興南新聞，台灣日報，台灣新聞，東台灣日報，及高雄新報等合併為一台灣新報，至民國卅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童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國政府派員來台接收，舉行受降大典，該台灣新報即於同日為我政府接管，改組為台灣新生報，隸屬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委員會，並由即日起改版，創刊台灣新生報。」《台北報業一覽》，1950，台北：台灣報業公會，頁 38。

技與經營上的成果。雖然接收過程中由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介入，導致《台灣新報》各地支社的資產並未完全接收至《台灣新生報》中，而是進入了《中華日報》，不過就《台灣新生報》而言，仍然接收了北部最大宗報社資產作為戰後首要官方報紙之礎石。

李萬居是出生雲林的半山官員，隸屬中國青年黨而非中國國民黨，在政治派系上被視為是陳儀班底（陳翠蓮，1995：253）。中國青年黨有別於 CC 派、軍統、政學等各派系在國民黨內部相互爭鬥，是少數外於國民黨的黨派勢力團體；此政黨幾乎以留歐知識份子為主，創立於巴黎，李萬居即是在留法期間加入。陳儀治台班底中的青年黨人除李萬居外，尚有夏濤聲、沈雲龍等人。其中，除李萬居出任接管官方第一大報之外，夏濤聲即為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而沈雲龍則任宣傳委員會主任秘書。（戴國輝、葉芸芸，1993：96-100）幾乎可以說，陳儀在臺灣於政治宣傳方面的佈局，悉數以青年黨人為主而非國民黨人士。這個佈局在當時國民黨內鬥爭熱絡的時局中，顯得相當特殊，不過從上述接收過程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介入來看，此一佈局倒也並未因此讓《台灣新生報》置外於鬥爭風暴。不過從《台灣新生報》與國民黨中宣部對報館器材接收問題來看，可以確定的是，派系鬥爭的範疇是分別劃在不同報刊之間、各自割據，而並未以單一報刊作為論鬥平台。這意味著報／刊在此一時期是被視為資產以及發生工具看待，而未出現中立的、含容各家言論的平台。

而以組織成員來看，副社長黎烈文、總經理阮朝日、主編周自如、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編輯主任王白淵，以及包括在報社擔任記者的吳濁流與徐瓊二等，還有擔任主筆的李純青與沈雲龍，以及葉明勳、謝爽秋、費彝民。（吳純嘉，1999：54）無論是台籍人士或是大陸來台人士，悉數都有過參與報／刊的經驗：黎烈文來台是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的主編，李純青原任上海《大公報》主筆而費彝民則是《大公報》記者，葉明勳來台時是中央通訊社記者身份，謝爽秋在戰爭時期是國民黨軍方報紙《掃蕩報》的採訪主任（徐秀慧，2007：132）；吳濁流則曾於南京任《大陸新報》記者、返台後先後曾任《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報》記

者（吳濁流，1995：135-139），阮朝日則曾於《台灣新民報》任職販賣部長兼任廣告部長（李筱峰，1990：134），吳金鍊則是在1941年二月由《台灣新民報》改名成的《興南新聞》擔任政治部次長兼論說委員（李筱峰，1990：144-145）。也就是說，從這些成員看來，《台灣新生報》一方面匯集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報／刊的第一線成員，但同時也網羅台灣在日治時期重要報紙的主事人士；在報／刊空間中形成一個等國民政府與在地社會的接合。這樣的組成意味著幾個重要的特色：首先，在文化資本的整合上，同時匯聚了擁有中文能力與日文能力的文化人士的組合，一方面在戰後初期這個語言／文化典範轉換的特殊時期，也為「官方」與在地社會之間讓渡出緩衝空間；另一方面也使接收自《台灣新報》的《台灣新生報》有了承續的關係，等於《台灣新生報》在某種程度上承繼了《台灣新報》與在地社會的連結。因此，就代表官方的行政長官公署與在地社會這個面向來看，《台灣新生報》曾具有一部份接連橋面的功能。

另外在這些成員的政治傾向上，黎烈文與李純青在大陸時期即有強烈左傾色彩，而王白淵、徐瓊二則是在台灣本地左傾的文化人士。由於《台灣新生報》的發行宗旨是以中國本位、傳達政令、大篇幅刊載祖國文化與消息等，是「針對台灣殖民地歷史宣揚民族意識，以貫徹中國化的文化宣傳」，因此部份研究者認為，對王白淵、李純青、徐瓊二等左傾文化人來說，此一空間「還是頗受侷限，紛紛另行創辦左派刊物」（徐秀慧，2007：132-133）。不過實際上從人員流動的時間上來看，以王白淵來說，幾乎是同時參與在《台灣新生報》與左派刊物《政經報》中，或如徐瓊二亦是同時擔任了1945年十月十日創刊的《民報》記者與《台灣新生報》記者。也就是說，作為官方報的《台灣新生報》在文化生產場域的位置上佔據了無論是在經濟資本或者文化資本上都相對豐富的優勢位置上，其在戰後初期至二二八之前與左派人士或刊物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著彼此擠壓的情況，則必須更細緻地討論。從《前鋒》、《政經報》與《台灣新生報》這三個與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成立的同一時間創辦，若略先以此三個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創立的刊物主要成員來看，約莫可以整理成成下列的表格：

【表二】

	終戰前	終戰後（時間）		
陳逸松	資助《台灣文學》 山水亭（吳新榮、王井泉）	《政經報》	三青團	
蘇新	於日本參加共產黨	《政經報》	三青團	《人民導報》《台灣評論》《自由報》《台灣文化》
王白淵		《政經報》《台灣評論》《自由報》《台灣文化》 《新生報》		
蔣時欽	在上海	《民報》《自由報》 《政經報》		
呂赫若	編《台灣文學》 《興南新聞》 記者		三青團	1896 《人民導報》記者
李萬居		《新生報》		《公論報》
李純青	《大公報》主筆	《新生報》		《台灣評論》

製表：劉佳旻

在上述的表格中，描繪出戰後初期活躍於幾個主要刊物中的核心成員與後來的動向，其中可以看出台灣左傾知識份子的活躍是部份與隸屬官方的《台灣新生報》

與三青團聯繫在一起。而從這三個刊物的資金來源與其政治屬性來看，雖然資金分別來自不同群體——《台灣新生報》來自行政長官公署、《前鋒》則隸屬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與《政經報》來自台灣本地的實業家與左翼知識份子來看，這三個同時創辦的刊物，分屬不同的社會群體、同時也佔據不同的社會空間位置，但《台灣新生報》與《政經報》之間卻有著密切與頻繁的人員流動關係，其間雖然在人員上有所重疊，不過台籍菁英在《台灣新生報》主要是以擔任日文版的記者與編輯為主。因此 1946 年二月廢除日文版後，台籍知識菁英亦紛紛地離開《台灣新生報》。

### 2.3 日治時期的遺緒

創刊上早於《台灣新生報》的《民報》，在戰後初期是極為重要的報紙。其創刊時間甚至早於行政長官公署來台的時間，可以說是作為戰後每日發刊的「報紙」類中最早發刊者，同時也以實際銷售量<sup>45</sup>表現其在當時台灣社會的言論影響能力。

作為戰後最早創刊的民營報紙，《民報》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在於深植在它對日治時期報業活力的承繼關係。由於《民報》是「由一群過去參與《興南新聞》的人員共同促成」（李筱峰，1996：162；黃淑英，2003：19；徐秀慧，2007：156），

<sup>45</sup> 在陳國祥、祝萍的《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中僅以表格備註欄提到《民報》「銷路為各民營報紙之冠」（陳國祥、祝萍，1987：28），但並未提及實際的數字或者相關的佐證資料；而李筱峰則引用曾任《台灣新生報》記者、後進入《民報》的吳濁流的說法：「民報缺乏經濟上的基礎，可以說是個寒酸的報社，發行量僅及四五千而已，儘管如此，卻極受讀者歡迎...」（吳濁流，1988：173；李筱峰，1996：165），但李筱峰認為，雖然「發行量僅及四五千」、「卻極受讀者歡迎」的矛盾說法，是因為官方報多非訂戶的無費報（無須付費）而《民報》的發行量皆以有費報計算之故。（李筱峰，1996：166）按照這些說法，雖然無法確認《民報》的真實發行量，但是也已經可以推測即使在民營報紙中，《民報》的發行量與影響力應仍相當令人印象深刻。另外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黃淑英的碩士論文《民報與戰後初期的台灣》則引用《大明報》社長鄧進益的口述訪問記錄提到「《大明報》發行量據說曾高達三萬份，這個發行量可能沒有超過《民報》。《台灣新生報》的發行量在七萬三千份到十七萬五千份之間。依個人口述訪談推測，也許台灣人喜愛閱讀報紙的選擇上，《民報》可能直追官報《台灣新生報》，因此從《大明報》與《台灣新生報》的報份差異來看，筆者推估《民報》的發行量，可能在三萬份到七萬份之間，發行期間的起落變化則很難估算。」（黃淑英，2003：27），而何義麟在〈戰後台灣的印刷媒體與歷史記憶〉一文亦有相似的推估：「《大明報》也是一份重要的民營晚報，根據該報印刷場負責人大名印書館社長鄧進益先生表示，該報發行量最高曾高達三萬份，這個發行量應該沒有超過《民報》。也許以台灣人喜愛閱讀報紙的選擇上，《民報》高於官報《新生報》，但是從報份來看，第一大報應該是《新生報》。根據統計，因經濟蕭條的衝擊，《新生報》的發行從一九四五年十月的十七萬五千份，降到一九四七年一月的七萬三千份。從《大明報》與《新生報》的

因此許多論者在針對《民報》進行沿革耙梳的時候也幾乎都會提及「《民報》創刊的時候靠的是《台灣新民報》的班底」（黃淑英，2003：23）或者提到民報的「歷史沿革必須追溯到戰前的《台灣民報》」（何義麟，2006：163）等這樣確切的承繼關係。

簡單地概括這個耙梳沿革，《台灣民報》（1923.4）是在日治時期最早由台灣人自己出資所辦的刊物<sup>46</sup>，一開始是以半月刊、旬刊、然後進階到週刊的形式，並且總社是設立在東京、是由旅居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為主要組成，直至 1927 年七月才開始以週刊形式在台北發行，爾後擴大合併改組為《台灣新民報》、並於 1932 年四月十五日開始發行日刊，而 1941 年改名為《興南新聞》。（黃淑英，2003：13；）1944 年台灣總督府將六家報社包括《台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台灣日報》、《台灣新聞》、《東台灣日報》以及《高雄新報》合併為《台灣新報》<sup>47</sup>，戰爭結束後，行政長官公署指派李萬居接收這個《台灣新報》、改名為《台灣新生報》、成為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李筱峰，1993：162）。然而何義麟提到，在改組為《台灣新生報》的過程中，雖然「原本屬於《興南新聞》的資本、設備與人員，大部分都融入戰後的《台灣新生報社》」，但是「《台灣新生報社》

---

報份變化來看，筆者推估《民報》的發行人數，應該在三萬到七萬份之間，發行期間如何起落變化則很難估算。」（何義麟，2006：165）

<sup>46</sup> 而細究《台灣民報》，則有數位論者都提到《台灣民報》的起源應該追溯到東京留學生在一九一五年成立的「高砂青年會」、林茂生為該會首任會長；爾後此會易名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李筱峰，1993：28-29）但也有論者認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是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在林獻堂等人的領導下成立『啓發會』，不久改稱『新民會』，部分會員又另組『東京台灣青年會』，發行月刊《台灣青年》宣傳主張。」（黃淑英，2003：12）陳忻也曾於一九一八年擔任「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會長，同時也是「新民會」的創會者之一、同時也是《台灣青年》創辦者之一（李筱峰，1993：43-44）。這兩種說法暫且無法更為確切地指出究竟「新民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之間究竟是有先後脈絡關係、或為共時並存的團體，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灣青年》是由當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創辦。有論者認為《台灣青年》這份在東京創辦的刊物「逐步發展為《台灣》，《台灣民報》。」（何義麟，2006：163），也有更詳細的說法是《台灣青年》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在東京發行創刊號，但在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名為《台灣》，而發行《台灣》的雜誌社另外也發行了《台灣民報》半月刊；後來直到《台灣民報》從半月刊改為旬刊、爾後又改為週刊的同時，《台灣》雜誌停刊。至此時為止，《台灣民報》還是在東京發行的台灣人主導的報刊。直到一九二七年才獲總督府核准在台灣發行，這時的《台灣民報》仍然是週刊形式。（黃淑英，2003：12）

<sup>47</sup> 台北報業公會印行，《台北報業一覽》，台北：台北報業公會，1950，頁 38。

成立前，部分原屬台灣民報社的新聞從業人員，自立門戶創辦了《民報》。」（何義麟，2006：164）

從上述的轉變簡述來看，《民報》繼承的並非是日治時期的報業工業的物質部分，亦即並非是印刷術、印刷機器等等現代化設備，而是在日治時期受教育、有足夠語言能力以日語撰寫新聞報導的台籍知識份子的論述能力與論述傾向，亦即是日治時期的知識與文化資本。從黃淑英所整理的《民報》主要成員資料表（黃淑英，2003：22-23）中，表中包括社長林茂生、發行人兼總務部長吳春霖、總編輯許乃昌、總主筆陳旺成、編輯顧問暨副刊「學林」文藝欄主編楊雲萍、政治經濟採訪主任駱水源、營業部長林佛樹、基隆與台北支局長徐淵琛（徐瓊二）、以及三版編輯吳濁流等人，除了駱水源與吳濁流在日治時期是在先後在《台灣日日新報》、以及戰爭末期日本總督府合併而成的《台灣新報》工作、而楊雲萍在戰爭結束前並未有參與報社的經歷外，其餘皆或多或少參與過《台灣民報》、《興南新聞》等這一脈系報社<sup>48</sup>，而楊雲萍儘管並未直接參與在《台灣民報》系列報刊編務中，卻也經常在《台灣民報》上發表文章（林春蘭，2002：62-64）、在日本留學的時期也曾參與台灣青年會、並且與後來的《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在同一學校就讀（林春蘭，2002：74、78）。除了上述這些主要承繼自日治時期的報社人士之外，另外在吳克泰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他戰爭結束後曾在《民報》報館「打工」校對，並提到「我常常出錯，一再被最後核對的王詩琅先生糾正和提醒。」顯見當時王詩琅也在《民報》陣營中，但吳克泰自己後來則是加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

另外，《民報》記者中也有一部份是「並未參與 1920 年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年輕記者，以蔣時欽為代表人物；因此有論者將《民報》在視為一個兩個世代間的傳承，一方面承繼了日本殖民時期的媒體工作、參與 1920 年代的議會運動與 1930 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另一方面則有在戰後加入的新血、後來投入在二二八運動的參與之中。（黃淑英，2003：26）在這裡所主要希望進入討論的問題是，在理解

---

<sup>48</sup> 分別的相關參與為：林茂生並未直接地參與報社之中，但曾在 1930 年七月《台灣新民報》創刊十週年的時候寫了祝賀專文（李筱峰，1993：91-93）；吳春霖族是擔任了《台灣新民報》花蓮

《民報》的由來脈絡以及成員組成後，其橫向共時的空間相對參考位置是如何進行連結？這樣的視角將包括了上述主要參與在《民報》之中的成員在日治時期同時參與的團體、及從日治到終戰之後所經歷的社會轉變及其對這些轉變的回應，還有戰後所參與的團體組織。

從《台灣青年》到《台灣新民報》的核心成員的變革，大致都環繞著新民會<sup>49</sup>的成員包括林獻堂、陳逢源、王敏川、吳三連、羅萬俔、蔣渭水以及林呈祿等人為主。然而戰後《民報》成員，則是以林佛樹、黃（陳）旺成、許乃昌、林茂生、吳春霖等人為主。仔細地看戰後《民報》的成員內部的意識型態，其實並非高度一致，如許乃昌儘管曾經在《興南新聞》擔任支局長、早期也投入在東京留日台灣學生的政治運動中，但他在一九二零年代參加的並非是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核心的新民會、而是具濃厚左翼色彩的社會科學研究部（陳芳明，2006：129）。

也就是說，若欲將戰後《民報》放置在東京台灣留學生的政治運動組織新民以降、從《台灣青年》到《台灣新民報》這個系譜之後，似乎必須更仔細地理解從1920年中發刊的《台灣青年》到1941年改組為《興南新聞》的二十年中，這個報／刊系譜與成員的變化，以及與後來文化協會分裂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在這裡想要從終戰前的《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到戰後《民報》，希望更仔細地捕捉其間的連續或者相關承接、或者錯置的意義。

林呈祿在口述訪談中提及了《民報》的前身從啓發會（1918年成立）、新民會（1920.1.11成立），《台灣青年》（1920.7.16）、《台灣》雜誌（1922.4），《台灣民報》（1923.4.15）到《台灣新民報》（1927.8.1）的轉變。打從啓發會、新民會開始進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始，到《台灣青年》、《台灣雜誌》乃至於《台灣民報》的成立到改組為《興南新聞》，他都將之視為在日東京留學生的「民族運動」與「民族報業」（黃富三、陳俐甫，1991：28-29）。事實上這個民族運

---

港分社、基隆分社主任；許乃昌則曾任《興南新聞》的支局長；陳旺成則是《台灣新民報社》通信部長；林佛樹曾在《台灣新民報》擔任管理階層；徐淵琛則是《台灣新民報》的資深記者。

<sup>49</sup> 為日治時期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政治團體，以旅日學生與旅日台灣仕紳組成。（黃淑英，2003：12）

動從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開始，除了轉向報／刊生產之外，也成為「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推促力之一。

根據蕭友山的描述的文化協會成立過程（蕭友山、徐瓊二，2002：14），

為組織這個團體而奔走的人是蔣渭水，而呼應並且熱烈聲援的人士彰化的王敏川等人。這幾位先生見到本島民族運動逐漸向實踐運動發展，作為島內民族運動的指導團體，做為台灣人啟蒙運動的團體，企圖成立台灣文化協會。

以林獻堂為總理的文化協會，在蕭友山看來是「網羅了各階層上面的封建土地資產家和下面的工人農民形成一種單一陣線」（蕭友山、徐瓊二，2002：17），但是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的分裂中，

土地封建資產家、地主和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和極端民族主義者從文化協會中總撤退，結果，結合這一股勢力，另組成民眾黨。主要的脫離者有林獻堂、楊肇嘉、蔡培火、陳逢源、王開運、蔡式穀、蔣渭水、謝春木、林呈祿、彭華英、陳旺成、洪元煌、韓石泉等。（蕭友山、徐瓊二，2002：18）

從這份總撤退名單來比對林呈祿所描述的從新民會到《台灣新民報》整個一九二零年代、環繞著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的留日東京的台灣知識份子名單，也就是參與在《台灣青年》、《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乃至於《興南新聞》的成員，幾乎與這份總撤退名單重疊，包括林獻堂、楊肇嘉、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林呈祿、陳旺成、彭華英、洪元煌等人。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從新民會開始到《台灣民報》整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組織化、擴張的群體，大致上到《台灣民報》成為民眾黨的機關報為止都是以同一群基本成員為核心。

爾後在蕭友山或者林呈祿的口述中都提到，因為這個 1927 年的文協分裂，後來日治時期的《台灣民報》就轉向成為撤退出文協所另組的民眾黨的機關報（黃富三、陳俐甫，1991：32；蕭友山、徐瓊二，2002：22）。然而這個分裂在葉芸芸看

起來其實與東京台灣青年會——也就是《台灣民報》同一系譜的組織的分裂在時間上十分巧合。她提到，

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早在一九一五年已經成立了一個同學會性質的「高砂青年會」後來改稱為「東京台灣青年會」，一九二七年三月，「東京台灣青年會」附設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部」。這個研究部的前身是許乃昌、商滿生、高天成、楊貴、楊雲萍、林朝宗、林聰等人所組織的「台灣新文化學會」，經過積極的推動，「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會員在短其中大為增加……（中略）「社會科學研究部」的發展，終於導致了「東京台灣青年會內部左右兩派的對立。……（中略）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東京台灣青年會」在東京神田明治會館召開臨時總會，改選幹部，……（中略）選舉的結果，「研究部」成員以其新近發展的壓倒性生是當選幹部多人，非「研究會」的右派成員賴遠輝、沈榮、高天成、楊肇嘉……等十數人當場表示退會。「東京台灣青年會」之領導權遂歸「社會科學研究部」。（蘇新，1993<sup>50</sup>：137）

關於這一段「東京台灣青年會」與「社會科學研究部」、以及「東京台灣青年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組織「新民會」之間的關係，楊肇嘉有比較清楚的描述：

殆林獻堂至東京與台灣學生接觸後，遂於一九二〇年進一步組成了正式團體——新民會。……（中略）新門會的方針既定，不久即付諸實行：一、由林獻堂先生負責要求撤銷〈「六三」法案〉運動。二、成立《台灣青年雜誌社》（社址設於東京麴町區飯田町），刊行《台灣青年》，由蔡培火負編輯之責。三、派蔡惠如、彭華英、林呈祿等返祖國大陸與中國國民黨取得聯絡。嗣後又在新民會的指導下，成立東京台灣青年會。同時台灣青年雜誌亦擴大組織，並設支社於台北，聘蔣渭水先生負責支社業務。（楊肇嘉，2004：187-188）

<sup>50</sup> 此篇文章為葉芸芸所寫〈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一文，收錄在蘇新所著的《未歸的台共鬥魂》附錄。

而「東京台灣青年會」與「社會科學研究部」之間的關係，由於根據葉芸芸的說法，楊肇嘉是在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分裂中、出走的成員之一，因此在楊肇嘉的回憶錄中同樣記有這段經過：

本來「馬克斯」主義之在日本，早在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就在日本人的思想界中抬頭了，至今已逐漸侵蝕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群中，他們是以研究「社會科學」為糖衣，誘致一部份台灣留學生參加。首先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三月廿八日，利用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春季大會，通過了在青年會中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並對所有僑居日本的台灣人及留學生發出「檄」文。台灣青年會本為台灣留學生的活動中心，青年會中的幹部，多年來均係以「團結台灣青年，涵養愛鄉心情，發揮自覺精神及促進台灣文化的開發」為宗旨的。自我到東京後，我對該會的這種愛鄉活動盡全力支持，尤以對該會為中心的團結所有在日台灣青年的工作，……（中略）想不到自研究「社會科學」的先生們侵入之後，他們即視原有的舊幹部為右派，並展開急烈的鬥爭。……（中略）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青年會的幹部選舉鐘，雖在大批日警的監視之下，但大部分幹部席位，仍被左傾份子取而代替。右派幹部至此，遂不得不宣布總辭職，至一向做為台灣青年學生活動中心的台灣青年會，遂告解體。（楊肇嘉，2004：229）

由這兩段耙梳可知，東京台灣青年會與新民會的直接相關，以及其後東京台灣青年會與社會科學研究部之間的關係。由於他提到「就在我為這兩件事（按：即指東京的台灣青年會與台灣的文化協會分裂）深痛疾首的同一年中，在我的家庭中，也發生一件令我抱憾莫贖的事情，那就是我好意攜帶到東京就學的姪兒基業，不幸竟因肺癆膿胸病死亡！」可知，1927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而楊肇嘉的姪兒在1927年過世，那麼反推回去他在回憶錄中沒有明說的東京台灣青年會幹部選舉的「十一月」應該是指1926年的十一月。也就是直到1927年，東京台灣留學生的組織與報／刊變革應該如下表<sup>51</sup>所示：

<sup>51</sup> 參考上述葉芸芸、楊肇嘉、林呈祿等前文引用資料整合，由筆者所製。

【表三】

時間	組織：【報／刊】
1920 (大正十年) (民國 10 年)	成立「新民會」→ 指導成立「東京台灣青年會」、設置「台灣青年雜誌社」：【台灣青年】  (10 月) 成立「台灣文化協會」
1922	(4 月) 【台灣青年】雜誌改名【台灣雜誌】
1923	(4 月) 【台灣雜誌】持續發行、【台灣民報】創刊  (6 月) 「台灣青年雜誌社」改組為株式會社(資金四萬五千元)：持續發行【台灣雜誌】、【台灣民報】  (8 月) 「台灣民報出版社公司」成立(資金兩萬兩千元)：單發行【台灣民報】、【台灣雜誌】則以原株式會社繼續發行
1924	(6 月) 【台灣雜誌】停刊  (9 月) 東京大地震、【台灣民報】印好被焚、暫止發刊  (10 月) 【台灣民報】復刊、改為旬刊
1925	(7 月) 【台灣民報】改為週刊
1926	(7 月) 【台灣民報】獲准在台印行  「東京台灣青年會」→  (3 月) 附設「社會科學研究部」→ (11 月) 幹部改選、東京台灣青年會分裂

1927  (昭和二年)  (民國 16年)	(1月)【台灣新民報社】股份公司成立(資金三十萬元)(林呈祿說法)  (1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
1928	【台灣新民報社】股份公司於台灣成立(楊肇嘉說法)
1929	(1月)【台灣新民報】創刊發行(楊肇嘉說法)

製表：劉佳旻

文協的分裂是以原來參與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的王敏川與蔣渭水、蔡培火兩方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意見上的差異而造成。(蕭友山、徐瓊二：2002：18)從原來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系列由林獻堂主導的運動看起來，王敏川似乎是改變了立場、轉向左傾的陣營。陳芳明也在提到《台灣大眾時報》的編輯陣容時提及：「從這份名單可以發現，這是左翼陣營的一次聯合戰線。其中的靈魂人物王敏川，雖不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堅持者，但他對社會弱小者相當同情，同時對於台灣文化的提倡也十分熱心。由這樣的中間人物來主持聯合陣線，可說是恰如其份。」(陳芳明，2006：197)

於是在 1927 年文協、東京台灣青年會分裂以後，退出台灣文化協會的林獻堂、蔣渭水另組台灣民眾黨，並且以由《台灣民報》改組的《台灣新民報》作為其機關刊物；而另一方面，失去宣傳工具的台灣文化協會則另發行了《台灣大眾時報》。

從這兩個報紙後來的發展可以摸索出銜接到戰後的軌跡：屬於新文協的《台灣大眾時報》維持了兩個月、主要成員分別以與中共有好的上大(上海大學)派的蔡孝乾、翁水藻等人為主，以及親向日共的蘇新；並且受到台灣農民組合、以及在日本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支持。後來文協的第二次分裂，則出現了《新大眾時報》、走向極左的路線，最後因為台共內部的鬥爭而停刊。(陳芳明，2006：198-207)

而《台灣新民報》則在 1941 年改名<sup>52</sup>為《興南新聞》（黃淑英，2003：13），爾後在 1944 年則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報》、《台灣新聞》、《東台灣日報》以及《高雄新報》等五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吳濁流提到，合併之後，「他們特地留下了三個空位給興南新聞，於是羅萬俸、陳逢源、林雲龍等三人掛上了副社長、部長等虛位，其他一切都被納入『大每』（按：即大阪每日新聞報社）支配下。」（吳濁流，1995：135-136、139）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文協的分裂與東京台灣學生會的分裂，分別產出了《台灣新民報》與《大眾時報》兩個在階級立場與民族運動主張上差異的運動群體；儘管都是起自留日台灣學生的組成，但卻最終走向截然不同的主張方向。從這個過程來看，這兩個分裂開來的知識份子，在戰後投入生產場域，取消了先前分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針對反殖民運動的不同路線主張之後，會以什麼樣的立場、姿態與方式投入文化場域？在理解所謂「戰後的《民報》是繼承了日治時期《台灣民報》的精神」這樣的命題的同時，也必須要回頭去理解發生在《台灣民報》上的變化與場域位置上的移動，也就是在文協分裂以後，《台灣民報》系統轉向背離左傾的文化協會本身，而完全地確立了議會請願路線與左派階級鬥爭主張兩種路徑，並且同時在各自內部也並未就此穩定而一致地佔據這個分裂後的相對位置。就如前述，文化協會在經過 1927 年的分裂之後、於 1929 年發生第二次的分裂（陳芳明，2006：206）；而在 1927 年脫離文化協會而另組民眾黨的所謂右翼人士，亦有著「代表封建土地財產加地主和民族資本家立場」與「代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民族主義者」兩個「缺乏一致利益」的集團（蕭友山、徐瓊二，2002：52）而產生內部的矛盾。

若試著以歷時表格描繪這整個人員動態，大致如下圖所示：

---

<sup>52</sup> 這段改名的過程，參考台灣總督府編，《台灣日誌》，台北：台灣總督府，1919-1944 年。台北：南天，1944。

【表四】

1920  (1921)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台灣民報（1923）】  林獻堂  王敏川／連溫卿（社會主義）、蔣渭水（民族主義）、蔡培火（改良主義） <sup>53</sup>		
1927  (分裂)  昭和二年	新文協  王敏川、連溫卿  【台灣大眾時報（1928.5.7）】	台灣民眾黨 (排除)  蔡培火、蔣渭水  【台灣新民報（1928）】	
1929  (分裂)	新文協  【台灣新大眾時報】(開除)  (1930.12.1)	邱德金、陳旺成、陳逢源、陳炘、洪元煌、葉榮鐘、彭英華、謝春木、蔡式穀、林幼春、楊肇嘉 <sup>54</sup>	
1930  昭和五年	連溫卿  楊貴	民眾黨 (蔣渭水)  逐漸與無產階級政黨接近 <sup>55</sup>	(蔡派) (除名) 地方自治聯盟  蔡培火、蔡式穀、楊肇嘉、林獻堂

製表：劉佳旻

若回到戰後《民報》的創立，可以發現除了總主筆陳旺成之外，包括了社長林茂生、總編輯許乃昌、編輯楊雲萍、吳濁流，都並未在參與在此一鬥爭內部。那麼戰後《民報》的整個組成是如何與終戰前的《台灣新民報》（或者後來改組成爲的《興南新聞》）一脈搭接起來？

<sup>53</sup> 這行路線上的分配，是參考蘇新的說法。（蘇新，1993：101）

<sup>54</sup> 這排名單是引自蕭友山描述的台灣民眾黨（蕭友山、徐瓊二，2002：54）

<sup>55</sup> 根據蕭友山說法。（蕭友山、徐瓊二，2002：62）

林茂生在文化協會初期確實參與在協會其中，他是作為擁有漢學家學的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留日爾後由林獻堂推薦而進入台灣文化協會擔任評議員，打從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初期就參與其文化活動擔任西洋歷史講習會的講師（李筱峰，1996：34-35）。在李筱峰論述林茂生的著作中，曾尋著一只摺扇上頭提有林茂生、林幼春、蔡培火與林獻堂四人分別以耕南（林茂生）、南強（林幼春）、峯山（蔡培火）與灌園（林獻堂）署名提字，並且時間推斷<sup>56</sup>為 1925 年。從上頭台灣文化協會分化表格來看，林茂生顯然是與撤退出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的的民族主義及改良主義派較為親近。而陳旺成從上表可知，他是台灣民眾黨的創黨員老，但在台灣民眾黨內部的地位則顯得有些微妙；他屬於反對蔣渭水傾左路線的民眾黨員（蕭友山、徐瓊二，2002：63-64），但也並未參與在蔡培火等人另組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中。（黃淑英，2003：78-79）

另外如許乃昌，則是屬於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成員，並且是參與在左傾傾向的「社會科學研究部」中，並為創始的主導者之一。（蘇新，1993：133；林春蘭，2002：78）許乃昌在組織社會科學研究部之前，在 1922 年進入上海大學就讀、屬於台共「上大派」的成員之一，與蔡孝乾、楊貴等人在 1926 年組成作為「社會科學研究部」前身的「新台灣文化學會」（林春蘭，2002：75-76）。因此，在戰後《民報》的成員中，許乃昌是相較而言與其他接近台灣民眾黨路線的林茂生、陳旺成相當不同。而受他力邀進入《民報》擔任編輯的楊雲萍（林春蘭，2002：80；黃淑英，2003：23），則亦是參與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之中，林春蘭認為，楊雲萍雖然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中擔任過評議員，但是 1928 年社會科學研究部開始「轉化為實踐的學生運動團體以後，楊雲萍則未列主要成員組織分配名單上」，而是進入了文化學院的文學部、將關懷的重心轉向了文學（林春蘭，2002：82）。也因此，在文協與東京台灣青年會分裂前後，乃至於後來文協內部一系列鬥爭，都不見楊雲萍參與在其中。由此，楊雲萍應該可以算是早期左傾、而後則政治色彩較為淡薄的知識份子。因此雖然楊雲萍是受左傾並有台共身份的許乃昌力邀而加入戰後《民報》，但他在《民報》中的傾向與位置較不如許乃昌那樣有明顯的差異感。

<sup>56</sup> 李筱峰提及，題字上所附之時間為「乙丑年」進而推斷為一九二五年。

吳濁流在 1944 年進《台灣日日新報》。他曾提及作為官報的《台灣日日新報》，當時只有三位台灣人記者，除了吳濁流本人，另外還有後來也參與在《民報》中的駱水源。然而吳濁流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的時間甚晚，不久《台灣日日新報》便受總督府的新聞統制而合併入《台灣新報》之中。（吳濁流，1988：135-139）他跟駱水源同樣並非是來自《台灣民報》系統的報社成員。

從上述對戰後《民報》初創成員來看，除了徐淵琛、林佛樹與吳春霖確切是從《台灣新民報》系統出來的報社成員之外，林茂生、陳旺成則是屬於在台灣民眾黨內部、對立於蔣渭水一派的不同陣營，環繞在《台灣新民報》所屬組織之邊緣；而楊雲萍、駱水源與吳濁流則大約可以算是在政治傾向上並未參與上述環繞著《台灣新民報》系統而進行的鬥爭之中。因此，戰後《民報》在組成上其實並非完全「靠的是《台灣新民報》的班底」，而是在其中也摻雜著並非來自《台灣新民報》系統組織核心的成員、甚至還有在日治時期屬於敵對陣營的成員，這些邊緣的成員或許多少也沖淡了戰後《民報》對《台灣新民報》的繼承關係。

也就是說，戰後《民報》主要繼承的是《台灣新民報》的文化資本，在位置上政治運動傾向已經明顯減少，除將原來帶有日治時期民族運動累積的資源重新面向新統治政權與之對話，轉向關注人才登用、選舉等戰後問題；同時也將民族主張轉化為台灣文化重建的議題，進而關心教育、語言政策等議題。

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戰後最早的日刊報紙，《民報》卻是一個沒有日文版的報紙。作為當時高發行量的大眾讀物，且創刊於官方接收之前，卻在語言上使用當時僅少數人能使用的中文；即使略晚出刊的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亦保留了日文版面，為什麼作為民間報紙，《民報》卻全報使用當時並不熟通的中文？一方面以讀者來考量，顯然《民報》所面對的讀者並非是一般大眾，而是「懂中文的知識份子」，排擠了在日本教育下累積文化資本、熟通日文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戰爭甫結束即能熟通中文，這一方面除意味著曾到中國留學的知識身份之外，同時也展示了漢學淵源的仕紳所持有的文化資本。並且，使用中文的姿態也意味著對戰後政權轉換後場域內發言位置佔取的積極態度。

### 小結：

在本節中可以發現，1945年十月創刊的雜誌顯示，在接收的最初期、甚至於接收工作尚未能正式展開時的台灣社會中，在地知識菁英群體之間已經有著彼此差異化、並競逐著與官方／中文典範親近、結盟的位置。而一方面官方面對在地社會，則仰賴著知識份子作為與在地社會的橋樑。在這個時期，語言能力作為象徵展示的意義極大，是作為競逐的資本之一而非分配的資本。擁有中文語言能力者則更有資格作為發生、投入文化生產空間；但是實質上來說，此一時期語言政策尚未落實、報刊亦保留有日文版，語言尚未普遍化成為一分配的資本。反而在日治時期與日本統治機構熟識與否、以及面對日本時抱持什麼樣的態度則影響到在接收時期被擺置的位置，也就是以「民族認同」作為主要的彼我區分。

1945年底前，所有的報刊都相對來說較接近官方與在地社會彼此遭遇的磨合面，而活躍在此一時期的動力除了官方來台的政治機構與文化人士之外，台灣在地流動的動力則相對十分複雜，掌握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本的社群皆投入其中；其中，日治時期延續至戰後的知識份子的動態為接收初期最重要的活力。這群知識菁英的主要特徵是擁有在日治時期所積累的文化資本，其中部份同時持有社會象徵資本。

另外，作為接收工作的準備時期，即使是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也有四分之一的日文版面作為與在地群眾溝通的橋樑，亦即，此一時期官方單位仰賴在地知識份子的成份極高，而對在地知識菁英來說，亦將中文視為其在日治時期所積累之文化資本轉兌的必要條件、以避免所持有文化資本貶值，同時也亟欲透過語言優勢來親近政治資本所帶來的資源。因此，雙方在此一時期積極結盟合作，為統治政權與在地社會的接合鋪路。

### 第三節、統治支配範疇劃分：官方／非官方的分化之始

時序進入 1945 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後，不同於前一時期正在為接收工作進行與在地的連結與部署，文化生產空間開始進入了「官方」與「非官方」的群體相對來

說較為分明的時期。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接收工作正式開始進行，因此這條界限的劃分也是透過接收工作來劃分、建立統治權的支配範疇與被支配範疇分界。從報刊上來看，「官方」／「非官方」的兩個集團架構與其內部刊物與組成群體的增加，說明了這兩個空間內部漸漸地出現了分化的傾向。

以官方集團為例，在 1945 年十月廿五日行政長官公署剛成立之時，僅有《新生報》一個依附著行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紙，其中內部是以長官公署宣傳部為中心，隸屬宣傳委員會；另一支高度依附政治身分的群體是三青團，但是三青團與 1945 年十月廿五日所發行的報刊中，卻並非是與官方所屬的《新生報》關係較密切，反而是與以台籍左翼知識份子為核心的《政經報》在成員上較有交疊的狀況。而以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與教育處的官員為主要核心的《現代週刊》與作為三青團團刊《台灣青年》這兩個刊物的成立，則把「官方集團」內部的分化更為清楚地呈現出來，說明了三青團與行政長官公署內部打從一開始就不是站在同一「官方」陣線（陳翠蓮，1995：229-231）。以《現代週刊》的成員來看，這個代表「官方」的群體組成已經從有「半山」轉變為幾乎全是純大陸來台文官的態勢，也就是繼半山份子在戰後之初來台協助官方進行社會各方面接收工作之外，未有台灣身份、沒有台灣經驗的大陸文官也漸漸進入了台灣這個社會的文化生產空間中。而相對於官方，1945 年底發行的《新新》則獨樹一格展現了相對於官方也相對於前述至目前為止的「台籍知識份子」樣貌，而展現出這一時期相當特別的大眾文藝面向。

這個時期的特色是，各種官僚機構進駐、大陸文官群體逐漸進入文化生產場域，其所佔據的位置還不如 1946 年明確，不過已經形成一股動力擾動 1945 年十月官方統治機構與在地知識份子結盟初形構的文化生產空間。而派系鬥爭的問題亦漸漸伸展至外圍政治團體、發展團體刊物作為發聲管道。而台灣在地知識份子的活躍情況，則開始從左翼知識份子拓展開來，從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作為文化議題思考的階段似乎略微進展到思考文藝、文化形式的討論，或說至少這類的刊物開始出現，意味著政經問題不再是文化刊物的唯一關注。本小節的主旨在於描繪 1945 年底這

段銜接了戰後初期與 1946 年分化時期的中間轉場；此一時期大陸文官隨政治官僚來台，一部份大陸知識份子也進入台灣後，文化生產的空間從哪些面向上展開？而官方／非官方的界限雛形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切劃下來？並且以綜合／大眾化的文藝刊物出現、中文語言使用差異兩條軸線來分析 1945 年底幾個重要刊物彼此間的分化跡象。

### 3.1 大眾文藝面向初現

在 1945 年所有的刊物中，《新新》展現了非常特別的面向，是在此一個階段裡面不會出現過的刊物類型。在新竹的一個國語補習班<sup>57</sup>裡面討論創立起來的《新新》，總編輯黃金穗曾經是東京岩波文庫的編輯，編輯則為新竹「新高漫畫集團」的成員，包括陳家鵬、王花、葉宏甲、洪朝明等四人。鄭世璠在〈滄桑話「新新」〉一文中提到，《新新》在 1946 年受到通貨膨脹影響，原來在新竹的編輯部無法繼續維持營運與印刷，因此在郭啓賢與林丕讓兩人的幫助下找到資金援助與編輯部的所在地，才得以遷移至台北繼續發刊。（鄭世璠，1995：8<sup>58</sup>）。（郭啓賢，《兩個時代》）以組成來看，《新新》的文化資本來自日治時期，資金來自社團同人。不過較為特別的面向在於，其所繼承的文化資本並非相應自結合政治運動的政治資本或者意識型態的知識資本類型，而是 1945 年中最早有著高度文藝特質的刊物。

以《新新》的內容來看，前兩期的日文比例較高，創刊號中除騰雲生〈孫里嘉·自然和人性觀——歐洲政治思想史的一片〉與刊載於同頁的冷雲〈解放〉一詩，以及楚岫發表之〈獻給台胞〉一詩外，便是江肖梅辨明中文錯別字〈何士奇〉一文，以及〈那是一定的〉一篇國語講讀<sup>59</sup>，其餘皆是日文文章，包括龍瑛宗日文小說

<sup>57</sup> 在鄭世璠為《新新》覆刻版做簡介與導讀的〈滄桑話「新新——談光復後第一本雜誌的誕生與消失」〉中提到，《新新》最初始的創辦討論，是發生在黃澤祖的家裡。黃澤祖在日據時代研究京劇，因此在終戰初期開設國語補習班，教導二十歲至五十歲不等的學生學習國語。（鄭世璠，1995，1）

<sup>58</sup> 由於《新新》覆刻版所附此文並未標註頁碼，因此此頁碼為筆者為引註方便而自行編寫，以標題署名該頁為頁 1。

<sup>59</sup> 〈那是一定的〉一文以鸚鵡與騙子的故事，說明「那是一定的」這一句子的使用。在小故事後附以日文解析「那是一定的。」這一句子之語氣及意思。《新新》，創刊號，頁 19。

〈汕頭から来た男〉（從汕頭來的男子）。第二期的十四篇文章中，則僅有三篇為中文，包括吳瀛濤的詩〈浪漫的短章<sup>60</sup>〉以及江肖梅的獨幕劇本〈再生〉。第三期開始，不僅〈卷頭語〉以中文寫就，刊登中文文章的比例上也有增加，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強<sup>61</sup>；到第四、五合併期，中文篇章在數量上已經超越日文<sup>62</sup>；第六期則在中日文比例上約回復一比一，並且從其中一篇〈日文廢止は時期尙早<sup>63</sup>〉（日文廢止的時期尙早）的小篇幅評論來看，與行政長官公署決議將於當年十月廿五日開始廢止新聞紙雜誌附刊日文版有關。第七期則是在中文比例上繼續略微縮減，成二比三左右的比例<sup>64</sup>。

《新新》在內容取向上包括文學作品發表與文學作品翻譯，同時也有藝術評論；有別於其他刊物的最大特色是，由於擔任編務的「編輯」是一群漫畫家，因此刊中固定了一個「S.S.漫畫集團同人」的欄位，刊登包括洪朝明（洪晁明）、葉洪甲、陳家鵬、兒王華等人的漫畫。另外，《新新》也刊登包括李石樵、陳春德、鄭世璠等人的繪畫或者版畫作品，部份穿插文間作為署名插圖，也有部份集刊同一頁<sup>65</sup>。另外，《新新》也並非是一全然文藝傾向的刊物，除文、藝作品與評論刊登外，從第三期開始也有「科學小話」的欄目，刊載短小篇幅的科學新知，如第二期介紹了新型直升飛機與原子分裂機等，第四、五合刊期亦有〈科學珍聞〉小欄。簡而言之，《新新》是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刊物，涵蓋藝術、文學、科普、漫畫等各領域的文藝作品。

從《新新》的創刊與內容，我們可以試著捕捉到另外一個文化資本轉兌的面向：即非政治／知識菁英階級，並非以民族認同、社會政經情狀等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為關注，而是親近大眾的文藝面向。若以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域理論來看，大眾

<sup>60</sup> 此處為原文之「浪漫」二字推測應為「浪漫」之印刷誤植。

<sup>61</sup> 若將第三期中兩個「科學小語」與〈史達林的繼承人〉這類常識小框各算成一篇文章，並且不含中日對照的一詩一文的話，第三期中的中／日文比例為九比十。但是由於上述的常識小文章在篇幅上短小，因此整體版面上來看約略接近三分之一。

<sup>62</sup> 數量上是中文十一篇，而日文七篇。

<sup>63</sup> 《新新》第六期，頁 16。

<sup>64</sup> 數量上中文八篇，日文十二篇。

<sup>65</sup> 如《新新》創刊號的頁 15 為鄭世璠〈傷痕〉及林之助的〈晴日〉，頁 18 為李秋山〈花鳥〉、林之助〈刈入〉與王花〈燒跡〉。

文藝面向在整個文藝生產空間中，文化資本的位置上相對地低，不過以《新新》在戰後的位置來看，其所具有的文化資本並未因意圖親近大眾而低於其他文化議題、政治經濟類型的文化刊物；不過其在政治或經濟的資源上並非是以與新政權的內部派系結盟來獲取，而是以同人性質的方式經營，這點則使其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供給顯得薄弱。這一方面使之在內容上，較無具典範、展望或其他文化權威式／指導性質的發言，另一方面在存續上則相對較無保障。以鄭世璠整理的出版年份來看，《新新》自 1945 年十一月創刊後，維持約一年，直至 1947 年一月為止；亦即，在政治上受到大波動的時候，作為民間刊物《新新》確實只能跟《民報》或者《人民導報》一樣停刊，不過從其同人性質<sup>66</sup>以及資本薄弱的情況來看，或許也正因它並不倚賴政治權力所分配的資源，因此並未在 1947 年前受到派系鬥爭所波及，而得以安然存續到 1947 年初。

以組成的成員來看，《新新》屬於高度地區化、並與在地資源結合、聚集在地知識、文化人的組成，已經不再僅是以像「左派知識份子」或者「台籍土紳」這樣以社會階層區分的群體來構成雜誌報刊的主體，而是出現了有創作特定文類、以地區為主要範疇來籌辦雜誌的群體。就這點來看，「非官方」或者「民間刊物」的標籤中所含納的社群也以開始複雜交織，以地域作為圈範。而這個以地區為主要範疇的社群，是從學習國語的「補習班」社群而來；從這個目的上，也可以察覺《新新》在雜誌目的上，是建立在較偏以傾向「新」或者「現代」這樣的意識之中，因為參與在國語補習班中、並且能有足夠動力商議「為更進一步了解祖國的文化」並更進一步行動進行籌資與雜誌發行的在地社群；同時小篇幅的「科學新知」這樣的欄目，也意味了試圖以貼近日常生活的新知識作為刊物的內容之一。因此，《新新》在宗旨上，本身就與之前《政經報》、《前鋒》這樣在政治意識上較為強烈的刊物不同，儘管也有許多對時事的評論檢討，但是也試圖透過內容上的多元發展作為偏向綜合性文化雜誌的取向。這種主題上的差異也與其他台籍知識菁英所經營的刊物不同。

---

<sup>66</sup> 亦即以群體為單位、自籌刊物所需資金的小型刊物社團。在同人性質的刊物中，作者亦是讀者。

其實這樣高度地區化的刊物，在行政長官公署來台前，楊逵所創辦的《一陽週報》同樣也與台中在地知識份子進行了集結。然而《一陽週報》的複本至今難以尋得，因此無法在本研究中進行更為詳盡的分析。透過《新新》與《一陽週報》這樣的區域性報刊的討論，顯示出或許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圈，已經開始萌生以地區為活動範疇來集結的知識活動。然而相對於台北資源的集中，在台北以外以外的其他地區，如《新新》所投射出來新竹地區知識份子的活動、與楊逵在台中所進行的知識份子集結，在區域性差別的基礎上，似乎有著不同的樣貌。

### 3.2 機關刊物的語言使用差異化

1945 年其他的刊物包括《台灣青年》則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刊、當時擔任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的吳克剛所創辦的《現代週刊》，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所創辦的《大同》等。（莊慧惇，1998：33）這三個刊物全以中文寫作，與略早的《新青年》、《新風》、《新新》——不論如前文所述在比例上究竟以日文為多或者中文為多——的中日夾雜，《台灣青年》、《現代週刊》與《大同》則毫不猶豫使用「全中文」書寫、發刊，其間的差異究竟何來？在 1945 年戰爭甫結束、正值接收與政權交換的時期，整個台灣的文化圈也經歷著「語言轉換」的窘境，然而從終戰後的刊物發行看來，就算是交雜存有日文版的民間刊物，同樣也有中文書寫的內容成份。使用中文書寫的人並非僅只大陸來台文人，也有極大一部份是在台灣受日本教育但是自學或者家學漢學者，也就是在台山、大陸來台文人之外，本省籍文化人士也包含了能以中文或者僅能以日文寫作的文化人士。

陳培豐曾經提到，1940 年統計台灣社會裡頭所謂的「國語熟練者」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一的程度，但是這個數字若比對周婉窈所定義的出來的「國語熟練者，」則包含了在國語講習所參與短期授課的社會人士，究竟能不能算是「熟練者」則顯得有灌水之餘（陳培豐，2006：402）；而若以日本完全廢止漢文的一 1937 年來看，當年一月廢止公學校的漢文科、五月廢止漢文欄（陳培豐，2006：411），漢文在大眾媒體與教育體系中消失的時間不到十年；至終戰後國民政府廢

止日文欄的 1946 年十月，十年裡頭台灣經歷從全日文環境轉向全中文環境<sup>67</sup>，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說是台灣社會是在十年中於兩種語言之間全然轉換，不如說這個社會的實際狀況其實是一直都處在一個雙語言的語言狀態中。

一個刊物作為傳播媒介，其同時使用中文與日文、以及單僅使用日文，其表達的含意與目的應該要如何解讀？

同時使用中日文來編寫刊物，一方面是傳達了台灣與所謂祖國之間跨越隔閡鴻溝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切實地顯露台灣社會文化圈中的語言使用狀況，確實有一部份作者在戰爭剛結束的創辦刊物中馬上表現了中文書寫能力，有一部份則是很快速地學習中文，但同時也有仍然使用日文創作的作者。然而若以推想刊物的讀者角度來看，這些刊物究竟預設的讀者大眾是哪些人？

若比對《台灣青年》、《現代週刊》與《大同》，可以明顯地發現中文使用上的差異。在《大同雜誌》<sup>68</sup>中使用的語言相較於《台灣青年》或者《現代週刊》都較不白話，摘錄〈創刊詞中〉前兩行如下：

回憶乙未割台以來。我台灣脫離閩省治下。隸屬日國統轄。其間恰如籠中之鳥。釜中之魚。如何苦痛。如何受虧。茲已無須多贅。即自九年前中日啟釁。我台灣同胞。亦任征役師旅之勞<sup>69</sup>。

相對於這類使用，同樣摘錄《現代週刊》的發刊詞如下：

現代週刊社同仁為什麼要編印現代週刊呢？今天創刊號出版、想對這一問題表示一點小小的意見。……（中略）破壞是革命過程的一個階段、破壞之後、必須繼之以建設、革命才能完成。總理說『所以一革命而造成此有破壞無建設之

<sup>67</sup> 這裡說的是大眾媒體、教育體制裡頭的規定，也就是在官方政策下所制定的語言空間，不包括私下與在家中使用的語言。

<sup>68</sup> 目前筆者僅能尋得一期，即《大同》雜誌創刊號，1945.11.12 發行。

<sup>69</sup> 《大同》雜誌，創刊號，1945.11.12，台北：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頁 1。

局、致使中國人民受此八年之痛苦矣。然而民國之建設一日不完全、則人民之痛苦一日不息。而國治民福、永無可達之期。』<sup>70</sup>

從上述兩段創刊詞比對來看，在語言上前者較為文言、而後者則相對而言較為白話；兩者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從今天的使用看來都屬於貧乏，但是前者僅以句點作為句讀，相對而言後者使用了問號、在引用話語時使用雙引號，較接近今日使用的標準標點符號。

在這裡本研究並非想要深究語言的使用與標點符號的變革，而是試圖在這些雜誌的閱讀中所顯露出來的語言使用差異裡拉出一條線索。《大同》的語言使用，偏向的是台灣一直透過家學傳遞、私塾等延續的傳統漢文，而《現代週刊》表現的則是大陸五四以後的白話運動成果。

創刊與作者群中，除《民報》社長林茂生之外，還包括張再紀、謝娥、黃得時以及林景元。根據編後語中所言，稱張再紀為「老教育家」，謝娥則是「素以台灣民族革命鬪爭聞」，稱黃得時「文壇錚錚」<sup>71</sup>。謝娥除了在當時已經參與在三青團<sup>72</sup>以及左傾團體人民協會台灣支部<sup>73</sup>中，也開設「康樂外科醫院」並在《大同》雜誌上頭刊登廣告<sup>74</sup>，因此身兼了供稿者與供資者雙重身份。從這些發表的作者來看，《大同》雜誌所聚集的多半是在台省籍人士，然而同樣為本省籍文化人士的刊物，《大同》卻特別地彰顯了傳統漢文的刻意使用，與早前幾個刊物如《新新》、《新風》、《新青年》有明顯的區別。在這邊中文使用成為一種展示並且成為彼此位置區辨（differentiate）主要元素，展現出不同來源的文化資本。在 1945 年底時，這種區辨還尚未成為文化位階高低的判別標準，主要是因為所謂的「標準國

<sup>70</sup> 《現代週刊》雜誌，創刊號，1945.12.10，台北：東方出版社，頁 1-2。

<sup>71</sup> 《大同》雜誌，創刊號，1945.11.12，台北：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頁 38。

<sup>72</sup> 在《民報》1945 年 10 月 19 號第一版的新聞〈艋舺服務隊 昨日成立〉中提到，「三民主義青年團艋舺社會服務隊結業典禮、於十八日下午二時起、在台北老松國民學校大禮堂舉行、...（中略）隊員代表宣誓魏德清氏、劉克明氏、黃金生氏、謝娥女士等就三民主義青年之社會服務大揮熱辯至五時唱呼蔣委員長萬歲、於是典禮告終。」

<sup>73</sup> 〈人民協會台灣支部 昨日盛舉發會式〉，《民報》1945.11.18，第二版。

<sup>74</sup> 《大同》雜誌，創刊號，1945.11.12，台北：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頁 41。

語」尚未透過機關與機制化建立起來，直到 1946 年國語推行委員會建立體制化的國語教育與教材，這種區辨才產生文化位階的意義。

也就是說，在這個過渡期中，儘管尚未進入品評優劣的階段，但刊物在這個文化空間裡面的文化產物確實已經開始出現「分化」的情況。

《台灣青年》作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刊物，是「以宣揚主義國策、闡明祖國與台灣歷史關係、即對台灣復原工作之提供與貢獻、既報導時事團務活動等、而堅定台胞之信仰為宗旨<sup>75</sup>」，並且「感宣教工作亟須加強」，因而出版。在政治光譜上來說，儘管三民主義青年團與行政長官公署的關係在黨政派系上看並不能算是親近<sup>76</sup>，但是應仍作為廣義上的「官方」組織視之。在內容上<sup>77</sup>，《台灣青年》的大部分內容都與主義政令的宣揚有關，包括整個刊物的第一篇文章即為〈目前台灣革命青年的行動綱領〉、創刊號中即有三篇對孫文的介紹、以及整體上大量的對青年的呼告，如〈台灣青年與青年中國〉<sup>78</sup>中「我懇切地告我青年台胞、國家需要我們、時代需要我們、只要我們肯出力、肯流汗、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輝煌的！」等語句，或者〈談女青年組訓〉<sup>79</sup>的結語為「女青年台胞們，你們更應該祝禱祖國，更應該高歌自己，因為五十年的枷鎖，今日已得解脫的機會，此後應如何來創造新的史實，負起領導的責任，務使無數的姊妹都挺著胸、步向革命的大道」等，都是作為以青年為對象的團部機關刊物的精神喊話，是一個宣傳功能大過文化空間或文藝生產的刊物。

《現代週刊》則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創辦人吳克剛在創辦當時是擔任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參事，後來兼任過行政長官公署土地委員會委員，後任台灣省圖書館館

<sup>75</sup> 摘自〈台灣青年半月刊徵稿簡約〉，《台灣青年》創刊號，頁 28，1945.11.12。

<sup>76</sup> 陳翠蓮提到，三民主義青年團來台籌辦分團的主要人物張士德是出身「軍統」人員，他們在陳儀與接收官員入台前即搶先來台著手佈置發展，並且開始著手與本土的文化、政經等界重要人士接觸甚至進行台灣團部的籌組，因而「不受陳儀所喜」，一度欲予以解散。（陳翠蓮，1995：230）

<sup>77</sup> 以筆者所得第一、二、三、四、七期，以及八、九合併刊，共六期內容為主。

<sup>78</sup> 《台灣青年》創刊號，頁 17-19。

<sup>79</sup> 《台灣青年》第二期，頁 13。

長<sup>80</sup>。因此，《現代週刊》儘管不是任何機關的刊物，但由於創辦人的政治身份之故，在其作為「民間刊物」的位置上，與官方關係似乎還是呈現了較為親近的距離。從創刊號的發文作者來看，幾乎清一色都負有公職，如邵冲霄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范壽康是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還有擔任台灣博物館館長的陳兼善、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兼主任秘書沈雲龍、後來<sup>81</sup>擔任台北市長游彌堅，以及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助理秘書丁名楠，以及台灣省訓練團教育長韓鋪仙。第一卷後幾期甚至到第二卷中，上述作者加上行政長官署參議張皋、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同時擔任工署參議與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長的姜琦，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委魏建功<sup>82</sup>等，都仍是《現代週刊》常見的作者群。

因此，儘管《現代週刊》在〈發刊辭〉中自稱為「現代週刊社同人」，然而這個同人社群的一個極大共通性便是公職身份，尤特以宣傳委員會與教育處為主。無論是以報紙或者雜誌來看，在組織成員上清一色地以公署官員為主、但並非以機關刊物的身分、同時又以台灣社會的文化建設論述作為雜誌主軸的刊物，《現代週刊》是最早的。同時，《現代週刊》在維持的時間上雖然僅一年，但是以週刊形式出刊，也維持了三十二期，在一九四五年創刊的報刊雜誌中算是生產期上維持得較長、存續力較高的雜誌。摒除《新生報》、《民報》這類日報之外，客觀存續時間較《現代週刊》長的只有《新新》<sup>83</sup>，然而《新新》以月刊的形式出版十五期，在生產效率上是不那麼密集。

黃英哲在討論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論述的時候，將重點擺置在行政長官公署機關政策上，包括國語推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以及台灣省編譯館上，而仔細比對他所論述的三個架構台灣文化重建的機構中，除台灣省編譯館的籌備、成立是在較晚的 1946 年六月到八月期間（黃英哲，2007：89）外，國語推行委員會成員與宣傳委員會成員與在《現代週刊》發表討論文章的作者大量重複，這一點我們一方面

<sup>80</sup> 此為參考蕭富隆等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輯錄（一）》，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頁 43。

<sup>81</sup> 《現代週刊》創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游彌堅擔任台北市長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後。

<sup>82</sup> 以上所有官職皆參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輯錄（一）》。

<sup>83</sup> 從創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開始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共維持一年三個月，發行 15 期。

可以釐清《現代週刊》作為同人刊物在場域中的位置：它以高度親近政治資本的位置從旁協力文化重建的概念推展。

因此在閱讀、分析《現代週刊》的同時，本文接下來也試著與黃英哲對文化重建的討論進行對話，以釐清《現代週刊》在文化重建的論述中扮演的角色與位置。

《現代週刊》在發刊辭中所謂的「現代」與「新」，是立基在相對於處於日本殖民控制、與世界／中國的隔絕與脫離的狀態，因此這個刊物的主旨與其說是指向「現代」，其實所真正指向的是脫離日本化／皇民化，重新中國化、世界化、台灣化。發刊辭中這樣說：

如果所謂文化是只一切生活的樣式、那末台灣的文化、幾乎是「日本化」了。台灣既經光復、既經屬於中華民國、這樣的文化、是應該改變的、台灣應該是中國化、台灣的文化、應該是中國的文化。而所謂中國的文化、當然是和世界的文化、不能脫節的、因此台灣現在應有新的文化、應有新的文化運動。<sup>84</sup>

在這邊這個「中國文化／台灣文化／世界文化」之間的等式，究竟代表的實質意涵是什麼，在發刊辭中還沒有明確的說明；但新的文化運動所要做的是革除「日本化」的文化，則是可以確定的。邵冲霄在〈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人〉<sup>85</sup>中提到「中國尚未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還未成為現代的國民」，其原因是尚未完成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實現。邵冲霄提到一方面要積極建國「纔可生存於現代、纔可真正配稱現代的中國人」，另一方面，「使中國成為現代的國家，顯然是非從科學入手不為功」，同時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建設工業化。

從邵冲霄的文章看來可以發現，「中國的文化」與「世界的文化」是接軌於「現代」這個概念上，落實在民主化、工業化的實踐以及建國的工作上。而創刊號中另一篇談及「現代」的文章，是主編吳克剛的〈現代精神〉<sup>86</sup>一文；這個文章比

<sup>84</sup> 〈發刊辭〉，《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年12月10號，頁2。

<sup>85</sup> 邵冲霄，〈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人〉，《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年12月10號，頁5-6。

<sup>86</sup> 吳克剛，〈現代精神〉，《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年12月10號，頁3-4。

發刊辭更爲清楚地定義了「現代」，他認爲，在過去奴隸是爲了幫助文明生產的順利而存在，現今則因爲「產業革命」之故而進入新的時代：

控制自然、利用自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方法。不再奴役別人、也能衣食無缺、幸福康樂、是我們這時代的精神。

若將吳克剛論現代精神與邵冲霄論現代中國的概念，綜合上發刊辭中的文化運動，其實就可以看出《現代週刊》的「現代的」、「新的」文化運動其實是定調於銜接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就是一方面是科學的、物質發展的，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最終指向中國成爲「現代的國家」，也就是完成三民主義建國。范壽康在〈從儒家的思想說到三民主義〉中則更爲明白的將孫文的三民主義上銜孔孟的仁義，將三民主義定調爲中國文化正統的接軌。也就是說，對三民主義／民主化／民族主義、現代化／科學發展的擁護，大約是《現代週刊》的主要基調。

然而這樣一個脫離殖民立場上的刊物中，發文作者們對台灣的「日本化」所抱持的看法卻各略有些爲差距。沈雲龍在〈台灣青年的教育問題〉中提及：

過去台灣青年在「日本化」的教育方式之下、一切生活風尚、都已十足道地的日本化、這其中固然有許多好的習慣、如守秩序、重禮節、著制服、和刻苦、耐勞、儉樸……等等、應該加以保留和繼續訓練、但另一方面、日本青年喜歡出入咖啡店、吃茶店、跳舞場……等等不良風尚、台灣青年也非常普遍地模倣著。同時、據傳臺胞中嗜賭及吸鴉片的惡習也依然存在著、我認爲實在有加以取締和糾正的必要！……（中略）五十年來、台灣同胞日日受其所散播文化思想上的毒素的麻醉與薰陶、在不知不覺中、對祖國逐漸離心、……（略）在無形之中起了「潛移默化」作用、因而養成一種崇拜日本和自卑心理。同時，在起居生活和衣食祝方面也根本發生變化，一切都模倣日本學習日本、一步一趨、無不東施效顰。<sup>87</sup>

<sup>87</sup> 沈雲龍，〈台灣青年的再教育問題〉，《現代週刊》創刊號，1945年12月10日，頁14。

在沈雲龍的描述中，台人對日人的「東施效顰」、「崇拜心理」，其實就是一種奴化。「日本化」對台灣的影響是根本地使台灣成為效倣日本文化惡習的奴隸。

然而整體來說，基於對「現代」的定義，整個《現代週刊》對於台灣的「日本化」所抱持的態度沒有沈雲龍所表達出來的那樣負面而具譴責性，夏濤聲在〈新中國與新台灣〉<sup>88</sup>中就認為日本對台灣的建設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儘管這個建設並非是以台灣為本位的建設，而是以統治便利而進行的建設；而游彌堅在〈台灣人應該重新認識台灣〉<sup>89</sup>中也同樣承認：

日人為著發揮他的高度的榨取、對於物質上確有不少的建設。例如電力的建設、堪稱遠東第一、利用這電力、台灣全部可以電化、可以工業化、這點將來對祖國的經濟建設、當有莫大貢獻。

當然這個前提是建立在承認日本對台灣的建設是基於統治、以及殖民壓榨的立場上，所帶給台灣的物質建設。也因此這類觀點的文章對於日本對台灣人在語言上與思想上的控制亦持以譴責、並且認為應該要儘速使中國與台灣在語言文字上得以溝通。

這樣的發言分歧中，乍看雖然只是對殖民狀態看法的差異，但這個差異卻可能指向對「現代」概念詮釋的截然兩極看法。一方面，若將受日本殖民的台灣社會視為奴化，而現代化便是脫離受日本殖民的文化狀態，則去奴化、並且中國化將被視為是除去殖民痕跡的現代化過程；然而另一方面，若不將受日本殖民後的台灣社會視為被奴化的社會，反而認同日本殖民歷程中的一部份其實對台灣社會進行了非積極性的現代化，那麼此刻重新中國化的「現代」與「新」的思維做法，則會是立基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的基礎之上，甚至這個日本殖民現代化所剩餘的現代化建設，可能成為祖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經驗。

<sup>88</sup> 夏濤聲，〈新中國與新台灣〉，《現代週刊》第一卷第五、六合期，1946年1月1日，頁2-3。

<sup>89</sup> 游彌堅，〈台灣人應該重新認識台灣〉，《現代週刊》第一卷第五、六合期，1946年1月1日，頁21-22。

因此，從《現代週刊》中可以閱讀到既有著「官方」成分的政治資本帶來的價值觀，可是又處在機關界線之外的發言立場對台灣文化重建基礎的議題發言。這樣的既官方、又非官方的微妙空間，也幫助我們理解在「官方」的框架限定下，其實還存有彼此區分、分化的作用力存在。《現代週刊》在繼承「科學」與「民主」概念、以及在非官方的同人刊物位置上銜接行政長官公署文化政策的企圖中，卻同時也暗示了來自官方教育機關、宣傳機關之中對台灣文化重建的分歧態度，同時這個對台灣「日本化」是現代化或者奴化的差異態度，爾後也持續在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台灣社會中發酵。

從行政長官公署來台前的《民報》，到與行政長官公署同時成立的《台灣新生報》、《前鋒》、《政經報》，到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以後同年的《新青年》、《新新》、《新風》、《台灣青年》與《現代週刊》等，在 1945 終戰的這一年，雜誌報刊的蓬勃活力明白地展示了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中撤離與注入的動力。一方面可以看見本地知識份子與仕紳共集資金與人力來創辦刊物，另一方面也看見從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僚體系中出線、原來是台灣人出身的「半山」官僚，以及大陸來台文書官員等不同身分的刊物創辦人，各自懷著不同的目的對報刊投注經濟與文化能量。在這裡面，以本地知識份子與仕紳共集資金人力的做法相對來說較能清楚地勾勒出整個刊物的走向與目的宗旨，透過資金與人力的來由，可以判斷得出這一刊物的基調與在文化生產場域中的位置與可能發展走向；然而相對而言，帶有官方身分的參與者與刊物則在此一時期出現模糊難以判斷的界限，一方面所謂的「官方身分」中所帶有的多樣性也干預或者介入創辦刊物的目的與立場，而資金的來源也難以判斷出官方援助中的內部鬥爭部份。整體來說，1945 年這一時期的蓬勃，確實更動了日治以來的文化版圖使之進入重整的階段。

### **小結、文化生產空間的初形構：高度流動的空間**

整體來說，1945 年底前的報／刊空間展現出各種動力的高度流動。這個高度流動的景況一方面來自新支配政權、新文化社群的進駐，另一方面也是在地政治與文化資源在政權轉移後的重整。此一時期的動態意味著整個社會在承納新統治政權

時在結構上的重組與改變，而對官方政權來說則是為穩固政權而所進行的準備。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在地知識菁英與半山人士成為這個轉換承接過程中的重要橋樑。1945 年底前，各種不同單位、不同派系的官僚人士進入台灣，在落實其治理於在地社會之前，先拉攏了在地知識菁英以及具有台籍出身的半山人士，做為一暫時的接合面；而也因新舊政權交替間的縫隙，使台灣社會無論是在政治發言或者文化生產的層面都出現了彈性空間。

這個彈性空間展現在幾個層面：台籍知識份子在日治時期所累積的文化資本並沒有因語言典範的轉換而馬上貶值，相反地，政權接收的準備工作中，官方系統必須仰賴這些累積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來與在地社會接軌。因此包括《台灣新生報》的日文欄或是《民報》承繼了日治時期議會請願運動的動力等，都給了台籍知識份子在文化生產中的位置與空間，並且在生產場域中是以位居相當仰賴政治資本的位置作為刊物軌跡的起點。也因為這個空間，使得文化生產場域產生分化的雛形與可能：一方面在官方一端透過不同單位彼此的區辨而使得同樣作為政治資本的再生產，其產物卻展現出不同的文化價值信仰；另一方面在地一端則是透過語言轉換來轉化日治時期所積累的資本，加上與新政權的結盟而維持其社會意見領袖的地位。

因此，1945 年底前，三大群體在台灣社會中彼此遭遇，我們可以看見資本結盟的情形大過資本競逐。其中左翼知識份子的活躍與資產階級知識菁英的活躍有點不同：普遍來講，左翼知識份子的流動性高於資產階級知識菁英，亦即，如蘇新、王白淵等人參與多個報刊的創辦，而資產階級知識菁英則主要以《民報》為基地。而左翼知識份子所主導的刊物儘管與官方有結盟關係以親近政治資源，但是政治資源並非是穩定而能倚賴的生產條件；這從左翼刊物前仆後繼的創辦情況可以看出來。相對地，資產階級知識菁英則由於擁有經濟資本而相對生產穩定。亦即，在左翼份子與官方暫時接合結盟的面向上，清楚地展現出政治資本在當時作為一個文化生產的元素，在性質上也因派系鬥爭以及將與在地知識份子結盟視為一種戰略式的實踐而顯得並不穩定。

此一時期因為彈性縫隙的存在而開始萌生文化生產分化的可能性。在這裡的分化指的是關心各種不同文化主題的刊物漸漸地浮現，雖然在主要的議題上還是以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民族認同問題為首要，但是當接收工作開始、政權穩定之後，文化自我定位的議題也逐漸地成為這個報／刊空間中主要的議題。而在語言的使用上，無論是中文或者是日文的使用，在 1945 年底都還保有其各自的文化信仰價值；在語言政策開始徹底落實、體制化並且標準化之前，語言還沒有成為決定文化位階的關鍵元素。不過從 1945 年的刊物使用語言上來看，對在地知識份子來說中文學習或中文表達亦成為他們參與新政權支配的文化場域下重要的依據。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見一個使用中文的文化生產場域依附著政治資本與日治時期即累積的經濟資本兩種管道正在成形，並從其使用語言與討論議題來看，整個報／刊空間對話的對象正是文化生產所依附的政治資源握持者，而並非是一般庶民大眾。

1945 年底正式進入接收工作後，下一章我們將進入 1946 年，亦即接收工作後期的台灣社會，討論這個看起來正在生成、但卻高度依附政治資本的中文文化生產場域。1946 年後，派系鬥爭漸趨和緩、政治資本的位置佔取暫時落定，因此報／刊空間同樣漸趨於穩定開拓的階段。而在這樣的階段中，文化生產空間與政治場域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變化？

### 第三章、分化的萌發、競逐與空間的消散

對應於 1945 年接收工作展開之後，權力系統內部鬥爭爭相進駐，權力系統尚未與在地社會產生直接治理的關係而導致的混亂與空間，1946 年的台灣社會則相對在政治場域因接收工作逐漸告一段落而顯得相對穩定；這同時也意味著彈性空間的壓縮與消弭。在 1946 年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方面環繞著官方不同單位之間的派系鬥爭，產生了許多外圍團體，包括柯遠芬與軍警系統的外圍團體正氣學社（1946 年三月成立）、以日治時期民眾團體組合結盟而成的民眾協會（1946 年一月成立）及其後所改組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四月成立），以及後半年堪稱二二八事件前最大型、結合官民雙方文化份子、與台灣編譯館關係密切的台灣文化協進會（1946 年六月成立）。這些外圍團體同時也與報／刊空間緊密結合，以之作爲發言、發聲據點。

另一方面，1946 年行政長官公署的政策趨向亦影響著整體報／刊空間的傾向：1946 年初的國民參政會與省參議會選舉以及年初發生的漢奸檢舉逮捕事件，影響並劃分了官方與在地社會的彼我界限，使得 1946 年的權力場域內部結構展現與 1945 年截然不同的氣氛。相對於前一年爲接收與在地連結工作能順利進行而展現出的官方／在地結盟態勢，1946 年開始官方權力系統對在地知識份子的態度開始展現出不再友善，而並各自據於一角、彼此對立的景況。

也因如此，前一章所描述的 1945 年末的報／刊生產空間，展現的是政治權力接收在地社會的過程中，報／刊空間內部高度流動的結盟合作關係；並由於政權治理在文化生產空間中刻意遺留的空隙，以及由於政權本身內部的分化與鬥爭的不穩定現象，使得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報／刊生產都開始有機會出現分化、發展內部異質來相對定位的現象。在 1945 年中包括《民報》、《政經報》、《新生報》，到年末的《新新》及《現代週刊》，也顯示出在內容上從社會政經、民族認同的政治、運動等文化議題上開始繼續衍生出「文藝」的面向。進入 1946 年後，儘管政治社經作爲文化社會條件的議題在 1946 年的報／刊空間中仍然持續發展，但政治

空間對文化生產空間所產生的支配作用也逐漸產生變化：不同於 1945 年左翼知識份子以作為台灣知識份子意見領袖的角色與政治場域親近、結盟，1946 年開始，標籤為「官方」／「政治」的動力開始壓縮左翼知識份子的發言與生產空間，這點從左翼言論刊物的發刊生命總是很短暫，而作為生產者的知識份子則高度集結流動的現象可以看出來。這類的刊物包括了一月創刊的《人民導報》、二月的《新台灣》、六月的《台灣評論》、七月的《新知識》，以及十月的《自由報》等。

而在權力結構方面，至 1946 年開始派系位置趨於相對穩定，亦即進駐台灣的派系都找到結盟的節點、佔據了所屬的發言位置，並且透過外圍團體與機關刊物拓展屬於自己的發言空間。而投射這一狀況的便是 1946 年開始報／刊創辦數量的穩定攀升：從 1946 年到 1947 年為止，每個月都有一到兩本雜誌創刊<sup>90</sup>。（見【附錄二】）相對於 1945 年底一個月一口氣有至少兩個到三個雜誌創辦、至 1946 年前即有十個報／刊創辦的狂熱風潮，1946 年到 1947 年二月為止的報／刊生產進入了穩定增加的攀升期。並且以雜誌的創辦單位來看，不少是以官方機關為單位發刊的刊物，如一月份由行政長官公署以政治宣傳為目的創辦的《新台灣畫報》、二月由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掌的《中華日報》、三月由台灣省訓練團發刊的《台灣訓練半月刊》、四月則有正氣學社創刊的《正氣月刊》、五月隸屬軍團的《和平日報》、六月由台灣廣播電台發行的《台灣之聲》、八月由省圖書館出版的《圖書月刊》、九月則是半官民文化刊物《台灣文化》，十月則同樣是宣傳委員會的《台灣月刊》等。

不同於 1945 年底的報／刊以人員流動作為整個報／刊空間的活力展現，結盟多過於敵對；1946 年的報／刊作為單位的發言空間，開始產生做為政治工具彼此擠壓的功能面向。

除權力系統分化部署、對立結構浮現之外，1946 年的另一個影響著文化生產場域的動力是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與台灣編譯館的成立；前者象徵著日語使用空間逐漸被壓縮、消弭，以及中文典範化的趨勢。儘管 1945 年已經有部份在日治時

---

<sup>90</sup> 此為單純以本研究所縮限的樣本來看。實際出刊的數量比本研究附錄表中所列舉的數量更多。

期或者更早即已學會中文、有著漢學基礎的知識份子或者戰後積極學習中文的左翼份子率先投入報／刊生產，並且也因此一語言基礎而在接收初期扮演官方與在地連結的重要橋樑，但在 1945 年底即使是官方報紙《新生報》都設有日文欄來看，日語使用在全面禁用日文、廢止日文欄之前都還能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在地輔助動力，直至 1946 年十月廢除報紙日文版、嚴格禁用日語為止。

因此，自 1946 年開始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前的這段時間裡，文化生產空間究竟如何從 1945 年異質分化逐漸展開、充滿可能性的態勢急轉直下，則必須從 1946 年的官方語言政策、因選舉而亦顯鮮明的官方／非官方界限界分，以及各種外圍團體成立與位置佔據進入討論。因此，本章從一月份的《人民導報》展開，試圖以報／刊拉出各條異質分化、對立的軸線來建構接收後、二二八事件前這段時間的政治權力空間與文化生產之間的結構變化，進而透過以下的發問討論在這個政治權力空間逐漸壓縮文化生產空間的一年中，文藝生產所展現的面貌與可能性：（一）在接收工作逐漸完成、權力結構部署大致底定的政治條件下，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選舉<sup>91</sup>對當時台灣社會內部各政治、文化群體之間產生的影響為何；（二）語言轉換的政策以及日文欄廢止對文藝發展產生條件上什麼樣的限制以及文化資本的增／貶值變化，而台灣知識份子又是如何應對；（三）此一時期文藝表現在上述條件下所展開的面貌為何；（四）看起來仍然持續蓬勃擴張的報／刊空間在整個文化生產脈絡中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而其蓬勃擴張的現象背後又在哪些條件上受到限制？最重要的是，從這些報／刊空間在「蓬勃發展」結構條件上的轉變，包括各種資源再分配條件的限制下，是否發展出文化生產空間的自主性？

### 第一節、從政治空間開始的分化與資本競逐

接收工作自 1945 年十一月正式開始，約至 1946 年四月告一段落。因此 1946 年的政治空間中展現出的即是原屬國民政府的政治空間與台灣的政治空間正式交融的樣貌。本節中將分為三個方向來討論這個政治空間的變化，以及隨即帶來的社會

---

<sup>91</sup> 包括 1946 年二、三月間的全省現市區鄉鎮代表、直轄市的市民代表、四月十五日進行的省參議會選舉、八月補選的國民參政員以及十月補選的台灣省國大代表。（李筱峰，1986：17-39）

結構改變；此三個方向分別為 1946 年各種外圍團體的建立、二月開始的民意代表選舉，以及文化機構包括國語推行委員會與編譯館的創辦。這三個面向分別代表了政治空間的結構分配與文化生產主要引導群體如何在生產空間中作用。換句話說，它們描繪出文化生產在 1946 年的結構性條件，亦即，所謂的官方群體透過政策以及官僚機構的衍伸團體，透過接收過程佔據位置，在「台灣文化重建」的名義下重整文化生產所需的政治資本分配。

### 1.1 外圍團體的政治鬥爭與結盟

在外圍團體建立的面向上，主要討論以掌握軍警系統的警備總部為核心的正氣學社，以及集結日治時期重要民眾團體、但被視為中統派（C.C.派）外圍團體（陳翠蓮，2003：248）的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兩個單位。討論這兩個社團，主要是因為這兩個社團延續了 1945 年接收進駐的派系鬥爭現象；另外，這兩個團體與報／刊空間亦建立十分緊密的關係：正氣學社在 1946 年三月成立後，隔月即創辦《正氣》半月刊，而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中則吸收了左翼、右翼台灣知識份子中活躍於報／刊空間的人物，如《政經報》的陳忻，《人民導報》社長與《自由報》創辦人之一的王添灯，《民報》主筆陳旺成等人<sup>92</sup>。

自 1945 年至 1946 年為止成立的民間／非官方團體並不只這兩個，1945 年十月謝雪紅即已招集舊時左派份子於十月成立「人民協會」，並隨後亦組織農民組合舊成員成立農民協會。（陳芳明，2009：194-196）而部份日治時期參與抗日的學生亦幾乎於同時成立了「台灣學生聯盟」。（陳翠蓮，2003：241）不過這些團體都在 1945 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公佈之後皆解散。也因此，在《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頒佈後才成立的正氣學社與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的意義格外重要，此一脈絡意味了這兩個團體都是與官方間接相關、受到官方治理的認可，亦即意味著這兩個團體內部都因持有政治資本而得以擁有相對於解散團體的活動空間。

以正氣學社來說，儘管《正氣》半月刊在第二期的刊前語〈正氣論壇〉<sup>93</sup>中宣稱該社「並沒有和政府或任何機關發生任何關係」而是「超然的」。然而在 1946 年改為月刊後的第四期中所刊出的〈正氣學社第一屆社員大會速寫〉中所提及的與會會員、核心幹部等，卻又出現了許多身負官銜的成員。除發行人本身柯遠芬即是警備總部參謀長之外，另外如台灣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警備總部副參謀長范誦堯、長官公署秘書王策、中央通訊社社長葉明勳、省訓練團主任秘書林舒謙等，另外尚有多位警總幹部，如第二處處長林秀欒、第三處處長盧雲光、警總秘書邱濬、田叔達等<sup>94</sup>；從其幹部社員的組成大半以軍統重要成員柯遠芬所掌管的警備總司令部成員為主、並且正氣學社的社員大會是在警備總司令部中山俱樂部舉行<sup>95</sup>，可以看出此一團體與警備總部之間的緊密關係，因此以此刊物主導人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的正氣學社也被視為是國民黨內部軍統派的外圍團體（陳翠蓮，1995：247），由此可以略推一二。以正氣學社來說，其組成多半為大陸文書官僚，僅有林茂生為台籍知識份子。正氣學社不同於 1945 年底的官方／在地社會結盟、不同的官方團體拉攏不同位置的台籍知識份子建立在地連結的情形，其無論是結社或者創辦刊物，主要都以擴大自身影響力，特別是軍統派影響力為主，帶在派系鬥爭中競逐文化發言權威的意味。

亦即，透過對正氣學社的檢視與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原來在接收時期還以拉攏、結合在地知識份子或半山份子作為橋樑的派系團體，已經開始透過衍生外圍團體於台灣駐根，以自身所持有資本進行位置佔取以及勢力拓展。這同時是官方內部派系團體的分化跡象；透過在當地社會直接建立發言渠徑，並從言論中凸顯與其他團體之間的差異，強調自身的特殊位置。稍後我們將繼續談到正氣學社這樣一個外

<sup>92</sup> 民眾協會改名為台灣省政治建設委員後，原來主導的長官公署參議張邦傑已經離台，繼而由蔣渭川及其他八位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理監事包括張晴川、蔣渭川、王萬德、黃朝生、李友三、王添灯、張邦傑、陳忻、施江南、陳旺成、潘欽信。（陳正茂，2009：115）

<sup>93</sup> 在《正氣》半月刊中並未如其他刊物有一個稱為〈刊前語〉的欄位，但是在刊前語通常放置的位置，也就是目錄之後第一篇以雜誌社立場所寫的時／政論一類的評論文章，在《正氣》半月刊中放置了以刊物本身為名的〈正氣論壇〉評論。本研究將這個論壇視為與刊前語同一性質。不過在第一卷第二期中，目錄之後放置的並非直接是〈正氣論壇〉，而是鄧文儀論文天祥一文。（《細說中統軍統》，361-365）

<sup>94</sup> 《正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46.12.1，台北：正氣雜誌社，頁 85。

<sup>95</sup> 同上。

圍組織的成立與所屬刊物的創辦，及其與台灣省訓練團及《日月潭週報》之間的相互譏鬥，如何使刊物成爲官方內部政治鬥爭工具以及發言競逐的空間。

而另一政治團體「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則來自與正氣學社截然不同的脈絡。從《人民導報》對其前身「民眾協會」的短評，可以清楚梳理這個社群團體是以日治時期的民眾團體集聚而成<sup>96</sup>，包含了台灣革命黨、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陳正茂，2009：112）早自戰後接收初期，舊時參與日治時期民眾運動者，無論是採取左翼的群眾運動或者右翼的議會請願運動路線，都持續著終戰前的活力，在接收尚未正式開始前即已籌備政治團體。前述所提及的謝雪紅與人民協會、農民組合，延續的即是戰前左翼、共產黨的力量。而右翼知識份子同樣幾乎在同時開始籌備成立政治團體，原以「民眾黨」爲名，意圖創立屬於台灣人的政黨<sup>97</sup>。後由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勸促，並在《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頒佈以後，於1946年一月成立「台灣民眾協會」，後於同年四月召開臨時大會，改組爲台灣省政治建設委員會。從「台灣民眾協會」到「台灣省政治建設委員會」，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是蔣渭川；因蔣渭川與中統派之間的關係以及省黨部在該會創辦過程的介入，普遍認爲省黨部與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將之視爲中統派的外圍團體。

台灣省政治建設委員會的組成，從一開始以「民眾黨」爲名籌備以及蔣渭川爲核心來看，或許可以視爲有意延續日治時期台灣民眾黨的精神；同時從其試圖籌組「屬於台灣人的政黨」主張來看，也是日治時期右翼知識份子的議會請願運動精神的延續。不過打從一開始籌組成員中就有農民組合的簡吉、以及後來加入、在身分上屬於台籍實業家的陳忻、王添灯來看（陳正茂，2009：112-116），「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包含了不同身分的台籍人士，而非以左翼知識份子或者右翼知識份子

<sup>96</sup>「昨日本省舊時各民眾團體舉行結合典禮、成立民眾協會、據說此後的活動方針、在於協助政府建設新台灣。今日之台灣以不復爲舊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以今後台灣的民眾運動、也自與以前不同。台灣人已經是主人翁、今後台灣的民眾運動、應該是建設性的、自主性的。台灣民眾協會之宗旨、在於協助政府建設新台灣、爲我們所贊成。」〈短評〉，《人民導報》，1946年1月7日，第一版。

<sup>97</sup>根據陳正茂研究，當時蔣渭川、連溫卿、簡吉、潘欽信、王萬德等人曾在劉啓光帶領下拜會民政處長周一鶚，表達台灣人籌組政黨的意願。（陳正茂，2009：112）

為界分。並以其後十月成立、以半山份子如丘念台、黃朝琴、劉啓光、林忠等人組成「台灣憲政協進會」來看，台籍知識份子與半山份子之間在政治傾向與立場上的競逐逐漸鮮明。這個政治位置的競逐是否特別與 1946 年一連串從縣市參議員、省參議員到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有關，似乎可以進一步論述。

不過不管是正氣學社或者是台灣省政治建設委員會的存在，都在透過政治位置上透過彼此差異區辨（如正氣學社之於台灣省訓團，以及政治建設委員會之於憲政協會）而產生群體傾向上更為細緻的分化，不僅在政治資本上競逐著發言位置，同時在這個政治資本決定文化生產位置的時代裡，使得文化生產空間的結構與位置分配變得不穩定。1945 年底大陸文書官員陸續到職，政治團體與在地知識份子、半山份子之間急切結盟以政治資本與象徵資本相互交換的情況已有所改變。

## 1.2 參議員選舉與政治資本分配

1946 年中縣市級以上的民意代表選舉，包括了三月底到四月初的各縣市參議員選舉<sup>98</sup>、四月十五日由各縣市參議會選出的省參議員、八月十六日由省參議員選出國民參政員，以及十月卅一日選出制憲國大代表十七名等四次選舉。（李筱峰，1986：17-37）這些選出的民意代表中，有不少同時也在報／刊生產空間中活躍，如《民報》在報導台北市參議員選舉結果的時候，同時提到「本報同人二人當選」<sup>99</sup>，而《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亦當選台南縣省參議員，《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則在台北市省參議員名單之列、蔣渭川與《民報》主筆陳旺成一同名列台北市省參議員候補名單中。而《政經報》的陳逸松、《前鋒》的廖文毅，《民報》社長林茂生、台灣廣播電台台長暨《台灣之聲》社長林忠則當選國民參政員。（李筱峰，1986：26-31）從這些名單裡面可以看出民意代表與當時幾個重要報／刊之間的緊密關係。並同時，這些名單也與「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高度重疊，不只展現了報

<sup>98</sup> 根據李筱峰資料整理顯示，每個縣市選舉日期不一，分別從 3 月 15 日（高雄縣、台北市、貧東市）至 4 月 7 日（台北縣）為止。（李筱峰，1986：20-21）

<sup>99</sup> 報導中提到「當選者中，中山區吳春霖氏、乃本社總務部長。駱水源氏本社採訪課副課長。」〈女參議員登場 本報同人二人當選 台北市參議員選舉結果揭曉〉，《民報》，1946 年 3 月 16 日第二版。

刊空間、民意代表選舉以及政治外圍團體三者的交集點，同時也明白昭示此一時期的報刊空間與政治空間之間的相互倚賴的情況。

而這批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與報／刊重疊的名單中，也可以很快看見作為民意代表的自主發言權力與辦報開展自主發言空間兩者在意圖上相當接近；亦即，除了林忠與李萬居所屬刊物是官方機關報／刊外，其餘都是 1946 年一月前即已創辦報刊、拓展文化生產空間的民間資本報刊如《民報》、《政經報》、《前鋒》以及《人民導報》，亦即是前章中所述在接收初期即以積極投入報／刊生產、除了自身持有高度經濟資本之外的《前鋒》，其餘則仰賴與半山人士、台灣仕紳資本以及官僚政治資本的結盟進入文化生產空間佔取位置。也就是說，從選舉的名單看來，這些原來在 1945 年底以結盟進行位置佔取的群體，開始逐漸改變策略，選擇以投入選舉來提高所佔有位置以及政治資本的主導性。因此，進入 1946 年後，報／空間與政治空間之間的相互倚賴性質已經有所不同，並非是透過與官銜所象徵的政治資本結盟來獲得文化生產空間的被動位置，而是轉向透過選舉來獲得具有較高自主性的民意代表位置。不過在這一現象下，也可以發現，無論是與政治資本結盟或者透過選舉取得民意代表位置所必須持有的資源門檻仍然很高，無論是王添灯或者陳逸松，他們都是自身即擁有高度經濟資本與高社經地位的社會意見領袖，無論是投入報刊生產或者是選舉，同樣需要自身原有資本的投入。也因此在此一波民意代表選舉中看不到左傾知識份子的投入。

民意代表選舉所產生的作用必須放在台籍人材登用的脈絡下來看。學者陳翠蓮曾經整理出比較台灣總督府所屬機關各級官員籍貫配比與行政長官公署及所屬機關各級官員籍貫配比，發現行政長官公署在公務員總數上較總督府大為減少，因此儘管台籍人士任用的比例相較於日治時期已有所提升，但台籍人士仍然多居中低階層，中高級文官階高度集中於外省籍人士<sup>100</sup>等現象，另外加上 1946 年一月頒佈的檢舉漢奸條例所造成的「省內外隔閡」問題，實際上除了省內外理解的隔閡外，同

---

<sup>100</sup> 包括一級單位正副首長十八人中僅有宋斐如一人是台籍，長官公署所屬十六個機關中僅有兩位台籍人士，十七個縣市首長中，唯台北市長黃朝琴、新竹縣長劉啓光、高雄縣長謝東閔是台籍人士。（陳翠蓮，1995：74-75）

時也是透過政策進而壓抑台籍人士日治時期所累積社會象徵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正當性；亦即，在日治時期透過親近統治系統而交換、累積社會地位的台籍仕紳，其所擁有的象徵資本在缺乏政治正確的正當性情況下漸次貶值。而因不諳國語而不受任用的台籍文官，則同樣受語言政策落實而使其所持有的文化資本貶值。

因此，同時參與在報／刊空間與民意代表選舉中的台籍人士，一部份是原來即有官銜、已經擁有政治資本者，另一部份則是同時擁有經濟資本及社會象徵資本的實業家或社會意見領袖<sup>101</sup>。亦即，民意代表選舉同時是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流動與競逐，而這個競逐則決定著「台灣人民」或「台灣文化」價值位階。此一價值位階的建立與詮釋在 1946 年為一重要問題，因為對「何為台灣文化」並且「誰有資格定義台灣文化」的再詮釋與價值重建即進一步地引發「誰的文化能力更有資格擔任官方上對下的文化傳介者」的位置爭奪。

### 1.3 語言與文化政策的資本價值更迭

第三個展開 1946 年的時代氛圍軸線則是以國語政策與所屬機關的落實為主。這條線相對於前面所提及外圍團體——即政治體制內部的分化、民意代表選舉——即政治體制外部的競逐，是透過政策進入文化體制與文化資本的分配與競逐。在政權更替之後，語言典範的重建一直與文化資本價值息息相關；透過「中文」典範被確立、並與「民族文化」價值構建在一起後，能否使用中文便成為能否參與「民族文化」價值建構的關鍵。從 1945 年底所創辦的民間刊物如《政經報》與《前鋒》即可明顯看出，這兩個刊物在第一時間以中文發刊，是為了在這個新文化價值建構的過程中佔據重要發言位置。而事實上從後續的報／刊空間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當時第一時間佔據位置發言、積極參與新「民族」文化價值建構的社群，確實在 1946 年後仍然持續活躍。

<sup>101</sup> 以王添灯來說，蘇新在回憶文章中即曾經提及，宋斐如在受官方壓力辭去《人民導報》社長，並與蘇新討論繼任人選時曾經提到：「我辭去社長以後，誰來擔任社長？這個社長必須有錢，有社會地位。」（蘇新，1993：114）

而整個 1946 年，語言政策的落實益發強化了中文典範的確立。1946 年一月魏建功抵台開始籌備國語推行委員會，四月二日成立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而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所實施的具體工作報告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透過設計推行教育方針、編纂教程之外，並同時訓練傳習者：包括全省行政人員、公署員工以及國民學校及中等學校教員作為國語傳習者，以國語推行委員會派員講授或協助訓練。（黃英哲，2007：58）其中，產生全省行政人員的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簡稱省訓團）則作為一個傳習據點。這個國語傳習中介的角色，也使原來只是行政人員訓練之用的省訓團進入了上述文化體系重建工作中，透過接近、擁有中文典範而競逐文化資本的行列，後文提及以省訓團幹部為主的刊物《日月潭》週報將更進一步說明。在此，我們可以先說明的是，國語推行委員會落實語言政策的方式，是透過如行政人員、教師等中介者來讓國語滲透、傳習至民間。也就是說，它是透過將社會階層化，逐層訓練傳習。此一分層化的做法將中文作為文化資本分層分配，建立了持有資本的差別系統，且持有資本的高低與接近政策推行核心位置——亦即政治資本的遠近有關。

而 1946 年四月國語推行委員會建立後，繼之而來的是六月底許壽裳抵台，於八月成立台灣編譯館。此機構與許壽裳在 1946 年台灣文化生產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都與文化資本的重新分配息息相關。

在 1946 年八月十一日省編譯館成立記者會的報導中，說明設立要旨中提及，「台灣之學術文化，已有良好之基礎，可以有為各省模範之資格，而且本省政治環境優良，……（略）過去本省在日本統治下之軍閥侵略主義，當應根絕，可是純粹學術性之研究以不能抹殺其價值，吾等應接收下來，加以發揚光大，若把過去數十年間日本專門學者從事台灣研究之成果加以翻譯與整理，編成一套台灣研究叢書，余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sup>102</sup>」並將此一日治時期台灣學術研究資料整理的工作分配於台灣研究組中，而台灣研究組主任即為楊雲萍。

<sup>102</sup> 〈促進台胞心理建設 示範協進全國文化 省編譯館招待記者會 館長許壽裳報告主要工作〉，《民報》1946 年 8 月 11 日第二版。

編譯館的此一工作目標下，是否使日治時期的文化資本重新獲得價值？也就是說，日治時期接收教育並且投入文化生產——無論是文藝生產或者是學術生產，原來在中文典範確立的條件下漸次貶值，亦即原來以日文進行的文藝生產或是學術生產，在語言秩序重建之後，其所生產物的價值無法以官方語言流通的話，在新政權的文化生產空間中其價值便難以受到承認；而在編譯館的工作目標下，這些文化產物的價值透過語言轉譯確實可能重新成為流通的、具有文化資本價值的文化產物。然而，在這個轉譯的過程中，同時必須注意到文化產物經過編譯並非是無損的完整轉譯，在語言轉換以及價值典範——亦即此一轉譯工作所服務的目的同樣轉換的情況下，無論是在詮釋或者資料編譯、整理、剪裁與輯錄的情況下，都無法使素材完整展現出在日治語境中的價值。只能說在編譯館對日治資料的重視，在目的上確實可能保留了文化產物的部份內涵價值使之並未因政權轉移而完全貶值至一文不值。

另外，編譯館對日治時期留下的研究資料的珍視與投入重新編譯的工作，是官方在廢止日文欄、禁用日語的同時唯一正視日語文化資產的政策作為、而非透過語言禁制與強迫轉換來完全抹滅日治語境中的文化生產。

在政治資本逐漸分化、政治體制分層，以及文化機構透過語言推行政策使得此一時期文化與政治資本皆呈階層化分配，並以編譯機構來重新檢視日治文化資本價值的 1946 年，可以看見在政治機關分工的日趨完整複雜以及政策的落實下，政治與文化群體的分化益發繁複。而接下來的三個小節，將針對不同的分化軸線來進一步論述上述的資本結構如何使整個 1946 年的報／刊空間繼之分化，而分化後萌生的可能性空間又是如何在 1947 年二月前快速地消解落空。

## 第二節、兩種左翼的生產位置與報刊空間

本節將從 1946 年一月一號的第一份創刊的報紙《人民導報》，以及與其在性質上相異但又有著相似功能、五月創刊的《和平日報》為端點拉出軸線。以性質上來說，《人民導報》是民間資本籌集而發刊的報紙，相對來說《和平日報》則是官

方報紙。然而這兩個報紙在卻分別代表著台籍、特別是左翼知識份子、在報刊空間中佔取位置的兩種不同途徑以及空間開創的可能性。

《人民導報》則就並非純粹以台籍知識份子作為組成班底，因為行政長官公署在 1945 年十月廿五日來台後，則包含了政府內的文書官僚、半山份子、以及非官僚的大陸知識份子、甚至是左傾的知識份子都隨之來台，進入了台灣的文化生產場域。也因此，《人民導報》在這樣的場域內部創刊，從組成上就可以看出對這一場域景象的反映：從創辦成員宋斐如、白克、馬銳籌、夏邦俊、鄭明祿、蘇新、謝爽秋（蘇新，1993：63）以及主編副刊的黃榮燦、林金波（木馬）等（橫地剛，2002：77-78）來看，宋斐如即是半山身份的官僚、而白克則是屬於大陸來台接收文書官僚的宣傳委員會專員<sup>103</sup>，馬銳籌、謝爽秋是大陸來台採訪的記者，黃榮燦則是屬於以記者身份來臺、但是從事文化工作的大陸左傾知識份子，而蘇新則是立場左傾的台籍知識份子，另外木馬則是在大陸求學的台灣人（橫地剛，2002：56、60、78、134）。從組成上看來，《人民導報》展現出新政權入駐後、來自大陸的非政權社群與在地社會階層之間交流、接合的介面，並盡可能地展開文化生產／文藝生產可能性的空間。

由於《人民導報》並非是附屬在組織上的報紙，因此似乎並不如整個戰後《民報》與之前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系列跟文協、台灣民眾黨的關係，系統化地構連一個有著連帶關係的組織情況，也沒有「繼承」特定的且甚至經過鬥爭分化過的理念立場。因此在《人民導報》上，較無法切出以此一報紙成員為核心、所剖開的時間縱深；然而它作為長官公署來台以後的第一個民間報紙，其與那個新政權及在地社會橫向構接的網絡中，則容納了不同權力網絡、以及施與在整個社會場域中的新文化價值所帶來新模式的資本位階與邏輯。

對於宋斐如為什麼要創辦《人民導報》、以及《人民導報》創辦的過程如何蒐羅參與的人員、挑選編輯等訊息，在筆者所搜尋的資料中都並未清楚提及。僅能知道宋斐如是台灣台南人，很早就赴北京求學、學成後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李

<sup>103</sup>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職員輯錄》，頁 281。

筱峰，1991：110）他是如何決定、在什麼契機下找到馬銳籌、謝爽秋、白克、蘇新等人共同籌備創辦《人民導報》這組成的過程，以及宋斐如為何身任行政長官公署內教育處副處長、幾乎是署內台灣籍人士所擔任的最高官職，但卻執意創辦一個以「人民」為名的民間報紙，都難以察知，即使是在《人民導報》由宋斐如署名所寫的〈發刊辭〉中也毫無提及。部分論者透過《人民導報》創刊成員的組成：包括謝爽秋為軍統系統的《掃蕩報》派赴台記者、馬銳籌、夏邦俊亦是大陸報業人士，還有白克作為宣傳委員會的專員來看，認為「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人民導報》的進步傾向，並且借重了大陸辦報的經驗。」（吳純嘉，1999：73；徐秀慧，2007：161-162）也就是說，若相對於《民報》代表的台籍知識份子的所累積的文化資本，那麼《人民導報》有則是以大陸報業從員為主幹、訴諸了大陸辦報經驗。

對台灣知識份子來說，辦報是一種組織化的宣傳工具，就如《台灣民報》之於台灣文化協會，文協分裂以後的《台灣新民報》之於台灣民眾黨、而《台灣大眾時報》之於新文協。以《人民導報》來看，〈發刊辭〉即提及，因為台灣文化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所壓抑，

所以今日台灣的文化必須側重於啟蒙、發揚與溝通。有鑑於此、爰特創刊本報、用以啟發過去的閉塞、發揚固有的祖國文化、溝通國內外的消息輿論書、宣揚政府法令、報導民間隱情、以其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本報願為台灣文化的「掃雷艇」新文化的「播種機」、使台灣文化走入合理的正軌<sup>104</sup>。

如果用「做為台灣文化的掃雷艇」這樣的比喻來看的話，《人民導報》在初創刊這個時候對官方、民族文化、「台灣文化」所抱持的看法，其實相當接近行政長官公署所設下的政宣目標；而在發刊辭中也明白附和官方意識型態「以三民主義」作為建設台灣主要主張的宣稱。徐秀慧在分析戰後初期這段時間的思潮時，提到「三民主義」在這一個特殊的過渡期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妙，它既是被國民政府／行政長官公署的官方政策、甚或是信仰，但是也同樣在左傾知識份子之中發揮作用；她認為一方面台灣的左翼人士是把三民主義視作「革命的主義」、並且特別針對「民

<sup>104</sup> 〈發刊辭〉，《人民導報》，1946年1月1日，頭版。

生主義」一項將之詮釋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其意就是孫文主義的終極目標是社會革命。」但另一方面，當台灣知識份子挪用三民主義的時候，其實也有與官方一起「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樣相同的共識。這使得「光復之初，『三民主義』的政治理念的確凝聚了文化人對『祖國』的向心力」，但是卻同時也成為左翼文化人檢驗政府施政準則的雙向功能。（徐秀慧，2007：196-198）

因此，在這裡《人民導報》所認定的「三民主義」究竟是在哪個層次上的三民主義，在這個創刊辭裡還沒有辦法確認；但是「用以啓發過去的閉塞、發揚固有的祖國文化」以及「宣揚政府法令」等這些目標，都顯示此報對國民政府以及來台施政的特別機關行政長官公署在態度上相對友善。並且，作為「台灣文化的掃雷艇與新文化的播種機」這樣的角色認定，也可以看出《人民導報》是作為一個「較非僅以台灣本地文化為主體」、而是以文化指導者的角度進入台灣的報／刊場域。

蘇新自己在自傳文章中也曾經提到進入《人民導報》以後的轉變部分：

到《人民導報》以後，我的思想就開始轉變，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參加《人民導報》的這些人，大多比較進步，由他們那裡聽了不少關於大陸上的情況，特別是「國共合作」的性質與內容。同時國民黨的真面目已逐漸暴露，增加了對國民黨的認識。第二，看到一些進步報刊，如《民主》、《周報》、《文萃》、《新華日報》等，從這些報刊中得到了不少新知識。（蘇新，1993：63）

從這段說法也可以看得出來，《人民導報》以《人民》為名，但是所站的主體位置並不完全是以「台灣」人民，而是一種泛意的群眾之意<sup>105</sup>——從與宋斐如的發刊辭同置於創刊號頭版、且版面還更大於發刊辭的，時任台北市教育局長姜琦〈三民主義上人民之意義〉一文便可以發現，姜琦所詮釋的《人民導報》之「人民」二字，即是在三民主義意義上的「人民」，即：

在民族主義上並不是狹義的「國民」或「民族」(Nation)、乃是廣義的「民族」(People)的意思。復次、它在民權主義上、也非間接的「公民」(Citizen)的意思。乃是直接的「公民」(People)的意思、最後它在民生主義上、是沒有階級性的「民眾」(Mass)——勞動階級——的意思、乃是無階級性的「群眾」(People)——全民——的意思。<sup>106</sup>

由此可以稍稍看出《人民導報》作為一個民間的報紙、它所持立的位置傾向是以包裹著「群眾」意義的「人民」作為其主體、並且，將「宣揚政府法令」放在創刊辭中的作法，也說明了在組成成分上包含著政府官員的《人民導報》，確實在一開始對官方的態度並非全然敵對，甚至是帶有輔助性的結盟關係，這點與 1945 年由台籍左翼人士創辦的報刊在特性上相近；也因如此，在前一章所述及的在組成上含有政治資本、同時也受政治資本所圈圍的情況也可以在《人民導報》中看見。

根據蘇新〈王添燈先生事略〉一文，提到 1946 年省黨部宣傳處處長林紫貴打算因對「東北問題」的報導向南京政府控告《人民導報》的過程，清楚地展現了宋斐如作為《人民導報》社長並身兼教育處副處長的官職，連帶地帶來官方介入干涉的壓力。

在蘇新的描述中，特別有兩處使人在意：一是省黨部對《人民導報》的不滿，在蘇新的描述裡，是透過丘念台的秘書到《人民導報》編輯部告知了編輯蘇新、並且請他「立刻轉告宋斐如」。告知的內容是，林紫貴打算向南京控告《人民導報》自創刊來的言論，特別是東北問題的立場，「說《人民導報》裡面肯定有共黨份子」。而丘念台則在其中扮演斡旋的角色，一方面安撫省黨部言論，認為「如果過早地刺激台灣人民和輿論，對今後的工作不利」；另一方面則趕緊通報宋斐如「主動找李翼中和林紫貴談談，必要時也可以做些妥協。」(蘇新，1993：113) 另一處則是宋斐如與林紫貴、李翼中吃過飯後，妥協答應改組《人民導報》、辭去社長

<sup>105</sup> 《人民導報》這個「非僅以台灣為主體、而是以群眾」的位置，將在下一小節中更進一步地討論此一傾向對社論的主導。

<sup>106</sup> 姜琦，〈三民主義上人民之意義〉，《人民導報》1946年1月1日，頭版。

職務之後，問蘇新：「我辭去社長以後，請誰來擔任社長？這個社長必須有錢，有社會地位。」而蘇新回答，

倒有一個比較適合的人，但不知道他肯不肯？王添灯，茶葉公會會長，參議員，《自由報》社長，是一個「自由人」，當局卡不了他。（蘇新，1993：115）

另外在吳克泰的回憶錄中也有相似的段落：

宋斐如還因刊登息峰多年的老人（暗示張學良）已到了灣的消息，而挨上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責罵，柯還為此召開記者會大發雷霆，說這是軍事機密，不能報導。其實上海的報紙早已刊登了，但柯遠芬揪住不放，要宋斐如派人到警備司令部找第二處（特務處）處長林秀鸞做解釋，宋斐如要呂赫若去解釋這是外面來稿，社長考慮再三才登的。呂君感到不便不願意去。宋轉而問我。我看社長十分為難，也就答應去了。解釋以後對方說「以後注意」就了事。很明顯，這是軍統對宋斐如施壓<sup>107</sup>。（吳克泰，2002：174）

在這兩處的描述中，其實描繪的是在權力場域內部的角力。省黨部作為政治力介入《人民導報》的報導主題與風格，面對這個壓迫力，蘇新認為王添灯較宋斐如有利的是作為「一個自由人，當局卡不了他。」在這裡蘇新所說的自由人的意義應當是指王添灯除擔任民意代表之外、並無身任官職，因此當局「管不了他」，無法像對宋斐如提出「是當教育處副處長、還是當社長，兩者選其一，不得兼之」的要求。而之所以丘念台在省黨部之中得以斡旋，一方面因為他作為省黨部委員之職得

<sup>107</sup> 不過在這段描述中，在時間點上與蘇新的描述，以及實際在《人民導報》上刊登的宋斐如從社長職辭職下來的時間上有點接不上。蘇新所描述的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與宋斐如在《人民導報》上刊登辭職啟事的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勉強兜得上，大約是在夏初之時。而總編輯白克爾後也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的《人民導報》上面刊登辭職啟事。但是吳克泰在這裡描述的宋斐如事件則似乎在一九四六年「秋間」，若是一九四六年秋間的話，宋斐如應該已經辭退社長職，不應該還是吳克泰在描述中所稱的「社長」。由於目前各圖書館所館藏的《人民導報》僅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未至吳克泰所描述的「秋間」，因此無法比對吳在描述中所提及之報導加以查證。

以參與會議，另一方面或許也與他親近李翼中所屬 CC 派（陳翠蓮，1995：247）不無關係。而除了前述蘇新所描繪的來自省黨部以李翼中為主的 CC 派的干涉之外，吳克泰所描述的柯遠芬一事則是來自軍統系統的警備司令部的干涉。《人民導報》在整個「報／刊」空間中，雖然是以「民間資本」為基礎的姿態創辦，但是其位置卻無法不加以考慮當時各黨、政派系的權力介入。

從《人民導報》來看，它代表的是 1945 年官方與台籍左翼知識份子結盟的延續結構，在組成上加入了大陸左翼知識份子的文化與辦報經驗。而可以發現的是，無論是與台灣在地的左翼知識份子的結盟或是加入了大陸左翼知識份子的組成，對其《人民導報》在場域位置內的政治資本軌跡影響並不大；它的軌跡接近 1945 年創辦的《政經報》，一開始的時候與官方親近結盟，但空間逐漸受到壓縮；不過在《人民導報》時間延續上較為穩定，直至 1947 年二月發生二二八事件後才停刊。然而就文化資本方面，加入了大陸文人的《人民導報》則帶入了大陸文化人的文藝創作，使其在文藝表現上相對於其他相似位置的報／刊要更為豐富<sup>108</sup>。在木馬與黃榮燦共同編輯的前十期南虹，因為木馬與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之間的密切關係，因此多表達回歸祖國歡欣的文章；在木馬離開的「南虹」，則以大陸作家創作為主，「表現台灣的東西變得已經極少了」（橫地剛，2003：79）。不過在黃榮燦主編下的「南虹」卻與大陸報刊的文藝生產訊息相通，不僅整理大陸方面重要的文化訊息，也轉載重慶、上海報刊的文藝與文化評論文章。

亦即，在政治位置上《人民導報》並未脫離統治政權確立後對報／刊的限制與束縛，但是透過大陸文人的餐語，則在文藝表現上則開創出一條與大陸搭接的橋樑，為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場域展開一方新空間。

略晚於《人民導報》發行的《和平日報》在性質上非常特殊，它實際是軍方機關報《掃蕩報》所改組；《和平日報》的總社在南京（王思翔、周夢江，1995：15），台灣版則是由中央軍校畢業、時任台中駐軍第七十師「掃蕩簡報班」負責人

<sup>108</sup> 橫地剛描述黃榮燦與「南虹」的文藝表現，提到雖然「南虹」篇幅只有半版大小，但卻是幾乎沒有中斷過的重要欄目。（橫地剛，2002：77-78）

李上根（王思翔、周夢江，1995：59），協同原先分別在杭州《東南日報》任職的記者王思翔、與剛從福建報社辭職的周夢江所籌組創辦。在籌備初期，此三人曾經一起拜訪台中各界知名人士包括「林獻堂、台中市參議會議長黃朝清、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分團主任張信義、實業家張煥珪、作家張文環、莊垂勝、葉榮鐘」等人，也拜訪了當時擔任台中市婦女會會長的謝雪紅（王思翔、周夢江，1995：60）。從這個籌備的過程，即可看出《和平日報》台灣版打從籌組時期，就試圖與台中在地的文化人士取得聯繫，雖然周夢江說這些拜訪「在當時沒有什麼具體成效」，不過從後來的《新知識》、《文化交流》同樣據守台中為根據地來看，這個籌備期的扎根工作確實以台中為據點，起了某種集結凝聚的作用。

細究《和平日報》所欲連結的台中在地文化人，包括了日治時期的作家、三青團的地區負責人、民意代表以及台共成員等多種分佔政治場域不同位置的身份。然而這個複雜的組成，尚且還不及這個報紙雖是以「軍方機關報」為宣稱、但一直沒有從南京總社、國防部或台灣的軍事當局收領到固定資金預算、而是「除了駐台的那個整編師在創辦之初給了它一些資助以外（不久這個師就調走了，棄它而去），它必須憑自己的努力去謀求生存的能力」，這樣一種「軍方機關的非婚生子」（王思翔、周夢江，1995：21）卻同時又領有官價的白報紙（王思翔、周夢江，1995：65）的矛盾身份；以及台共成員楊克煌在進入《和平報社》時所抱持的「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此一目的（楊克煌，2005：256）所造成的整個報紙、報社立場上的複雜，周夢江也提到，「我們和謝雪紅以及楊克煌等逐漸接近後，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她的影響。」（王思翔、周夢江，1995：62）

《和平日報》台灣版從 1946 年五月四日創刊以後，根據周夢江的說法是維持至 1947 年二月底，報社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王思翔、周夢江，1995：124）以內容上來說，王思翔認為「《和平日報》仍然是軍方報紙，他沒有也不可能稍微離開它固有的官方立場」（王思翔、周夢江，1995：22），周夢江則是更清楚地表明這個官方報紙的官方部分：

《和平日報》是軍方報紙，全部電訊來自官方的中央通訊社，大方像是改變不了的；我們只能在社論欄、地方新聞版和日文版做點文章，揭露當地弊政，呼籲減輕民間疾苦等。（王思翔、周夢江，1995：61）

依照楊克煌的回憶錄中所談及較為清楚的報社成員<sup>109</sup>，是以樓憲為總經理兼副刊編輯，而透過楊克煌與謝雪紅所安插進入報社的原農民組成員蔡瑞旺則擔任廣告科科長；報社社長為黃埔系出身的李上根，秘書則是李上根在軍校同學韋佩弦（王思翔、周夢江，1995：14），總編輯一開始則是由周夢江代理（王思翔、周夢江，1995：15）、後為改名陳洗的陳正坤（王思翔、周夢江，1995：22）。王思翔則提到自己一開始進入和平報社即擔任報社主筆、楊克煌也提到在中文編輯的部分是由王思翔寫社論。日文編輯也是由謝雪紅那邊安插的施英梧，編譯則是楊克煌；另外還有一開始擔任中文編輯、後來擔任日文版編輯兼校對，但是僅短暫任職一個禮拜的楊達（王思翔、周夢江，1995：103）。按照這個成員的陣容來看，《和平日報》內部雖然以最初是由黃埔出身的軍統系人士李上根所主導籌組，然而周夢江、王思翔則的左傾色彩與台共成員由謝雪紅介紹安插入社（陳翠蓮，1995：233）

這使得《和平日報》成為非常矛盾的刊物；它既存的官方報紙性質與實際內部左傾成員的思想傾向之間有著微妙的拉鋸張力，而這張力的內部除了官方／左傾的拉鋸之外，也包含了官方內部的派系拉鋸：王思翔便認為「李上根以及後來到台灣參與領導《和平日報》的陳正坤（改名陳洗）、張煦本等人之所以大膽而且熱中於揭露抨擊台灣當局，除了譁眾取寵以擴大報社的動機外，更隱藏了軍方即國民黨內『黃埔系』同陳儀所憑倚的『政學系』之間的派系傾軋。」（王思翔、周夢江，1995：22）

1946年七、八月間樓憲與周夢江分別離開報社（楊克煌，2005：259；王思翔，1995：28-29），1946年八月中旬，僅發行一刊、由王思翔、周夢江與樓憲合

<sup>109</sup> 在楊克煌《我的回憶》中將樓憲皆稱以「樓賓」，應為誤植。楊克煌，《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2005，頁256-257。

編（秦賢次，1998<sup>110</sup>：5）的《新知識》創刊，從組成上幾乎完全地承繼了《和平日報》最初開始的編輯群。從刊物內容來說，作者群也幾乎是《和平日報》的編輯群，包括編輯過日文版的楊逵、楊克煌，以及擔任顧問的謝雪紅。從這個組成上的高度重疊來看，《新知識》是由《和平日報》的編輯成員所另外衍生、發展出來的刊物，試圖擺脫《和平日報》的軍方報身份限制、同時又繼續進行在《和平日報》已經展開的文化、政經評論與交流工作。

不管是《人民導報》或是《和平日報》，其與 1945 年報刊最大的不同在於大陸文化人士的加入，並且這些來自大陸的文化人士多半有點左派傾向，在大陸即以有政治文化活動或者辦報經驗；這使得原來文化場域內部動力更趨複雜，但確實也為台灣的文化生產空間投入不少文化資源，特別是在文藝生產上的空間開拓，戰後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關注極大部分投注在台灣人民權利，新政權下的政治經濟位置以及民族文化重建與認同問題，而大陸文人帶來的純文學、藝術創作則拓展了文化生產的範疇。包括如黃榮燦引介大陸木刻版畫與美術作品，藝評等文藝內容，在 1946 年不只刊載於《人民導報》的「南虹」副刊，同時也在《台灣新生報》、以及後來的半官方社團刊物《台灣文化》中刊登流通。亦即，在 1946 年文藝空間的開展與表現，大陸文人所帶來的文藝資源的加入著實是重要動力。

### 第三節、鬥爭脈絡：官方內部機關刊物的彼此差異化

延續 1945 年進駐台灣的派系鬥爭，在官方內部也逐漸以機關刊物的方式劃分彼此的發言區域。1946 年的官方機關刊物中，「省訓練團」開始成為頻繁出現的單位；而隸屬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執行單位如台灣廣播電台、省圖書館，則是可以歸類為作為文化政策的行動前線單位在這波單位機關刊物中現身。

以文化生產活動的直接執行單位來看，這些單位的機關刊物的一大特點便是無論是以週計或者月計為頻率發刊，其發刊在期數上都相對穩定並且維持時間皆較為持久。如省訓練團所發行《台灣訓練半月刊》雜誌，本研究在搜尋的過程中雖然僅

<sup>110</sup> 秦賢次，〈《新知識》導言〉，收在《新知識》雜誌覆刻版內，台北：傳文文化，1998。

找到第四卷第九期（1947.8.1）、第四卷第十期（1947.8.16）以及第六卷第四期（1948.5.16）共三期，但是以1946年三月創刊至可尋得的最晚期數1948年五月，推估維持了二十七個月，並且橫跨過二二八事件；只是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期數並未尋得，因此無法判定在二二八事件中是否也曾因事件而停刊。另外如同屬省訓練團的刊物《日月譚週報》則在1946年四月一號創刊，以每週發刊的頻率，至1946年八月廿六日最後一期出刊為止，共發行了二十二期，存續為時五個月，雖然在存續時間上不如《台灣訓練半月刊》，但是在發刊的頻率上相對短而穩定。另一個發刊時間存續較長的刊物是台灣廣播電台的《台灣之聲》<sup>111</sup>，自1946年六月一日創刊起以月刊形式發刊，目前最後可尋得的期數為1949年一月號，在維持的時間上超過兩年半。這幾個以官方單位為主要支柱的刊物在期數上所維持的穩定性，以及在發刊過程不產生闕漏或者暫停發刊的情況，同時持續發行超過二十期的刊物，也暗示了其維持生產的資源與人力的相對穩定。

而行政長官公署則以宣傳委員會為核心，繼續維持1945年以來將發辦刊物視為政治宣傳政策一環的做法；一方面從《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等日報來掌握言論的主導權並將其視為政令發佈的宣傳工具，並且也另外以宣傳委員會發行《新台灣畫報》這樣的行政刊物<sup>112</sup>，另一方面也以文化協會及其機關刊物《台灣文化》月刊為另一軸線進行新文化體制的重建（黃英哲，2007：122）。這似乎也可以看見行政長官公署透過報刊所進行的文化統治動向：一方面以主導言論、宣傳政令的目的而使《新生報》、《中華日報》分別成為當時南北最主要的言論／政宣空間，但另一方面也以文化協會作為基地開始進行對知識份子的統合工作。

<sup>111</sup> 本研究所尋得的《台灣之聲》共有十四期。其中發行頁上所印之期數與發行年度混亂且有重複誤植，如一九四八年三月號在發行頁上誤植為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導致於與一九四七年三月號混淆，而出現兩刊皆在發行頁上註明為「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刊。後來筆者比對一九四八年三月號內的〈一月大事日誌〉中，將一月廿一日「全國各地展開立委選舉」事件，比對《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中對立委選舉的段落，為「第一屆立法委員的投票，原經國府明令訂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三日舉行，嗣以各黨提名候選人名單未能如期提出，乃決定延期一個月，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廿一日至廿三日舉行。」比對可知，一月廿一日舉行立委選舉的年度為一九四八年。同時有多本為民國三十七年發刊者，誤植為民國三十六年。本研究以刊物定價上升與大事記比對排列出較為合理的期數與發行年度，詳細勘誤表請見【附錄三】。

<sup>112</sup> 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台灣一年來之宣傳》，台北：行政長官公署，1946，頁23-24。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機關刊物大幅增加的階段裡，可以看見徐秀慧在討論當時行政長官陳儀的文化宣傳政策上的「步調不一、相互分化勢力」（徐秀慧，2007：149）的情況。本段落中將以 1946 年幾個目前可以找到的機關刊物來說明官方內部不同單位對文化傳播角色的競逐。主要分析的刊物包括正氣學社發行的《正氣月刊》、台灣省訓練團的《日月潭》、台灣廣播電台發行的《台灣之聲》、宣傳委員會所發行《台灣月刊》。

前文在提及正氣學社時，曾述及《正氣》月刊與《日月潭》週報之間的譏鬥。主要是在《正氣》半月刊（1946.4 創刊）的第二期即有匿名「遊客」所寫〈日月潭之訴〉<sup>113</sup>諷刺了幾乎同一時期發刊、由省訓團教育長韓逋仙所發行的《日月潭週報》<sup>114</sup>（1946.4 創刊）的內容「俗而不通」，並進一步在〈編後記〉中指明：「本省最近有某機關每月以十萬元鉅款專任職員數人，所辦得一個『俗』而不『通』的小刊物，內容多是東剪西抄，錯誤百出；他們文理都不通順，居然設立『文章病院』…（略）。」、並認為「他們的目的只在報銷這按月領到的台幣十萬元而已」<sup>115</sup>。從《正氣》半月刊對《日月潭》週報的諷刺指責來看，表面上雖然是攻訐其文化水準低落、爭奪的是對於「國語教育」正統／正確的權威，然而實際上卻是不滿其每月得有十萬元的機關編款。對於這個諷刺文，在《日月潭》週報則並無回應，而在之後的《正氣》半月刊中也沒有再出現。但僅僅如曇花一現的諷刺小詩，卻指出了當時即使是在官方內部、同樣是基於「熱心文化事業」的目的創辦刊物之間其實有著官方資源分配的鬥爭關係。這個鬥爭關係是否與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相互對應，或者是從派系鬥爭的關係之中延展衍生出來？在目前的資料中不得而知。不過可以確知的，在所謂的「官方」內部的不均質性，在彼此競逐的過程中仍然也會開展其生產空間。

<sup>113</sup> 《正氣》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46 年 4 月 16，台北：正氣出版社，頁 23-24。

<sup>114</sup> 這首諷刺詩，以日月潭作為第一人稱，寫道：「現在我被人偷去當作招牌／偷去作為騙人的幌子！／我本來風雅，他卻說我『通俗』／他自己『俗』而『不通』，硬要把我害死。」以及「他的文字不通，卻擅設『文章病院』，他膽大臉厚地說『的』字是『動詞』！」從這內容比對來看，說的即是與「日月潭」同名之刊物《日月潭週報》，且內容確實含有「文章病院」一欄。

<sup>115</sup> 《正氣》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46 年 4 月 16，台北：正氣出版社，頁 24。

原本在《正氣》學社與省訓團成員之間就有極高的重疊性；環繞在正氣半月刊、月刊中的正氣學社社員中不乏有省訓練團主任秘書、科長、講師<sup>116</sup>等人列席其中。把第一卷第二期即發文暗諷省訓團刊物《日月譚》一事，與正氣學社中的省訓團幹部成員之事並合起來看所能得到的推論，是省訓團的內部成員在派系立場上並不一致，甚至存在著檯面下的鬥爭暗湧。

以 1945 年出版《台灣省訓練團團刊》第一卷第一期中的任職人員表<sup>117</sup>來看，由行政長官陳儀兼任團主任的省訓練團中的主導者為身任教育長的韓逋仙。而上述參與正氣學社的省訓團成員包括林舒謙與何奮，都在省訓團中位居要職：林舒謙是自台灣省訓練團成立以來就擔任秘書要職，爾後又兼代秘書主任一職；而何奮則是擔任教育處註冊科科長，之後兼代教務處處長。其餘參與在正氣學社中的省訓團成員還包括在 1946 年一月開始於省訓團擔任講師的葉新華、寇世遠、曾紀焜等人<sup>118</sup>；同則人事動態中，甚至連《正氣》半月刊的主編曾今可都於省訓團中擔任教師一職。從同期另篇〈本團大事日記〉<sup>119</sup>中所提，「教育長韓逋仙率本團教職員林舒謙、黃毓華、李瀾平、陳炯煊、何奮、趙彥鵬……（中略）等一行十三人搭乘美艦離榕來台。」這則記事來看，何奮與林舒謙是屬於省訓團教育長韓逋仙所率來台第一批官員，同時也是屬於陳儀治閩班底。從兩團體之間重疊成員來觀察省訓練團與正氣學社之間的關係，似乎展現了黨國官僚內部權力鬥爭的複雜與矛盾之處。既然《正氣》半月刊為文對《日月譚》週報進行激烈的譏諷，表現出敵對的姿態，但兩個刊物所屬社團之間卻有重要成員重疊，此一情況比對其對立的關係，又該進行解讀？

以《日月譚》週報來看，其發行人即為省訓團教育長韓逋仙，省訓團的團刊中也提及《日月譚》週報是除團刊外，「為運用通俗文字圖表、宣揚主義國策、介紹國內各地風光習慣、解釋台灣當前問題、並供給本團在訓及畢業學員課餘或公餘進

<sup>116</sup> 除主任秘書林舒謙外，尚有省訓團科長何奮；講師葉新華、寇世遠、曾繼焜等。

<sup>117</sup> 〈卅四年十一、十二兩月份任職人員一覽表〉，《台灣省訓練團團刊》，第一卷第一期，1945.3.1，台北：省訓練團，頁 15。

<sup>118</sup> 〈人事動態〉，《台灣省訓練團團刊》第一卷第二期，台北：省訓練團，頁 28。

<sup>119</sup> 《台灣省訓練團團刊》，第一卷第一期，1945.3.1，台北：省訓練團，頁 12。

修資料起見」<sup>120</sup>而發行；而其組織成員則由前述省訓練團教育長韓晡先兼任社長、周玉津任副社長與總編輯，由陳火甲、柯落葉、寇世遠、朱鳴岡分任編輯職務<sup>121</sup>。

在內容上《日月潭》週報從主旨到文章內容確實都力求通俗，其主因是其自身定位是「集中文化的力量、加強通俗文章的寫作、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做有計畫的講解」<sup>122</sup>以作為國語教材的補充；並且在第三期的編者刊前語中也提及「願它變成一種活的教科書、我們盡量地提供各級學校所需的教材、以作一般青年學生的讀物。」<sup>123</sup>這樣的主張。因此，在內容上儘管用字淺白、並且在討論米價<sup>124</sup>、物價<sup>125</sup>這類涉及經濟、政策等抽象概念時，也會以日常聊天的情境文章來達到通俗、淺白的目的；而每期的「時事談座」一欄也並非以新聞寫作的來報導國際時事的進展，而是以講解的方式討論當時的東北問題、伊朗問題、日本等各國二戰後的國際情勢。

另一方面，「介紹重於創作」、「大量地介紹祖國的歷史遺產，民族奮鬥的經歷，以及今後建國的方策」<sup>126</sup>則勾勒出了《日月潭》週報的內容取向大致是以史地的介紹與講解為主，僅有少部份文藝作品。因此除了前述持續存在的時事講解專欄、三民主義通俗講解的專欄外，《日月潭》的內容也包含了歷史人物介紹<sup>127</sup>、歷史故事<sup>128</sup>等等這類「祖國的歷史遺產」、介紹黨國重要人物事蹟<sup>129</sup>的「民族奮鬥經

<sup>120</sup> 《台灣省訓練團團刊》，第一卷第二期，1946.3.16，台北：省訓練團，頁 26-27。

<sup>121</sup> 《台灣省訓練團團刊》，第一卷第四／五期，1946.5.1，台北：省訓練團，頁 79。

<sup>122</sup> 《日月潭》週報，第一期，1946.4.1，台北：日月潭週報社，頁 2。

<sup>123</sup> 《日月潭》週報，第三期，1946.4.15，台北：日月潭週報社，頁 2。

<sup>124</sup> 《日月潭》週報，第一期，1946.4.1，台北：日月潭週報社，頁 10-11。

<sup>125</sup> 《日月潭》週報，第二期，1946.4.8，台北：日月潭週報社，頁 7-8。

<sup>126</sup> 《日月潭》週報，第十一期，1946.6.10，台北：日月潭週報社，頁 2。

<sup>127</sup> 如第六期的〈孔明—大政治家〉、〈岳飛精忠報國〉；第八、九、十一期都出現了討論鄭成功功績與生平軼事的文章；這部份的歷史人物介紹主要是指並非近代、民國初期時的歷史人物，而是更為久遠、足能以史喻事的歷史人物事蹟。

<sup>128</sup> 如第三期的〈唐三藏—西遊記的主角〉一文，第五期亦有〈唐三藏到印度——一篇新的西遊記〉；第十期〈從吃粽子說起〉談了屈原的故事，同期還有〈隋陽帝開運河〉一文；第十一期〈盛唐時代國威的外揚〉、第十三期〈三黃五帝〉等等，都是屬於這類講述中國文化遺緒的歷史故事。

<sup>129</sup> 如第一期介紹蔣介石的〈蔣主席—我們的最高領袖〉以及黃花岡烈士林尹民，第五期有〈常勝將軍湯恩伯〉、第六期有〈陳誠將軍〉一文，第七期講了〈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第八期則是〈烈士徐錫麟〉。第九期有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介紹，第十期的〈蔣主席夫婦的戰時生活〉則更是明顯地在引介領袖的同時頌揚領袖的美德、精神等形象層面的美化。

歷」、以及如物價平抑、米糧政策<sup>130</sup>等「建國方策」。而從一期一篇、兩篇新詩、散文的文藝作品來看，其或示範寫作、或刊登訓練班學員練習作品等，都是以作為國語學習練習園地為其主要目的。簡而言之，《日月譚》週報的主要宗旨是偏向補充教育性質；作為一個文化傳導的角色，並且其面對的讀者是一般群眾而非知識份子。

較為特殊的是，在《日月譚》週報中，有一個每週畫報的固定欄位，從創刊號開始便由朱鳴岡負責，刊登的作品其中也少不了許多文化、政治宣導的畫作或木刻版畫。當時刊物中有這樣固定畫報欄位的，除了朱鳴岡所參與編輯的《日月譚》週報外，還有《新新》；並且《新新》雜誌中還分為「繪」與漫畫同人所繪之「漫畫」兩個欄位。另外還有黃榮燦參與其中的《台灣文化》月刊，然而《台灣文化》月刊所採取的方式並不是設置欄位，而是特別將每期封面繪者在目錄中標示出來；在目錄中雖沒有特定命名為畫報的欄位，但在前幾期皆有署名的插畫。然而《台灣文化》的這個做法僅維持到 1947 年一月期、即第二卷第一期，之後便再也沒有任何封面繪圖或者木刻版畫的插畫出現在《台灣文化》中。此外，由黃榮燦擔任編輯的《人民導報》副刊「南虹」也曾經在第一期（1946.1.1）與第二期<sup>131</sup>（1946.1.4）中。因此，以上述各個刊載繪畫的報／刊來看，只有《日月譚》的畫報欄位與《新新》是與刊物同步開始、並且隨刊物結束而結束；亦即意味著刊物中是特別保留了為美術創作所有的空間，而非全然是由文字創作、評述所壟斷。

《正氣》半月刊／月刊<sup>132</sup>，相對於《日月譚》週報的通俗化，在內容的語言使用就顯得嚴肅，同時在排版上也可以窺見這種差異：《日月譚》所使用的字體較大、字行之間空距也較為寬鬆，且文間不時穿插插圖；反觀《正氣》無論是半月刊

<sup>130</sup> 如第一期談米價問題、第二期談物價飛漲、第四期談外匯問題，第五期再談物價、第六期則討論當前教育問題該擺置什麼樣主題為重心；第七期談論工業生產條件，第八期則是經濟問題，等等。以上幾乎悉數都是以每期〈編者的話〉來表達其言論意見。

<sup>131</sup> 此處所指期數為南虹的期數，而非報紙期數。這是因為《人民導報》每日發刊，但是「南虹」副刊並未每日都有，因此另有計期。

<sup>132</sup> 《正氣》原來是半月刊的形式，自一九四六年四月開始發行，自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開始改為月刊的形式。

或者月刊，都以相對緊密而狹窄的排版方式，使得頁面乘載資訊量較為紮實，文間並無插圖、取而代之的是解釋性的圖表，在閱讀印象上相對顯得嚴謹。

儘管在內容中同樣涵括中國地理、歷史，時局時事評述、國語教學等項目，但《正氣》月刊／半月刊所設定的閱讀對象卻顯然不是如《日月潭》週報、為正在學習但尚很不熟練國語的一般民眾，而是較接近同樣參與在「文化建設」之中、通曉國語達到水準之上的知識份子。《正氣》一刊中即使是以國語教學為目的、在標題名稱上標示了「通俗」二字的「語文通俗講座」<sup>133</sup>，都甚至出現「發音原理」與發音器官喉、口、鼻的示意圖這類並不通俗、甚至接近知識學理層面的內容。在《日月潭》週報上儘管也有「國音講座」的專欄，卻不及《正氣》中那樣充滿語文專業術語如「述語」、「主語」、「實體詞」等辭彙，而僅僅是列出注音符號、供讀者以練習拼音。由此內容的差異也可以明白《正氣》半月刊在第二期時刊登諷刺詩譏諷《日月潭》是「俗而不通」之故。

由於《正氣》所屬的正氣學社是以軍統系統的柯遠芬為主持，而軍統係以軍界人士及黃埔學生為主要組成的派系（陳翠蓮，2000：211），因此整個《正氣》週刊在內容上相較於其他刊物，對軍事、國防相關的內容也稍多<sup>134</sup>，而在1946年十月改為月刊以後，在各期份量上增加不少，同時也增加了一些文藝論述、以及小說、散文、戲劇等文藝作品的數量。這些文藝作品的質量亦不像《日月潭》所刊登的散文小品那樣帶有正在學習國語的作者練習作性質，如主編曾今可自己所創作的短篇小說〈皆大歡喜〉<sup>135</sup>、省訓團講師曾紀焜的散文〈一段回憶和一個故事〉<sup>136</sup>等。

<sup>133</sup> 景白，〈語文通俗講座、第二講：詞類、句法、國音〉，《正氣》半月刊第二期，1946.4.16，台北：正氣出版社，頁19-22。由於並未尋得創刊號，因此未能得知〈語文通俗講座、第一講〉的內容為何。

<sup>134</sup> 不僅在第二期中刊登署名柯遠芬所作的〈台灣軍歌〉、林戈夫所寫〈台灣國防地理與經濟地理的研究〉；第四期中也有柯遠芬的一篇在陸軍幹部訓練班的講詞〈軍人精神教育〉、在「正氣論壇」的專欄中也提到國軍紀律問題，並也有懷寫軍旅生活的〈女兵生活的回憶〉與〈女兵五千里行軍日記〉等。《正氣》半月刊第二期，1946.4.16，台北：正氣出版社，頁2，頁14-15；《正氣》半月刊第四期，1946.6.16，台北：正氣出版社，頁2-5。

<sup>135</sup> 《正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47.1.1，台北：正氣出版社，頁54-57。

<sup>136</sup> 《正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46.10.1，台北：正氣出版社，頁57-60。

前文曾經提到，1946 年四月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並且以省訓團作為行政人員國語傳習的節點基地。在時間點上來看，《正氣》或《日月譚》同樣在四月出刊，在同樣介紹民族文化內容、史地知識、時事引介與國語傳習以及創作刊載的角色上，《正氣》對《日月譚》的攻擊可視為是一種區辨動作，藉由否認或者貶低對方的文化位階來強化自己作為文化傳習者的正統性與價值。

除兩個刊物之外，其餘包括《台灣之聲》、《台灣月刊》等這樣隸屬機關的刊物在 1946 年中，皆有發行時間較長、並目的多在填補當時國民政府與台灣之間的知識鴻溝，一方面多介紹中國史地知識與近代時事以銜接隔閡五十年的台灣，而對台灣的描寫又多以渡台後見聞隨筆為主。從官方機關這些綜合文化雜誌來看，所呈現的觀點多半是渡台文書官僚對大陸政經、史地理解，以及他們本身來台後的親身經歷作為與台灣讀者的溝通橋樑，並且亦有輔助當時語言政策的國語講習、教學等文章。這些機關刊物極力進行知識版圖與語言能力上的填補，但在扮演此一角色時，也免不了彼此競逐「作為官方文化傳導者」這樣的角色。而其中決定性的關鍵除了「誰的文化能力更有資格擔任傳介者」之外，其所屬機關掌握的政治權影響力同樣投入、參與在這個競逐的資本之中。從《正氣》跟《日月譚》的例子來看，很顯然《正氣》在文字上即展現出高姿態，亦即以嚴肅、具學術色彩的文字來強調、展示其文化知識資本較高，而以《日月譚》全然並未迎戰、回應的低調姿態來看，也或許與正氣學社內部所持有的高政治資本有關。

#### 第四節、高度流動的左派場域

相對上一節所描繪發行穩定、在期數上相對維持較長的官方機關單位刊物外，在 1946 年另外尚有少數非官方機關發行的報刊，除自 1945 年十月即發行的《民報》（1945.10.10）在 1946 年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及前述提及的《人民導報》與《和平日報》外，有一系列在傾向上偏左、發刊時間皆相當短暫的刊物。這些刊物包括《台灣評論》（1946.7.1）、《新知識》（1946.8.15）、《自由報》

(1946.10<sup>137</sup>)、《文化交流》(1947.1)以及《中外日報》(1947.2)。除《自由報》與《中外日報》目前完全無法尋得外，其他僅就本研究所能取得覆刻版本或者影本內容加以討論。

這些報／刊的組成特色是，相對而言較不受官方意識、或者官方資本所介入的；這些刊物或許有身負官職的人參與其中，但整個刊物的籌組目的並非是為了服膺政策而創辦，也並未領受政府預算。也就是說，這些位處在「另一側」的刊物中，並非沒有身負官職的成員，但在本節中所衡量評估的是刊物本身內容所展現出來的性質，以及刊物本身的資本組成、宗旨等，以刊物作為單位來討論它們在報／刊文化生產空間中的位置。但這也並不是認定這些身負官職的成員對刊物毫無影響，事實上在富有官銜的成員與刊物傾向之間的衝突、或者此一衝突產生的後果，也正是本節所討論的另一關鍵。

在前述幾個刊物討論中，已經略微耙梳這些刊物的脈絡，包括《政經報》、《人民導報》、《和平日報》中的左翼人士組成與資本來源。本節中將以 1946 年「左派空間」進行耙梳，首先這系列的左派刊物幾乎發刊於 1946 年的後半年，並且時間上極短，在時間上也有接續性。若這個左派空間以《政經報》為起點，則 1945 年十月底發刊的政經報維持到 1946 年的七月，而《台灣評論》就是在 1946 年的七月創刊，發行至 1946 年十月；1946 年十月《自由報》創刊。從這個接續時間上來看，很明顯可以看出《政經報》、《台灣評論》與《自由報》彼此之間的接續關係。

然而在人員的流動上則顯得有些複雜，拿蘇新來說，雖然他參與了《政經報》的創辦，但是在 1945 年十二月下旬便已離開《政經報》、繼而於十二月中旬即已開始參與《人民導報》的創辦（蘇新，1993：63）。蘇新離開以後的《政經報》還繼續維持了七個月、發行六期<sup>138</sup>，何義麟認為，第二卷的一到四期應該是由陳逸松負責編輯，而五、六期則是由蔣時欽接手。而《政經報》第六期於 1946 年七月底

---

<sup>137</sup> 筆者並未尋得《自由報》的副本，因此這邊的發刊日期是參考陳建忠、沈芳序所做之整理。

發刊後即停刊，主編蔣時欽並未直接參與進接續的《台灣評論》，不過參與了接續在《台灣評論》之後的《自由報》創辦<sup>139</sup>。

以蔣時欽的軌跡來看，為什麼他並未參與在《台灣評論》中而是進入了《自由報》，是與《台灣評論》這個刊物在組成成員上與《政經報》、《自由報》之間的差異有關。以下分別將以個別刊物的特殊性進行分析。

#### 4.1 大陸經驗的左翼觀點

《台灣評論》的組成以劉啓光為董事長、社長丘念台、李純青為編輯主任，周天啓為業務主任，發行人是林忠。從這個組成上來看，何義麟認為劉啓光彼時擔任新竹縣長，而《台灣評論》中，「創刊號中的十八則廣告，半數是新竹縣（含今桃園竹苗三縣）機關行號之廣告」；並劉啓光在戰前的農民組合成員身份，因此認為劉啓光在資金籌措與人脈關係上都是處於《台灣評論》這一刊物的重要位置核心。（何義麟，1998：11-12）另外包括同時擔任台灣廣播電台機關刊物《台灣之聲》發行人的林忠、與身任公署顧問<sup>140</sup>的丘念台等人，可以看得出來《台灣評論》這個刊物是確實如何義麟所說，「是一部半山所創辦的刊物」並且「半山人士都有各自的政治觀點與勢力，故並非全體半山皆參與《台灣評論》」（何義麟，1998：11）。

仔細深究《台灣評論》的主要核心人物劉啓光便可發現其這個半山刊物內部的特殊之處。劉啓光是戰前農民組合的中央委員（韓嘉玲<sup>141</sup>，1996：126），在 1929 年的四、五月因二一二事件（謝雪紅，1997：295-301）受到台灣總督府以「違反出版法」起訴，後獲得保釋，當時楊克煌提到當時名為侯朝宗的劉啓光「還不是黨員」。（楊克煌，2005：62）在 1929 年獲得保釋以後潛往大陸，楊克煌提及是「從南部偷渡過去大陸」（楊克煌，2005：62），在韓嘉玲的資料中則提到侯朝宗

<sup>138</sup> 分別是第二卷第一期（1946.1.10）、第二期（1946.1.25）、第三期（1946.2.10）、第四期（1946.3.25）、第五期（1946.5.10）、第六期（1946.7.25）。

<sup>139</sup> 根據吳克泰在〈三位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回憶〉中的說法，收於葉芸芸編，《餘生猶懷一寸心》，台北：印刻，2006，頁 283-299。

<sup>140</sup> 國史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輯錄（一）》，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頁 47。

實際上是偷渡潛往廈門作為左翼學生大本營的集美中學，在那邊接替學生左翼運動的工作。然而九一八事變以後，轉向加入國民政府機構從事宣傳工作。七七事變以後改名為劉啓光<sup>142</sup>，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等黨內組織工作，戰後初期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事，之後擔任過新竹縣長，又曾轉任華南銀行擔任董事長。（陳翠蓮，1995：237；韓嘉玲，1996：128）

在陳翠蓮的對台灣半山份子的派系區分中，《台灣評論》成園中的董事長劉啓光屬於軍統派，而社長丘念台則因身為省黨部委員而被劃歸為 CC 派（陳翠蓮，1995：246-247）；林忠則在 1946 年四月當選為台中縣所屬候補省參議員（李筱峰，1986：26），同年八月當選為國民參政員（李筱峰，1986：30）1946 年底則當選為正式的台中縣所屬國大代表（李筱峰，1996：39）。從這三個成員的身份中，不難發現《台灣評論》所帶的微妙性質：在表面上，它是由與官方關係良好的半山人士所主導的雜誌。然而細究其內涵，卻似乎能夠在這個官方關係網絡邊緣的刊物中耙梳出在這邊緣端與官方之間的縫隙，甚至是對立。

從刊登稿件內容來看，《台灣評論》在創刊詞中便說明其稿件的來由是「一大部分是在上海採集」，其中包括了書籍中的轉載或者文摘<sup>143</sup>。這個轉載或者文摘的作法其實可以說是當時兩岸刊物信息交換的一種供稿方式<sup>144</sup>，在《台灣評論》，目前覆刻的四期中，轉載了一篇上海《大公報》的社論〈評調整匯率案〉<sup>145</sup>，而每期掛名總編輯的李純青所發表的稿件皆在文末署以「寫於上海」，包括〈中國政治與

<sup>141</sup> 韓嘉玲編，《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台北：簡吉陳何文教基金會，1996。

<sup>142</sup> 劉啓光曾經在 1945 年 11 月 8 日的《民報》頭版下方刊登啓事如下：「啓光改名易姓、亡命十餘載、限於才力、未能有所建樹、此次附驥歸來、愧對故鄉父老、是故不敢重提舊事、但圖苟安、不求聞達、對於政團或社團活動、概不參加、恐有誤會、特此聲明。」

<sup>143</sup> 《台灣評論》，創刊號，台北：台灣評論社，頁 1。

<sup>144</sup> 包括上半年出刊、作為「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機關刊物的《新台灣》中，也轉載過上海《大公報》的社評〈認識台灣同胞〉，以及刊載在大公報上的「國內記者之台灣訪問記」，在第二期也有轉載《北平新報》刊登之新聞〈航政局拒絕台灣同胞回籍〉。《新台灣》自創刊號開始即是在北平發行，並在北平發行所地址旁邊附上「本雜誌待交通回復後擬移至台北發行」，直至第四期才標示為於台北發行，因此在發刊、載稿、書寫的態度和立場上都是以「國內」的視野與立場上、將目光投向台灣的角度。在第二期的編輯室話裡面便提到「本期刊載了關於台灣國語普及運動的文稿，希望欲到台灣去的同志諸公注意之」《新台灣》，創刊號，台北：新台灣雜誌社，1946 年 2 月 15 日，頁 10、1；第二期，北平：新台灣社，1946 年 2 月 28 日，頁 5、最末版權頁。

<sup>145</sup> 《台灣評論》，第三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6 年 9 月 1 日，頁 28。

台灣》<sup>146</sup>、〈烤死人的夏天〉<sup>147</sup>、〈給台灣參議員〉<sup>148</sup>、〈客觀的事實〉<sup>149</sup>等每期一文，且皆附上日文譯文；另外包括郭沫若、（第二期頁 4）、汪叔棣（第二期，頁 5-9）也是位在上海的作者，也有如第三期在文末標示著「開封通信」的河南飢荒報導〈飢荒慘重的河南〉<sup>150</sup>等等。李純青也曾在書的自序中提到，在出版《台灣評論》的時候，他人在上海，「盡義務地從上海剪寄大陸進步雜誌的一些論著」，有時「也動筆寫一點短文，介紹大陸情況」（李純青，1993：5）。

何義麟所提到李純青以《大公報》記者名義來台，實則為秘密共產黨員（何義麟，1997：72）的身份有關。以上海左傾人士李純青為掛名總編輯（李純青，1993：11），而以王白淵、蘇新為台灣這邊的執行編輯（蘇新，1993：66），並且同時有著 CC 派省黨部委員丘念台為社長、軍統派半山劉啓光為董事長（陳翠蓮，1995：236-237）以及集資人的雜誌，其組成的複雜性不言而喻。

徐秀慧對左翼勢力在戰後初期的思潮與文化場域中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力進行考察的時候，也認為《台灣評論》在組成的人脈關係上確實比《政經報》要複雜，她認為在《台灣評論》中的半山人士為這份雜誌背書的最重要原因在於一方面可以督促國民黨改革，一方面也藉著雜誌的媒體傳播作用來爭取民意；另外徐秀慧也提到國共內戰影響了這些半山對左翼刊物的支持，也提到李純青在當時是以「記者名義返台，實際從事調查進步力量情形」（徐秀慧，2007：176-177）等情況。然而劉啓光集資的情況，加上雜誌本身文稿傾向來看，《台灣評論》作為向台灣輸送對國民政府、對大陸上其他外於國民黨的勢力的認識意義，或許略過於「半山份子藉著雜誌的媒體傳播來爭取民意」。從內容分佈上來看，覆刻版上所附之作者索引中，共計（加上編輯部）列名三十九位作者、八十二篇文稿，然其中三十九篇都以編輯部名義發出，接近二分之一；並且總發表數次於編輯部者即為李純青，計為四

<sup>146</sup> 《台灣評論》，創刊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6年7月1日，頁4-8。

<sup>147</sup> 《台灣評論》，第二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6年8月1日，頁2-4。

<sup>148</sup> 《台灣評論》，第三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8年9月1日，頁3-5。

<sup>149</sup> 《台灣評論》，第四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8年10月1日，頁3-7。

<sup>150</sup> 《台灣評論》，第三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8年9月1日，頁26-27。

篇；而細看編輯部所發文稿，幾乎悉數都是中國知識份子與政治、政黨相關介紹<sup>151</sup>。

從編輯運作來看，《台灣評論》所採的形式是由李純青在上海集稿、王白淵與他在台灣這邊一起擔任翻譯、編輯的工作。這個合作形式不同於蘇新與王白淵前一次在刊物上合作編輯的《政經報》的模式，以蘇、王兩人為執行編輯的《台灣評論》上並沒有出現任何一篇由蘇新或王白淵所寫的文稿。

以《台灣評論》來看，在創刊詞上宣稱了「以不偏不黨的態度來辦這刊物」、並且「不替黨派或個人宣傳」，並且在組織上是採取「依照公司法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sup>152</sup>。不過進一步仔細閱讀創刊號中李純青與丘念台的文章〈中國政治與台灣〉以及〈對台灣省政治的期望〉兩文，卻可以得到兩種頗有距離的觀點與語氣<sup>153</sup>：從李純青在此文中的態度，對於共產黨軍隊抱持著正面態度；然而同期中的丘念台〈對台灣省政治的期望〉一文<sup>154</sup>，對於國際政治以及國共關係在態度上則並較不同於李純青所抱持的樂觀，視共產黨為「無視國家民族生存」。李純青與丘念台的觀點，清楚地出表達在大陸上海的左傾、以及台灣本地的偏向國民政府的兩種不同觀點；在對共產黨的態度上也極端不同。

也就是說，以《台灣評論》的特殊性質，完全不同於如《政經報》或《人民導報》，台籍知識份子再參與《台灣評論》時，並不以之作爲發言空間。它完全不是一個以本地左翼人士爲主體、或者爲主體之一的刊物。與其將它視爲一個本土與大

<sup>151</sup> 編輯部所發的文稿，其中有七篇爲政治協商會議特輯，十二篇爲人物介紹，分別爲《創刊號》中的邵力子、周恩來、楊光凌、董必武、張厲生、馬歇爾；第二期中的張申府、羅隆基；第四期中的曾琦、吳鐵城、錢永銘、王雲五。兩篇介紹國民參政會的資料，以及一篇刊登憲法草案，即編輯部所發之文稿中，超過半數爲對當時大陸上的政治組織、政治人物的介紹。其中特別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人物介紹的名單中，其所關注的人物包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人員如邵力子、周恩來、董必武、張厲生等，但也同時包括當時任職國民政府中的官員如時任中央黨部秘書的吳鐵城，也包括其他黨派如中國青年黨中的重要人物如楊光凌。另外也有第二期裡關於中國重要政黨介紹的專題（《台灣評論》，第二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6年8月1日，頁19-29），包括石城介紹中國青年黨、伍同伐介紹中國國民黨、馮石竹介紹中國共產黨以及毅生介紹中國民主同盟等。

<sup>152</sup> 《台灣評論》，創刊號，台北：台灣評論社，1946年7月1日，頁40。

<sup>153</sup> 同上，頁4。底線爲筆者所加。

<sup>154</sup> 同上，頁17。底線爲筆者所加。

陸兩邊左翼勢力結合的結果，不如說它其實更是作為一個合作平台，提供了結合的可能。

尤其是在台灣參加過農民組合並潛逃大陸、後隨接收政府返台的劉啓光在創刊號中〈反省！覺悟！！〉一文中，特別針對當時台灣人普遍對接收政府的不信任與不諒解時，提到：

我回故鄉的途中，更坦白地告訴熱烈歡迎我的幾十位嘉義地方的新朋舊友，要他們認識國情，放低期待，以免希望高失望亦大。在過去十八年的亡命生活中，我曾經看過很多事實，即是以前參加過反日運動的朋友們，抱著一股熱烈的希望跑回祖國去，結果因為認識不足，對祖國的現狀發生失望，終至回頭向日入（按：此處應為「人」之誤植）懷抱，充當危害祖國的間諜。認識不足，奢望過高的結果，必定是失望與反動<sup>155</sup>。

由此可知，或許《台灣評論》的目的中，有一部份是試圖從中國的立場介紹與描述中國的經驗，透過大陸左翼文人的文字與台灣左翼知識份子的翻譯來引介這些描述與介紹，以促進理解。特別在左翼的言論與思潮中，較是作為以大陸經驗為中心、向台灣的左翼知識份子進行的傳播，而非是雙方互有供求的相互理解。

從蘇新在回憶錄中對兩個刊物的描述文字，也略可以看出上段所述差別。蘇新對參與《台灣評論》的說法是：

《台灣評論》是中文日文綜合的月刊雜誌。由劉啟光、林忠、丘念台、李純青、周天啟等人創辦。主編是李純青。當時因主編人在上海，在台灣必須有一、兩個執行編輯，李純青推薦王白淵，王白淵再推薦我，結果李純青在上海蒐集材料，我和王白淵在台灣編輯並翻譯日文，對我來說這是業餘性質的工作，每期只拿一、兩千元的津貼。（蘇新，1993：65-66）

但相對的，對創辦《自由報》的態度則積極許多：

---

<sup>155</sup> 同上，頁 19。

雖然退出了《人民導報》，但我的辦報的興趣非常強烈，同時懷著一種報復心理，就是：「好，你把我從《人民導報》趕走，我再來辦一個報給你看看」。因此就勸王添燈出錢，集合八、九個比較進步的記者、編輯，在我家裡開過兩次會議，計畫出版一個小型報紙。（蘇新，1993：66）

對蘇新來說，在報刊的參與上，是從《政經報》、轉向《人民導報》然後接上《自由報》；《台灣評論》則是以非主導的位置、就語言能力上做幫忙。儘管他也提到，在《自由報》上也「沒有出面」，「只在背後寫稿，不拿薪水，只拿稿費。」參與的形式上與《台灣評論》僅拿稿費津貼相似，但是參與的意義上卻不盡然相同。

也因此，在評價《台灣評論》的時候，是否能夠將它完全地排列在《政經報》、《人民導報》、《自由報》的左派刊物的系列裡頭，將之視為一個系列，來討論其言論或者議題轉換的方向，似乎值得再討論。對本研究來說，《台灣評論》讓人更為在意的是上海與台灣兩個地域之間的左傾知識份子言論傾向差異、以及彼此往來的影響，並且這些言論以及資料交流實際地對本地左翼知識份子產生的影響、以及對台灣左翼勢力系譜產生的化學作用，而非將僅僅是這些在立場上左傾的進步刊物全視為脈絡相承的刊物。

在《台灣評論》發行最後一期的同月份，《自由報》創刊。從組成上來看，《自由報》確實承續了《政經報》那種由帶有實業家或者官職身分的台灣本省籍人士出資，而由蘇新、王白淵、蔣瑞仁等在地左傾知識份子進行集稿與編務的模式。不過由於並未有《自由報》的影本可供分析，因此無法透過其內容來檢視或者判斷在《自由報》與《政經報》之間的議題承繼或者言論轉化的情況。

#### 4.2 台籍左翼空間的壓縮與流竄

關於《自由報》的創辦時間有幾種不同說法：陳建忠、沈芳序的年表上標示為1946年十月，李筱峰在《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中〈王添燈〉一文中則提到是1946年八月（李筱峰，1990：63），而在葉芸芸訪問吳克泰、蔡子民（蔡慶榮）

與周青的〈三位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回憶〉中吳克泰則是提到為九月出刊。此份左派刊物的創辦似乎因為一直無法順利進行登記，因此常受到處理 1945 到 1947 年間雜誌刊物之研究的忽略，如莊惠惇在《文化霸權·抗爭論述——戰後初期台灣的雜誌文化分析》中對 1945 年至 1947 年間的雜誌做總目錄整理時，便無提及（莊惠惇，1998，48-52）；在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台灣的知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中所列 1945 至 1949 年間出版的期刊雜誌，依其所能搜得的刊物列表中，亦無《自由報》。（葉芸芸，2006：45-49）。而在何義麟〈《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中則提到，「從 1946 年十月十七日《民報》的報導中，可以確定《自由報》週刊是在十月十五日出刊」，並後來以《青年自由報》更名出版，至二二八停刊為止，共發行了十五期。（何義麟，1998：14）

從接手《政經報》後繼續投入《自由報》的蔣時欽在兩個刊物參與的時間上來看，若按何義麟所說，《政經報》的第二卷五、六期為蔣時欽所編，那麼蔣時欽加入《政經報》編輯的可能時間是 1946 年的四月，而根據吳克泰的說法《自由報》其實在五月已經開始籌辦，並且蔣時欽也是籌辦的成員之一（葉芸芸，2006：287）；這麼一來，蔣時欽投入這個「左派刊物系列」的時間大約是一九四六年的四、五月間。那麼以蔣時欽作為節點，確實可以構連起《政經報》與《自由報》在性質與型態上的延續性。

而從人員的流動上來看，蘇新則是在 1946 年一月進入《人民導報》以後，約是 1946 年夏天<sup>156</sup>因國民黨的干涉而被迫退出（蘇新，1993：245），之後旋即因王白淵的推薦進入了 1946 年七月創辦的《台灣評論》中擔任編輯與翻譯的工作，是「業餘性質的工作，每期只拿一、兩千元的津貼（稿費性質）」（蘇新，1993：66）。《台灣評論》發行了四期，至 1946 年十月一日發行第四期後，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令予以停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33；何義麟，1998：

<sup>156</sup> 在蘇新的回憶錄文章與自傳中都沒有明確地說出究竟是幾月份的時候離開《人民導報》，在〈蘇新自傳〉中寫的是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的時候曾經以《人民導報》總編輯而擔任記者會

10)。而《台灣評論》勒令停刊同月正好也是《自由報》第一期出刊時間<sup>157</sup>。以蘇新自己的流動軌跡來看，他從《政經報》、《人民導報》、《台灣評論》到《自由報》幾乎是輾轉接續，貫穿了整個左派刊物的空間。另外，王白淵參與《政經報》、《台灣評論》與《自由報》，另外還有重疊了《人民導報》與《自由報》的吳克泰，他並同時另外地參加了《中外日報》；而在周夢江的回憶文章中提及了《中外日報》於二二八事件後出刊的臨時版，是由蘇新與周夢江合編（葉芸芸，1995：153）。也就是說，實際上整個左派刊物的空間，幾乎是以前仆後繼的態度不斷地在創辦、停刊繼而創辦。這些左派刊物的存續空間遭受壓縮而使其中成員流竄的現象開始於1946年七月，也就是在時間上進入1946年後半之後，左派言論空間明顯地受到限制。

#### 4.3 《和平日報》路線的延續

王思翔曾自述《新知識》的創辦動機是他與周夢江希望透過將《和平日報》資料室中的大陸報刊選輯公開發行，使這些一般民眾難以獲得的資訊得以流通（王思翔、周夢江，1995：28）；周夢江則提到除了利用《和平日報》的報社內部透過報社人員帶進來的進步雜誌外，其實《新知識》月刊的創辦資金中除了中央書局的負責人張煥珪外（秦賢次，1998：5），還包括了「謝氏（謝雪紅）變賣了一副金首飾作為經費」（王思翔、周夢江，1995：123）。

然而《新知識》只發刊一期，以「未獲批准登記」在印刷場即遭查封。當期內容主要以政治經濟評論為主，轉載上海《大公報》、《文匯報》、南京《大剛報》與廣州《人民報》及重慶《時事日報》等報刊，包括了國共和談與美國對華問題<sup>158</sup>、「民主」的討論<sup>159</sup>等；除社論外，也轉載時事諷刺漫畫如來自香港《自由世

---

的理事，參加過一個月一次的理事會共兩次，退出《人民導報》以後也接到撤銷理事職的通知，就與公會沒關係了（蘇新，1993：65）。因此推測應該是在七月以後退出《人民導報》。

<sup>157</sup> 蘇新雖然是《自由報》的推手，不過參與的形式則是同樣是只以寫稿、拿稿費的方式，並未掛任何編務頭銜（蘇新，1993：66）。

<sup>158</sup> 〈馬歇爾失敗了〉，《新知識》第一期，台中：新知識出版社，1946，頁21；〈美國對華政策〉，《新知識》第一期，台中：新知識出版社，1946，頁23。以上兩篇文章皆選自上海《文匯報》社論。另外還有選自南京《大剛報》的〈美國對華政策（二）〉，《新知識》第一期，台中：新知識出版社，1946，頁24。

界》月刊中描繪戰時失業的人大排長龍、而復員計畫卻僅利於少數人的圖畫<sup>160</sup>，以及原刊於上海《中國工人》週刊的〈光復一年圖〉<sup>161</sup>（原題：〈我們已經勝利了嗎〉）中，描繪日治時期由日人掌管的工廠、在光復之後接收納為政府資產，貼上政府封條。這兩個漫畫鮮明地透露出對工人、失業問題的關注，在態度上也明顯地左傾。此外，刊物內部供稿的文章亦是以國共內戰問題、光復後政治官僚問題為主要論題，包括楊達〈爲此一年哭〉<sup>162</sup>中提到的「哭民國不民主」、「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等看法、王思翔（署名張禹）在〈現階段台灣文化的特質〉<sup>163</sup>也有「台灣的『光復』在社會意義上只不過是軍事投機的戰利品而已，至少是——戰利被限於民族革命的範圍內，而在社會革命的意義上是完全失敗了」這樣的批評，抱持國民政府或者行政長官公署對台灣的統治其實並沒有改變台灣社會作為受壓迫、受支配的結構位置的看法。整體地來說，《新知識》對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的政治、經濟問題提出批判，無論在經濟問題或者政治問題上都比較傾向以群眾、人民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立場。

《新知識》受到查封的原因，王思翔認為是「在於我和周夢江年輕幼稚、孟浪魯莽，選和寫的文章中觸犯當局忌恨的東西太多，辦事又不夠縝密」（王思翔、周夢江，1995：29）。半年後，同樣由中央書局的負責人、同時也是霧峰林家的姻親張煥珪出資，創辦了實由王思翔、楊達合編，但由藍更與出面申請登記的《文化交流》，編輯的基地就在藍更與妻子所開設的診所樓上。

在資金與籌組目的上，《文化交流》看起來是延續了《新知識》的未竟事業，但實際就內容來看卻可以發現《文化交流》並非如《新知識》以時論、政經批判作為刊物主題，而是轉向文藝、文學討論與介紹的方向；因此秦賢次也將《文化交流》視為「純文化雜誌」。《文化交流》現存僅有創刊號，即 1947 年一月十五日

<sup>159</sup> 〈民主與民主作風〉，《新知識》第一期，台中：新知識出版社，1946，頁 30。選自廣州《人民報》社論。

<sup>160</sup> 《新知識》第一期，頁 4。

<sup>161</sup> 同上，頁 5-6。

<sup>162</sup> 同上，頁 13。

<sup>163</sup> 同上，頁 2-8。

所發行的首期，不過按照王思翔的說法，其實當時第二期已經編好，但是發行被二二八事件打斷了（王思翔、周夢江，1995：78）。

除了專以藝文、文學為主題外，《文化交流》與《新知識》之間尚有一個顯著的差異，即雖然《新知識》與《文化交流》都是為了促進省內外知識份子彼此的理解，但是《文化交流》並不同於《新知識》大量轉載大陸報刊的社論、文章，而幾乎全數為邀稿；並且若以發文作者來看，除了編輯王思翔與楊逵之外，還因編輯了一個紀念賴和與林幼春的專題<sup>164</sup>、而向賴和參與的舊詩社應社成員邀了十數篇紀念舊詩，包括陳虛谷、楊守愚、葉榮鐘、陳逢源等，都發表了詩作。另外，許壽裳也在這期《文化交流》中提供了一篇寫孫文與章太炎之間相交情誼與開國事業的長文<sup>165</sup>，同時由署名謝燕堂的作者寫了介紹中國現代作家〈茅盾〉一文。從這些內容來看，可以發現在這個刊物上交流的，確實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脈絡：一邊是在日治政權下的舊詩詩社，一邊則是中國現代白話文學。不過除此之外，也有介紹由中華全國木刻協會所編的《抗戰八年木刻選集》的新書評介<sup>166</sup>、台灣民謠的介紹與解說<sup>167</sup>、也刊登了幾幅木刻版畫。整體來說這份《文化交流》除了「紀念台灣新文學二開拓者」的專輯外，其餘稿件在集結上似乎略為雜亂；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以「交流」為名的雜誌，就內容上看起來，刊物內部的文章彼此間其展現的省內外的交流是點對點的、游擊式發出的引介，而非是雙方各自系統性、或體系化地介紹；特別是，即使是以「台灣新文學開拓者」名之的專題，也並非是試圖將「台灣新文學運動」作一概略或整體性的簡介，而是僅就林幼春、賴和的生平作介紹，並刊載熟識的文友對他們的悼念詩文。然而或許也正是這略顯雜蕪的內容，正顯示出「交流」的起點。

《文化交流》最後仍是以夭折作終，跟《新知識》一樣僅流通了一期。不過從《和平日報》、《新知識》到《文化交流》這樣一道軌跡來看，也勾勒出了《政經

<sup>164</sup> 《文化交流》第一期，頁 18-28。

<sup>165</sup> 許壽裳，〈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兩位成功的開國元勳〉，《文化交流》第一期，台中：文化交流服務社，頁 6-16。

<sup>166</sup> 《文化交流》第一期，頁 37-38。

<sup>167</sup> 同上，頁 36。

報》、《自由報》與《台灣評論》所屬的台北文化圈外，另外一個不同地域的文化場域面向。相對地來說，這個以台中為中心的文化知識圈，在資源上顯得較為因乏、但是也因此與在地的知識份子、文藝、政治運動群體以及仕紳、實業家之間形成了更為緊密的連結。在本章前文中曾經提到，徐秀慧認為參與在《台灣新生報》中有一部份的左傾份子，在隸屬官方的《新生報》中仍然頗感侷限，因此後來又另外成立左派刊物（徐秀慧，2007：132-133）；這情況用來描述《和平日報》與《新知識》、《文化交流》之間的關係同樣適用。

在《文化交流》結束之後，周夢江提到了他離開《和平日報》、經由中共黨員陳本江的引介，進入 1947 年二月於台北創刊的《中外日報》任職。（王思翔、周夢江，1995：67-68）本研究並沒有找到《中外日報》的影本或者覆刻本，因此對《中外日報》的內容無從析論，只能根據周夢江所寫記錄《中外日報》文章概略地描述其狀況。這個報紙是由板橋林家的林宗賢出資籌辦，由隸屬政學系、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台灣紙業公司經理的鄭文蔚擔任社長。（王思翔、周夢江，1995：67）根據周夢江所言，

鄭文蔚對報紙的言論、新聞控制很嚴，名義上這是一家民間報紙，但是他對陳儀長官公署的偏袒，比長官公署的機關報（當時的《新生報》）還要厲害。他公開在編輯會議上說，我們要竭力維護長官公署的一切措施，不能效法台灣民間報紙批評政府的作法。（王思翔、周夢江，1995：70）

然而這個報紙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發展，卻是「林宗賢派蘇新接辦、陳本江打電話要我支持蘇新」。在這裡，周夢江所描述的《中外日報》不免顯得有些矛盾：一方面這個民間報紙因為社長之故而明擺偏袒行政長官公署的立場，但是卻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名列行政長官公署黑名單的蘇新來擔任編輯；一方面由中共成員陳本江在暗中掌握操盤編輯的空間，另一方面又維護行政長官公署的政策。由於沒有更多的資料得以參考，因此對於就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所創辦的《中外日報》究竟在 1946 年至 1947 年的報／刊空間中扮演什麼樣的位置，目前尚不能確定。

## 第五節、文化界的收編與整合

1946 年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即是作為戰後文化重建工作與新文化體制建立的重要團體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其所屬刊物《台灣文化》的發行。不同於前述所有報／刊，《台灣文化》在組成上固然是高度親近政治資本，但是其內容卻是以文化生產、甚至是文藝生產作為政治資本投注後再生產的結果。台灣文化協會透過整合收編文化界行動者，凝聚了戰後最豐富的文化生產力。

文化協進會這個機關並非是官方機關，在刊物的任何版權頁、編輯後記或者當時的報導等，都並未提及此會的資金來源是否有來自黨方或行政長官公署內部任何一個機構的預算；在《民報》上頭首次刊登籌組協會的報導時間是 1945 年十一月十六日<sup>168</sup>，即如黃英哲所言「協進會的成立籌備工作早在 1945 年十一月即展開」（黃英哲，2007：119）。儘管台灣文化協進會在 1945 年十一月即展開籌備，但真正成立是 1946 年六月中，所屬機關刊物《台灣文化》雜誌則至 1946 年九月中才發刊。黃英哲從文化協進會成立的理、監事名單與蔣介石在 1944 年成立、為研擬台灣接管、統治計畫的「台灣調查委員會」成員部份重疊、以及在成立宗旨上與〈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上的延續，認為「協進會實際上就是政府——行政長官公署的外圍團體，是國府透過協進會的組織與活動，作為建立戰後台灣新的文化體制工作的一環。」但黃英哲也提到這個組織的特殊之處，也就是在協進會中實際負責、執行的成員，如許乃昌、蘇新、王白淵，以及楊雲萍與陳紹馨等，都是在日治時期即十分活躍的知識份子；因此認為台灣文化協進會收編、統合了戰前左、右派的知識份子以及戰後為行政長官公署進行重建台灣文化體制工作的執行官僚。（黃英哲，2007：126）

從蘇新自傳中所提，卻認為台灣文化協進會是由台灣本地的知識份子所籌組。據自傳中所寫，蘇新在 1946 年五、六月間與許乃昌、楊雲萍、王白淵及陳紹馨「談起組織文化團體的問題。因為台灣當時沒有任何文化團體，許多文化人（例如日據時代的小說家、詩人、畫家、音樂家、戲劇家等）被國民黨所歧視（國民黨的

一些反動報公開罵這些人是「奴化份子」云云），沒有活動陣地，所以就開始醞釀組織文化團體。」並且蘇新提到在這個時候正好被迫退出《人民導報》，於是就進入文化協進會擔任宣傳組主任，負責編輯兩本雜誌，即綜合性文化雜誌《台灣文化》，以及翻譯國內外重要新聞的《內外要聞》以做為給青年學生閱讀的刊物。（蘇新，1993：67）

秦賢次即依據蘇新的這段說法，推測蘇新是由第一卷第一期（1946.9.15）開始主編、直到第一卷第三期（1946.12.1）為止。然而葉芸芸則在〈二·二八前後的蘇新〉一文中則提出不同的時間表，文中提到「蘇新主編的《台灣文化》是由1946年十一月的第二期開始，到1947年二月的第五期。」（葉芸芸，2006：106）在〈蘇新自傳〉中則由編輯按註，提到《台灣文化》1946年九月十五日創刊，初由楊雲萍主編。（蘇新，1993：68）因此《台灣文化》初期由擔任協進會編輯組主任楊雲萍主編頗為合理，而第二期開始由蘇新主編、究竟是至第三期為止或者是至第五期——亦即現有覆刻版的第二卷第二期為止，則很難判斷。從版權頁來看，從第一卷第一期直到第二卷第三期的編輯署名都是以「台灣文化協進會」為主編署名，直到第二卷第四期才開始以楊雲萍署名；並且發行人欄，從第一卷第一期開始以游彌堅為發行人，至第二卷第二期為止、第二卷第三期的發行人掛名許乃昌、至第二卷第四期掛名王白淵，接著由王白淵掛名發行人直至第二卷第七期（1947.10.1）。也就是直到二二八事件後，台籍文化人士都仍在《台灣文化》中執編，作為刊物中重要的核心角色。

往後第二卷第八期開始是孫萬枝為發行人、直到第四卷第一期（1949.3.1）。而第五卷第一期（1949.7.1）開始，則在頁末刊登啓示說明編輯方針的變更，「從前之一般性論文，評論，文藝作品等，不擬刊載」<sup>169</sup>，並且在刊物編輯上也僅在目次頁標明「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台灣·台北」。從第五期開始，過去台灣文化協進會對於台灣文化重建所發出的熱切情緒全然消散，刊物《台灣文化》也完全轉型為學術性、學術格式的刊物。

---

<sup>168</sup> 〈為宣揚本省文化 籌劃組織協進會〉，《民報》1945年11月16日，第二版。

從《台灣文化》的內容上來看，黃英哲製作了內容分類、與文章類別及作者身分兩個表格（黃英哲，2007：136-137），顯示出《台灣文化》不同於其成員所創辦的任何其他期刊的風格：即高度重視文藝傾向。無論是《政經報》、《台灣評論》、或隸屬行政長官公署的《台灣月刊》等，皆要不以時事時論為主，要不以文化認同、民族主義傾向為軸線，剩下的即是一些人文地理的引介交流文章，也就是說，在戰後初期的大部分刊物雖然幾乎都自居為「綜合性文化雜誌」，但真正囊空出來給文藝創作、文藝討論的空間其實是相當有限。然而從黃英哲的表格中顯示，文藝類的文章篇數到第四卷為止，幾乎都佔據當期文章高達八成<sup>170</sup>，因此黃英哲稱《台灣文化》「確實是綜合文化雜誌，但卻是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文化雜誌」（黃英哲，2007：138）。其中，若細辨文藝類的文章，也可以發現除文藝評論、引介之外，文藝創作作品的份量也相對地多，而且並非僅止於協會成員或者邀稿而來的中文創作作品，實際上也有一些在數量上相對少、可是相比於其他報刊則顯得較豐富的翻譯作品，如在第二期魯迅逝世十週年特集中也收錄了美國記者斯萊特萊（Agnes Smedley）追記魯迅的文章<sup>171</sup>、第二卷第二期收錄蘇聯茲克金柯所寫〈莎士比亞在蘇聯〉<sup>172</sup>、第二卷第四期蘇聯 G·維諾古爾的〈論普希金的悲劇「波里斯·戈杜諾夫」〉，第二卷第七期則翻譯了與魯迅認識的日本作者鹿地亘的散文詩〈什麼叫做交易〉<sup>173</sup>，第三卷第三期（三四月合併號）則刊載莪默（Omar Khayyám）的詩作<sup>174</sup>，第三卷第五期則有德國席勒（Frederic Shiller）的詩作〈騎士托根堡〉<sup>175</sup>等。

而黃英哲對文藝類作品作者的分析表格，則顯示在包括文藝評介、新詩／舊詩創作、戲劇、小說、隨筆／散文及歌謠等文類的文藝類文章中，大陸來台文人的發

<sup>169</sup> 《台灣文化》第五卷第一期，1949.7.1，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54。

<sup>170</sup> 如第一卷（共三期）來看，文藝類高達三十四篇、佔總篇數四十篇的百分之八十五；第二卷（九期）則有文藝類文章八十二篇，佔總篇數九十八篇的百分之八十三。第三卷（八期）的文藝類文章八十篇，佔總篇數九十二篇的百分之七十三；第四卷目前覆刻版僅有一期，其中九篇文章悉數全是文藝類。

<sup>171</sup> 《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1946.11.1，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5-9。

<sup>172</sup> 《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二期，1947.2.5，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14。

<sup>173</sup> 《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七期，1947.10.1，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12-13。

<sup>174</sup> 《台灣文化》第三卷第三期，1948.4.1，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17。

<sup>175</sup> 《台灣文化》第三卷第五期，1948.6.1，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22。

表量仍然高出台灣本地作者約有一倍<sup>176</sup>。他認為，這個人數差距反映出了整個戰後台灣文化體制再編所導致的台灣文化場域更變，同時也意味著台灣作家在日治時期累積文化資本，因語言能力之故而遭到貶值。（黃英哲，2007：142-143）然而黃英哲的這個統計是以人數來計算，而並沒有更細緻地計算出台灣作者與大陸來台作者雙方所發表的文章數目的計算。因此，僅能達到的結論是，大陸來台作者在文化場域中活躍的人數較多，但是否意味著發表量較豐、或者其在《台灣文化》中佔據較大言論空間，則需要更進一步的統計。

另一方面，同樣由文化協進會所發行的《內外要聞》，目前本研究僅尋得第二輯。此刊物較像是中日雙語的新聞雜誌，除重要新聞內容輯錄之外，在第二輯中亦有中國劇作家曹禺作品「雷雨」的介紹。本刊主要以中日對照、並附以重要關鍵詞的日譯解釋，以作為原日文讀者的中文學習刊物。

《台灣文化》與台灣文化協進會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確實如黃英哲所說是作為一個政府的外圍團體對台灣進行文化重建、收編的工作，可是在實際的執行層面上，本地知識份子的參與、在「收編」的工作之中又是什麼樣的角色，似乎還必須進一步討論。或許在 1946 年 6 月成立的文化協進會與九月創刊的《台灣文化》，可以被視為是 1945 年接收後至 1946 年包括官方機關、台籍人士、大陸來台文人等三大群體在各種刊物中交流、互動、結盟等網絡交織的結果；所謂的「收編」是一個由上而下透過政治力實踐的行動，但以文化協進會的模式比對 1945 年至 1946 年為止的文化生產空間與政治力之間的緊密關係，可以發現實際上文化協進會不過是一貫以來政治資本主導的文化生產空間中，終於擺脫政治議題或民族認同問題，而開始直接針對文／藝創作評論發展、累積。而 1946 年大陸來台文人的生產活力，直至《台灣文化》中則具體地展開了文藝生產空間。

表面上台灣文化協進會的組成是含納了當時省內外文人菁英，從《台灣文化》的內容上來看也可以發現其所編輯組稿所欲展開的文化空間是極具熱情與野心。從

---

<sup>176</sup> 根據黃英哲表格顯示，在表格中標明為中國人的作者總計為四十七位、而台灣人作者則為二十七位，身分不明者則有十一位，即包含上述所提及的外國作者。

第一卷第一期的編輯所寫〈後記〉所提：「編者的〈台灣新文學回顧〉一文，如附記所說，是六年前寫的舊文...（中略）我們希望這些本省過去的文學上的成果，得重新刊行，得重新介紹於我國的文學界。」<sup>177</sup>來看，在《台灣文化》中活躍的本省知識份子所期待之一，是將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中國自五四、抗戰以來的文學版圖進行接軌，加上對外國作品的引介，事實上似乎也有一些希望向國際文學版圖接軌的意味。因此在《台灣文化》中所開展出來的文化空間，較接近是一個在文化場域內部、為兩個不同來處的大群體進行溝通與交流，其目的讀者是文化同儕，而非一般大眾。也就是說，在《台灣文化》與台灣文化協進會中，其交流的不再只是政經意識型態而是面向文化同儕的文藝生產。這以布迪厄對文化生產場域的理論來說，已經初步建立了文藝生產空間的生產自主性。

《台灣文化》的主編多次因為政治力介入而更迭，然而幾番更迭卻仍然將這個文藝空間維持到 1949 年初<sup>178</sup>，其動力或許並不能僅僅是以「官方收編」來看待。或者說，即使是在上而下的「整編」工作中，其文化人所凝聚的文化生產動力及相互交流而促進的文藝實踐活力仍然不可小覷。不過從二二八事件中，親近政治力的文化協進會內部亦無法避免捲入傷害<sup>179</sup>。可以確定的是，至 1949 年七月的第五卷轉向純學術刊物開始，原來在《台灣文化》中展開的純文藝的生產空間，其活力與可能性至此已經全然消散。

以 1946 年整體來說，無論是官方或者民間，跟隨 1945 年底各社群異質分化的現象展開了場域各脈絡的複雜性。從官方機關的彼此分化、左派社群分別佔據不同政治資源加以挪用而產生空間；到官方透過外圍團體整合收編整個文化生產活力，1946 年在語言政策的落實以及政治資本的再分配條件下，確實演化成比 1945 年底更為複雜、軌跡交織的場域。首先，民意代表選舉對當時在場域舞台上的台籍文化人士來說，投入參與選舉意味的競逐支配或箝制官方政策的能力，以及實踐以人民、群眾為政治主體的政治意識型態。這是因為對台籍知識份子來說，戰後的文化

<sup>177</sup> 《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一期，1946.9.15，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頁 32。

<sup>178</sup> 《台灣文化》第四卷第一期為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爾後第五卷即改版成為純學術刊物。

生產仍然停留在高度政治化的民族文化意識／價值的重建、以及社會重整。而 1946 年大陸來台文人進入文化生產場域後，與在地知識份子交流、磨合才逐漸開展出文藝生產的面向。

十月日文欄的廢止以及 1946 年一月開始落實的國語傳習政策，儘管使日治文化資本貶值，但是卻因其對中文典範的建立作為結構條件而拓展了中文文化生產空間；報／刊在此一年度不同於前一年度是作為社群結盟、發聲的空間，而是直接作為位置競逐甚至鬥爭的工具。簡單地說，從 1945 年至 1946 年底，一直與政治場域高度的報／刊空間一直都沒有離開政治資源，不過政治場域與資源的不穩定也同時給了文化生產更多的可能性空間。而 1946 年中，包括機關刊物、左派刊物，以及文化整編刊物，都是在這樣的空間中累積出文藝生產的空間，只是這段時間非常短暫。



---

<sup>179</sup> 許壽裳在隔年被暗殺、呂赫若在逃亡中喪命；王白淵被捕、蘇新逃亡大陸；中國學者李霽野、雷石榆返回中國，黃榮燦則在 1950 年出被捕、處死。（黃英哲，2007：146）

## 第四章、結論

綜觀 1945 年接收後到 1946 年底為止，整個文化生產場域依附或對應著政治場域的變化而逐漸演化。在其中有幾個大脈絡是本研究中試著將之梳理出來：一為政治場域中的派系鬥爭如何影響文化生產場域的變更？再者為日治時期的政治、文化活動力——包含左翼與右翼的台灣知識份子，其活力延續至戰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對文化生產場域產生什麼樣的作用？第三即是，大陸來台文人之於台灣文化生產場域，對應著官方與台灣在地知識份子，又對文化生產空間起什麼樣的作用？

本研究梳理這三大脈絡，與布迪厄的文化場域基模進行對話，討論各種資本在場域內部的流通與價值增貶，進入拆解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初的報／刊文化空間。本章接下來將先討論布迪厄理論對台灣社會的有限適用，接著回答本研究所耙梳的三大脈絡，回答在第一章提出、同時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提問：在戰後初期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前，政治資本的角力如何作用在文化生產的機構與生產者身上，並且這些文化生產實踐是否抵抗了政治資本施加的支配、而生成具有自主法則的文化生產場域？

### 一、布迪厄對戰後場域的有限適用

本研究原來援引布迪厄論述十九到二十世紀的法國社會及文化生產狀況的場域理論，試圖將社會內部各種不同資本累積空間化，討論文化生產與政治、社會階層所據有的資本類型之間的分化關係，以及文化生產者作為行動者在場域中的位置軌跡與空間拓展。然而相比於布迪厄的討論對象是已經進入工業化生產、擁有量產市場（mass-production market）與限量市場（restricted production）的法國社會，此一社會結構狀態與台灣戰後初期的社會條件截然不同，因此在結構化社會場域的同時則必須調整結構類目。亦即，原來透過是回應量產市場需求或限量市場需求來創造文化產品之美學價值的模式不再適用，

布迪厄認為，正是在大量生產、限量生產兩種生產模式中，「再生產出了有限生產場域的根基。」（Bourdieu, 1993: 121、142）也就是說，一個具有自主法

則的文藝場域，是在有限生產模式下，以其他文化生產者為需求對象，並且由已經掌握文化合法性的權威者來決定場域資源分配的條件下所生產出來，因此有其獨立於權力及經濟主導的法則。因此，在布迪厄的理論中，所謂的自主法則是文化生產者如何在一個競逐合法性的封閉場域中，背對一般市場所認定的成功，也就是「暢銷」的追求，而轉向在文化生產的封閉場域中取得同為生產者的認可。（Bourdieu，1993：115）如此一來，以布迪厄的論述來說，不僅縮限了握有評論價值權力的群體，另一方面則透過這種圈內彼此評價的封閉性，確保了外部因素對文化生產場域介入有限。

以戰後台灣的社會場域來看，因為當時各種資源貧乏的狀況下，在文化市場中並未區分有量產市場與限量市場；因為當時能有購買、閱讀報／刊的社群相對有限，因此所謂的大量閱讀市場並不存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並未產生布迪厄所言的「生產者彼此評價的封閉場域」，仔細檢視戰後的報／刊可以發現，戰後報／刊空間即是一個封閉場域：在這個場域中，生產者同時亦作為消費者與讀者，生產空間與閱讀市場幾近重疊。然而這個封閉場域同時又因社會群體的遷移使得整個社會空間有著流動的動態。也就是說，1945年中至1946年底為止，包括行政長官公署來台、政治群體抵台分據不同支配位置並與在地仕紳、知識份子結盟，到非官方的大陸文人來台等，這些移居入住的社群並未改變整個報／刊生產的封閉性，進駐的社群同樣作為生產者亦是消費者，當時的社會條件致使文化生產場域始終維持在限量生產的處境。

此一限量生產的處境，一方面與戰爭倒置的資源缺乏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作為文化生產者重要生產能力的語言典範轉換後，使得文化生產者在創作上受到圍限有關。一大部分的使用日文的文化生產者在戰後失去生產文化創作、論述的語言能力而被排除在場域之外；並且主導語言典範轉換的政權轉移使得文化生產場域受到政治資本的全然支配。因此，為進入這個限量生產的報／刊空間，分析政治資本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行動者／文化生產者是否從全然受到政治場域支配的空間中透過所持有的資本拓開具有自主法則的生產空間？而其拓展空間的過程又是如何演變？」則成為進入本研究所論述場域的重要命題。

這種受到政治資本的全然支配、尙未出現大眾市場的文化場域，其實在布迪厄的論述中也可以看見，亦即十八世紀沙龍文化的出現，即是在「大眾」尙未出現的社會結構中，無論是生產空間或者消費市場皆僅縮限在具有高度經濟資本或政治資本的上流社會與高文化資本的文化人士之間，當時文化創作者依附貴族而獲得得文化場域中的位置與生產所需的資源。然而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情況又有些不同，因為不斷進駐的新移居者使得整個封閉的場域出現了流動的動力，但是由於人數以及群體類型之故，這些新移居者並沒有開拓大眾市場，因為這些新移居入住台灣的文化人士皆同樣具有文化與政治資本雙重調性的位置。他們進入台灣場域的位階相對地來說無論是在文化資本或者政治資本上都高於台灣的文化生產者。也就是說，這些新移居者本身也帶有支配者的特性。

因此，以戰後初期的台灣來看，政治資本的支配性質與封閉市場中的流動性成爲這個時期文化生產空間中重要的特質，構成了其中特殊的文化資本競逐與政治資本分配的特殊性。而在討論文化生產場域是否背對市場與政治支配、逕自以同爲文化場域內部生產者們作爲對象進行生產與對話，而最終生產出場域內部的自主法則，獲得場域自主性的時候，我們無法援引布迪厄對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大眾市場變化，而必須轉向重新討論戰後初期文化生產場域的結構化法則，討論在這個有限生產的場域中哪些因素對文化生產場域的生存空間有著支配性的宰制力量或者具有開創空間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布迪厄所針對場域結構化的主要關注在於閱讀市場對生產空間的影響以及提供的動力，然而對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來說，更爲重要的是生產者所構成的空間與其中的流動性如何作爲場域的動力。

接下來將針對此一時期政治資本分配與文化資本競逐來歸結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空間的開展。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本研究所歸結的現象中，是透過報／刊空間來開展的戰後初期文化生產空間。以文化生產空間來說，其生產面向涵蓋諸多媒介，除報／刊之外，也包括了書籍出版。不同的生產媒介其自身所處的結構條件彼此並不相同，以書籍出版與報／刊出版來看，兩者作爲媒介的使用目的與社會作用即截然不同，而在資金需求、成本以及人員的結構性流動上儘管亦有相通，但以對

生產空間所產生的效應或許可能有不小的差異。本研究主要論述報／刊呈現的生產面向，來捕捉戰後初期文化生產空間的一個切面。

## 二、政治權力的來源與作用

以行政長官公署作為特別行政機關治理台灣的戰後初期，政治空間與權力的支配來源主要來自橫向移入的新政權體制。不過此一新政權體制在內部系統中並非具有一致性，而是同時將國民政府、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關係含納在其中、一同移植過來，這造成了匯集在台灣社會中的政治資本變得鬆散與膨脹化。鬆散指的是政治資本並未高度集中在治理機關上，而是除治理機關外，亦包含許多非官方機關的政治團體。這一方面是由於國民黨在當時黨國一家的治理形式，造成了黨的政治資本與地方治理機關競逐政治資本與權力位置<sup>180</sup>，甚至彼此競爭發言空間；而膨脹化則是指在政治空間的競逐中，各政治團體透過在地衍生外圍團體、與當地知識份子結盟，並在結盟的過程中使得團體所據的場域位置產生偏移軌跡，團體佔據的腹地膨脹、彼此重疊，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即是一例。

在這樣的場域結構中，政治資本的具體效應變得難以猜測，而位處在持有政治資本的團體中難以等同於握有政治資本，並且派系鬥爭亦使得政治位階不穩定，同樣也使流通在戰後初期台灣場域的政治資本變得不容易辨識。比如說，若以戰後台灣社會場域來看，三民主義青年團應該是最早與在地知識份子結盟，並且分佈最廣泛、含納在地知識份子最多的政治團體。然而這並未代表其所持有的政治資本——即具有較高官銜或者官方支配空間的能力——高於省黨部或者警備總部外圍團體。至少，以國民黨中宣部爭奪《台灣新報》組成中華日報這件事情來看，便可以明白雖然國民黨中宣部在行政長官公署內部並未直接任職或進行政策主導，但是對在地資源的接收與據持能力則未必較為衰弱。

在這樣的政治資本結構下，在地知識份子與之結盟便相對容易地擁有報／刊發聲空間，但是其所結盟的團體所能提供的資本價值與效應則難以判斷。特別是在

---

<sup>180</sup> 如國民黨中央政宣部或是省黨部在當時的地位。

1946 年行政長官公署的治理權威以政策實行建立起來後，相對於其他政治團體則擁有落實政策的較高位階資本，便明顯地壓縮了在地知識份子結盟而來的發聲位置與空間，致使非官方報／刊的成爲快速創辦但存續時間短暫、發聲的核心人員不斷地更換駐紮基地轉換位置與結盟對象。

另一方面，在台籍知識份子的位置上也必須考量到他們自日治時期的政治運動中累積而來的政治資本，包括議會請願運動的右派與群眾運動的左派知識份子，無論是採取溫和路線或者積極的群眾路線，兩者都是在背對當時日本統治政權、持對立態度地累積著政治資本，這類背離日治政權的政治資本無疑在後續新政權眼中具有兌換價值，而這同時也是新政權與在地知識份子結盟的重要節點。不過就戰後政治資本的作用，特別在報／刊空間中，可以發現右派知識份子不如左派知識份子在結盟爭取上的積極態度；《民報》創辦在政治體系橫向移植之前，而之後甚至發行晚刊；就如前所述，它繼承了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所累積的政治資本並在戰後結合其文化資本及語言能力，直接以具有中文能力與新政權對話作爲最重要的能力與發言工具。

簡而言之，以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場域的政治權力來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爲橫向移植來的新政權體制，另一則爲繼承日治時期群眾或民族運動活力而來的政治資本。兩者在這段時間中都積極投入報／刊生產空間中，此一時期，新政權體制的權力透過行政機關與外圍團體產生支配作用，不過對新政權體制以及與其同時來台的政治團體所構築起來的鬆散政治資本結構中，在地知識份子很容易透過結盟取得位置；但也因爲這個過度鬆散而膨脹化的資本結構使得政治資本的價值維持不易。積極與政治團體結盟的左派知識圈便因此而在位置空間上受到壓縮，相對地右派知識份子選擇將政治資本結合文化資本發展而獲得了較爲穩定的空間。

### 三、政治權力與文化場域的自主法則

而此一時期以報／刊空間的文化生產場域，一方面若是由機關發行的報刊，則透過官方機關與政治機關在一起，另一方面則是以報刊中擁有同時身負官職的參與

者與政治權力聯繫，並同時，也是那些參與在文化生產場域內部的知識份子們，在這個時期試圖要突破政治資本位階，透過文化生產將政治權力民主化。而在這樣的連結脈絡下，報／刊作為文化場域與權力場域構連的重要空間。

在這個構連關係中，可以發現在報／刊空間中，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非機關刊物以知識份子擔任第一線編務為主，而持有政治資本或者經濟資本者作為出資方來支援這個生產空間。另一類型則為機關刊物，無論是編務或者出資方都由官方為主，並且在內容編纂上也以各自所屬機關的意識型態宣導為主，在這樣的刊物中編務的人選在內容主導或影響上較小，其所生產的內容在文化生產空間中也高度傾向政治服務而較少文化資本的累積與再生產。因此，在政治權力與文化場域空間之間的構連關係，首先主要以非機關刊物來論述。

以《民報》、《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政經報》、《前鋒》等，到《人民導報》、《台灣文化》等，都是屬於上述前者的類型。在這類型的刊物中，政治資本等同於經濟資本功能，足以提供報／刊空間進行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基本資源，而知識份子則以其在日治時期的日文環境中所累積、或自大陸帶來的文化資本來填補報／刊空間的文化信仰價值。除了提出文化議題外，在這個文化生產的空間中，也產生出一部份文藝生產的空間，包括《人民導報》的副刊「南虹」、《台灣文化》中的文藝作品發表與翻譯文學的引介；《台灣新生報》的「新地」與「橋」副刊等。然而文藝發表的空間相對於文化議題討論顯得非常窄小，多半文化生產空間與權力場域的構連是以文化議題、民族認同為主；而在這樣的構連結構中，知識份子一方面是官方政宣與民間社會接軌的橋接節點，但同時也面對著生產場域不同來源生產者，造成了介於官方與地方民眾之間的知識份子所帶有的雙面性與所形成的封閉場域。

在當時仍甚封閉的文化生產空間中，政治權力的結構影響著文化生產空間的穩固與否；然而對文化生產者來說，不穩固的政治空間意味的並非是文化生產的削弱，而是文化生產位置的流動。從這點上來看，可以說政治權力與文化生產場域之間的結盟關係僅是策略性地；真正在支配著文化生產空間的價值意識仍然是知識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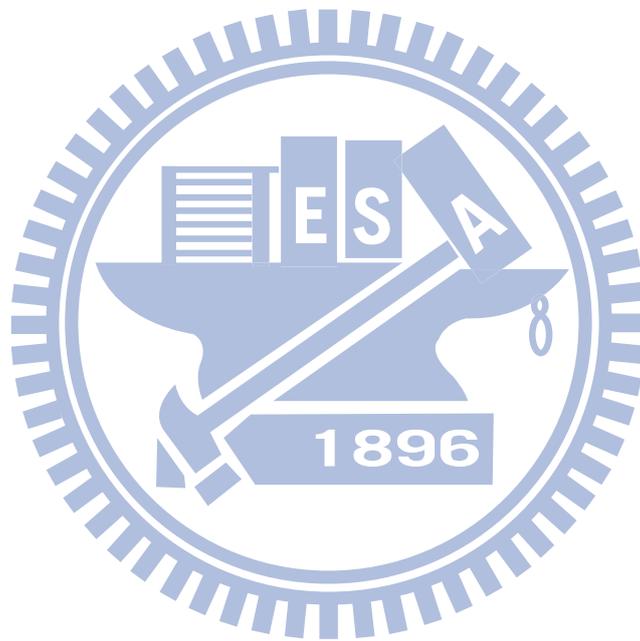
子所支配的文化資本，而非政治資本所賦予的社會場域位置。也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化生產者得以游移各種政治位置中，在不穩固的政權系統裡尋找生產位置。而一旦政治資本不再有效提供或者受到貶值，便重新尋覓生產位置。這樣的結盟與游移實際上也為文化生產在政治資本的支配下拓展出相對具有活力的空間。

也就是說，儘管整個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場域在社會經濟條件貧乏與新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幾乎完全受到政治資本的支配主導，但在政治資本不穩固以至於不斷地再分配，以及文化典範尚未完全建立其自身權威的情況下，一方面在地仕紳透過其自身社會象徵價值進入屬於官僚系統另一面的民意體制之中，以自身的象徵地位及經濟資本來交換政治資本的再生產，與在地知識份子仍然投注在文化生產的路線開始差異化，另一方面大陸文化人開始投入台灣文化生產空間，並與在地知識份子交換彼此文化價值信仰並再生產出新的文化生產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在戰後初期大陸文化人士投入場域以及政治資本鬆散化、膨脹化後，文化生產場域的自主法則開始運作；也就是說，在 1946 年中，因為大陸文化人士的加入與政治資本的鬆散，使得文化生產逐漸傾向同儕交流、面向生產場域而非面向政治場域而生產。在這個時期，或許可以說曾經有一度萌發了戰後初期的文化生產場域自主法則。然而這段時間非常短暫，1947 年初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政治資本結構轉變之後，暫時地消滅了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自主性空間。

### **結論與未來展望：**

戰後初期正在成形、高度依附政治資本的文化生產場域，在論述其中政治資源與文化生產型態時，最難以捕捉的是具體地論述出政治資源的價值與兌換型態；這與此一時期高度流動在場域中人員的證言缺乏以及報／刊素材不足有極大的相關。目前現有研究已經逐漸清楚梳理出政治資源的各種脈絡與流向，以派系鬥爭、民意機關研究來組構當時社會的政治面向；然而在文化生產上則因生產的產品報／刊的殘缺不全與人力上的缺乏而難以概觀全面。本研究試圖以所能循得的資料盡可能梳理其中脈絡，不過在未來仍希望能透過更多出版的自傳、口述歷史紀錄、日記等資訊來更為清楚地架構出當時與個人銜接的社會生產面向。另外，除報／刊空間外，

將戰後初期出版資訊納入研究以擴大文化生產全貌，同樣亦是未來能再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 參考書目

### 英文書目

Bourdieu, Pierre,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e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Johnson, Randal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中文書目

三民主義青年團，1946，《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黨部：出版地不詳。

王思翔、周夢江，1995，《台灣舊事》，葉芸芸編，台北：時報文化。

台北報業工會，1950，《台北報業一覽》，台北：台灣報業公會。

皮耶·布赫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2008，《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王德威編，台北：麥田。

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1946，《台灣一年來之宣傳》，台北：行政長官公署。

李純青，1993，《望鄉》，台北：人間出版。

李筱峰，1986，《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

——，1991，《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社。

——，1996，《林茂生·陳炳與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

吳克泰，2002，《吳克泰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

吳純嘉，1999，《人民導報研究（1946~1947）——兼論其反映出的戰後初期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桃園：中央大學。

吳濁流，1995，《台灣連翹》，台北：草根。

——，1988，《無花果》，台北：前衛。

何義麟，1997，《跨越國境界——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台北：稻鄉。

林春蘭，2002，《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

- 林瑞明，1987，〈台灣文學史年表〉，收錄於《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
- 柳書琴，2001，《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祝萍、陳國祥，1988，《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施懿琳，1999，《吳新榮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徐秀慧，2007，《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出版
- 徐瓊二、蕭友山著，陳平景譯，2002，《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張炎憲，1998，〈《前鋒》雜誌創刊號〉，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四之三：《前鋒》雜誌，台北：傳文文化。
-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 秦賢次，1998，〈《新知識》導言〉，收在《新知識》雜誌覆刻版內，台北：傳文文化。
- 黃英哲，2007，《「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台北：麥田。
- 黃淑英，2003，《民報與戰後初期的台灣》，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惠禎，2004，《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富三、陳俐甫合編，1991，《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林本源文教基金會。
- 許旭輝，2007，《戰後初期臺灣報業之發展—以臺灣新生報為例（1945-1949）》  
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許壽裳，2008，《1940~1948：許壽裳日記》，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陳正茂，2009，《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台北：秀威資訊

- 陳明通，1993，〈派系鬥爭與陳儀治台論〉，《台灣光復初期歷史》，賴澤涵主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
- 陳芳明，1996，《蔣渭川和他的時代》，台北：前衛。
- ，2009，《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
- 陳培豐，2006，《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
- 陳建忠、沈芳序，2003，〈台灣文學雜誌年表初編〉，《文訊》第 213 期，台北：文訊雜誌社。
- 陳建忠，2007，《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
- 陳逸松口述，1994，《陳逸松回憶錄》，林忠勝撰述，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
- 陳翠蓮，1995，《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台北：時報文化。
- 莊惠惇，1997，《文化霸權·抗爭論述——戰後初期台灣的雜誌文化分析》，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克煌，2005，《我的回憶》，楊翠華整理，台北：自費出版。
- 楊肇嘉，2004，《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二版為 1968 年出版、本書為四版。
- 葉芸芸編，1990，《證言 2·28》，台北：人間。
- ，2006，《餘生猶懷一寸心》，台北：印刻。
- 葉芸芸、戴國輝，1993，《愛憎二二八》，台北：遠流。
- 葉榮鐘，2002，《葉榮鐘日記（上）》，台中：晨星。
- 鄭世璠，1995〈滄桑話「新新」：談光復後第一本雜誌的誕生與消失〉，《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二 新新》，台北：傳文。
- 橫地剛，2002，《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
- 謝國興，2008，《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983-1982）》，台北：允晨。
- 謝雪紅，1997，《我的半生記：台淚魂（一）》，楊克煌筆錄，楊翠華整理，台北：自費出版。
- 龍瑛宗，1983，〈崎嶇的文學路——抗戰文壇的回顧〉，《文訊》第七期。

應鳳凰，1985，《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蔣梨雲、蔣節雲、蔣松平編（1996），《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附冊》，台北：前衛。

韓嘉玲編，1996，《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台北：簡吉陳何文教基金會。

蕭富隆等編，2005，《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輯錄(一)》。臺灣省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蘇新，1993，《未歸的台共魂》，台北：時報文化。

陳俊斌，2007，〈雜誌創刊風景—雜誌中的台灣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96年9月號，台北：國家圖書館。

報／刊覆刻出版

台灣總督府編（覆刻出版），1994，《台灣日誌》，台北：南天。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一 台灣文化》，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6，覆刻出版年 1994。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二 新新》，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5，覆刻出版年 1995。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三 創作》，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8，覆刻出版年 1998。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三 文化交流》，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7，覆刻出版年 1998。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四 新知識》，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6，覆刻年 1998。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四 前鋒》，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5，覆刻年 1998。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四 新台灣》，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6，覆刻年 1998。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四 政經報》，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5，覆刻年 1998。

《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系列四 台灣評論》，台北：傳文，原出版年 1946，覆刻年 1998。

#### 網頁資料

吳三連基金會所製作「台灣人物小檔案」網頁

( <http://www.twcenter.org.tw/wu12/02.htm> )

《台灣歷史辭典》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toc.html>

《台灣省政府公報》

<http://gaz.ncl.edu.tw/guide.jsp?jid=79002356>



【附錄一】1945-1948 出版之雜誌報紙整理

已取得	陳建忠版	葉芸芸版	創刊時間
	一陽週報	一陽週報 (出版9期)	1945.9
政經報	政經報	政經報	1945.10.25
前鋒	前鋒	前鋒 (1946.10 創刊)	1945.10.25 光復號 1 刊
《新生報》		《新生報》	1945.10.25
新青年		新青年	1945.10 (半月) 1945.10 1945.11 1945.11.30
新新週刊	新新週刊	新新週刊	1945.11.20 創刊號
新風	新風		1945.11
台灣青年	台灣青年		1945.11.12
		台灣月刊 (王麗明上海創刊)	1945.11
大同			1945.11
現代週刊	現代週刊	現代週刊	1945.12.10 (1:1)
		台灣通訊	1945 年底
《人民導報》 (南虹)		《人民導報》 (南虹) 黃榮燦	1946.1
	新聲 (1945 創刊)	新聲 (1946 創刊)	
道南月刊			1946.1
	台灣畫報		1946.1
新台灣畫報	新台灣畫報		1946.1.31
	中華		1946.1
自強旬刊			1946.2.1
		《中華日報》	1946.2
海疆	海疆		1946.2
新台灣		新台灣	1946.2
台灣訓練半月刊	台灣訓練半月刊		1946.3
正氣半月刊	正氣半月刊		1946.4
日月潭週報	日月潭週報		1946.4
	台灣文藝		1946.5
台灣之聲	台灣之聲	台灣之聲	1946.6
《民報》		《民報》	1946.7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	1946.7
		《自強報》	1946.7 中旬
新知識	新知識		1946.8
圖書月刊	圖書月刊		1946.8
台灣公論		台灣公論	1946.8
	新台灣英文雜誌		1946.8
		台灣英文雜誌	1946.9
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	1946.9
	自由報		1946.10
		《自由日報》	1946.10
正氣月刊		正氣月刊	1946.10
		《和平日報》	1946
		《大明報》	1946
		《國是日報》	1946
台灣學生	台灣學生 (1946.12 創刊)		1946.11
《台灣月刊》	台灣月刊	台灣月刊	1946.10
內外要聞	內外要聞	內外要聞	1946.11
	奮鬥		1947.1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1947.1
台灣雜誌 (1947.1 創刊)	台灣雜誌 (1946.1 創刊)	台灣雜誌 (1947.1 創刊)	1947.1
新聞報導			1947.1
		《中外日報》	1947.2
		台灣學報	1947.2
		經濟觀測	1947.3
建國月刊	建國月刊	建國月刊	1947.10
青雲雜誌			1947.10.15
		《公論報》	1947.10
南方週報	南方週報		1947.12
		《台灣日報》	1947
		《民聲報》	1947
		光復新報	1947
平言週刊			1947.12.11

【附錄二】1945—1948 報／刊的共時空間

	1945			1946												1947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民	10																
政	25									25							
前 181	25																15
生	25																
台灣青年 <sup>182</sup>	12																
大同	12																
新風	15																
新新	20			1	20		30			12			17			5	
新青年 <sup>183</sup>	30																
現代週刊			10												25		
人民導報				1													
新台灣畫報				31													
新台灣				15				1									
中華日報				20													
台灣訓練 <sup>184</sup>																	
海疆																	
正氣(半)月刊													月刊				
日月譚週報							1				26						
和平日報								6									底 185
台灣之聲									1								

<sup>181</sup> 《前鋒》的期數在覆刻版中僅有創刊號，不過根據張炎憲、胡慧玲對採訪整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一書中廖史豪的口述提到，「《前鋒雜誌》第十五期，於二月二十五日，二二八事件之前出版，也是前鋒雜誌在台灣出版的最後一期。」（張炎憲、胡慧玲，2000：29）並在此文後述提到，前鋒雜誌在二二八事件後、約一九四九年左右，「在香港重新登記，採不定期的叢書方式出版。」（張炎憲、胡慧玲，200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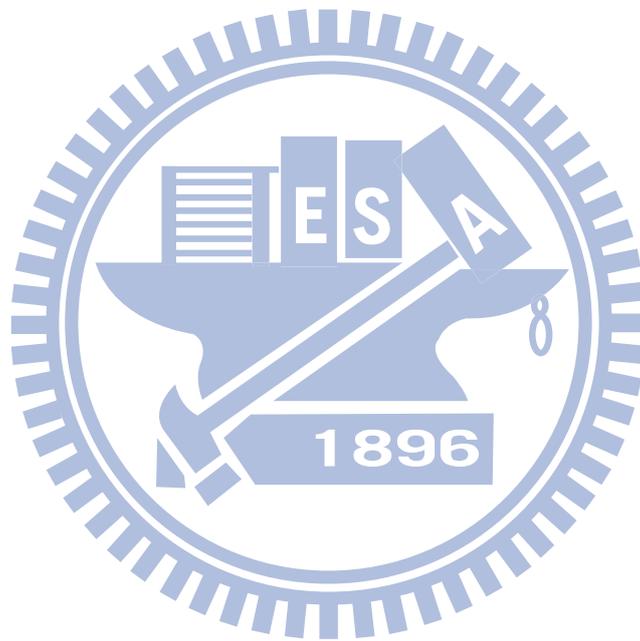
<sup>182</sup> 《台灣青年》以本研究所尋得的期數，為 1945.11.12 發行的第一期、1945.12.1 發行的第二期、1945.12.16 發行的第三期、1946.1.1 發行的第四期、1946.3.20 發行的第七期、以及 1949 年 3 月底（版權頁未標明日期）發行的第 8/9 期合刊。雖無法確認第五期跟第六期的發行日期是落在 1946 年的 1 月底、2 月或者 3 月初，但由於 3 月底持續發行三期（第 7、及 8/9 三期），因此在本表中仍將中間沒有清楚期數與發行日期的 2 月也標上連續有發刊的灰階標示。

<sup>183</sup> 根據筆者手上所找到的《新青年》僅有第四號（1945.11.30）。不過在版權頁上寫著「月二回」，因此以第四回反推回去，或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即出刊。不過因為並不確定因此僅標示十一月份、確認有出刊的月份。

<sup>184</sup> 由於《台灣訓練》從半月刊進展到月刊有其連續性，因此在表格中包含半月刊與月刊兩種。

<sup>185</sup> 根據王思翔、周夢江的說法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因二二八事件而被查封。（王思翔、周夢江，1995：124）

台灣評論									1	1	1	1					
新知識										15							
台灣文化											15						
自由報												15					
台灣月刊																	
台灣學生 <sup>186</sup>														1			
文化交流															15		



<sup>186</sup> 以本研究所掌握的期數，為第一卷第一期（1946.12.1）、第二期（1947.元月）、第三期（1947.7.30）、第九／十期合刊（1947.10.1）、第二卷第六期（1948.4）。但本表格只登錄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因此後面的期數便不錄。

【附錄三】《台灣之聲》民國 37 年後發行期數與標示勘誤

期數（民國）	標示發行日期	目錄 （列前四篇）	推測正確年度	定價
36 年 3 月號	36 年 3 月 1 日	寫在刊前（1） 家庭講座（2） 兒童歌（8） 育兒知識（10）	（無誤）	30 元／本
36 年 9 月號	36 年 9 月 1 日	台南廣播電台前 景（封面） 本台節目表 寫在前面（1） 全民動員剿匪建 國（2）	（無誤） <sup>187</sup>	60 元／本
37 年 2 月號	36 年 2 月 1 日	台北中山橋（封 面） 編者的話（1） 中國文字的構造 （2） 音樂家介紹（3）	37 年 2 月 <sup>188</sup>	120 元／本
37 年 3 月號	36 年 3 月 1 日	台北省政府前主 席銅像（封面） 編者的話（1） 音樂家介紹（2） 三月來了（3）	37 年 3 月 <sup>189</sup>	180 元／本
37 年 4 月號	36 年 4 月 1 日	台灣省政府前景 （封面） 本台節目表 各台呼號周率及 播音時間表 編者的話（1） 怎樣欣賞音樂 （2）	37 年 4 月	180 元／本
37 年 5 月號	36 年 5 月 1 日	日月潭風光（封 面）	37 年 5 月 1 日 <sup>190</sup>	180 元／本

<sup>187</sup> 除按定價來排列之外，本期確定為民國 36 年 9 月號的另一證據是在〈寫在前面〉的刊前語中提及：「本刊從創辦到現在，已足足一年零三個月了」，創刊於民國 35 年 6 月之後推算一年三個月，即是 36 年 9 月無誤。

<sup>188</sup> 推測為民國 37 年而非其標示的 36 年，除按定價推測外，另一證據是在其內刊〈一月大事日誌〉中所標示「立院例會通過結束訓政程序」一事是在民國 36 年 12 月 22 日，而「中華民國憲法開始生效」一項則是在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因此推測本期不可能是民國 36 年 2 月號，而應為 37 年 2 月號。

<sup>189</sup> 另一項證據是，同樣在〈一月大事日誌〉中所提及的一月廿一日「全國各地展開立委選舉」，比對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一書，得知是在 37 年的一月廿一日（李筱峰，1986：41），並且在二月一日「東北剿匪總部成立」同樣是在民國 37 年發生。

		編者的話(1) 古代羅馬的錢幣 (2) 六月雪(3)		
37年6月號	36年6月1日	蔣大總統傳略 首任副總統李公 傳略 總統就任演詞 體育的目的	37年6月 <sup>191</sup>	180元/本
37年7月號	36年7月1日	封面設計 日本歷史的欺騙 性 武家坡 豐年	37年7月 <sup>192</sup>	220元/本
37年10月號	37年10月1 日	從雙十節談到各 國國慶 五四運動對台灣 的影響 文學的要素 四郎探母	(無誤)	320元/本
37年11月號	37年10月25 日	怕怒愛的指導 歷史給釘妥指路 牌 英美的廣播事業 台灣之光復	(無誤)	350元/本
38年1月號	38年1月1日	本台新節目表 什麼是苦悶 閒話過年 音樂講座	(無誤)	1200元/本

<sup>190</sup> 同樣，另一項證據為在〈本省一月大事日誌〉中的四月十日「省參議會考察團飛滬」一事，是在民國37年的四月。參考台灣省諮議會網站大事記。

(<http://www.tpa.gov.tw/big5/Content/Content.asp?cid=71>)

<sup>191</sup> 由本期內容看來，此年度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與副總統就職，因而刊登總統就職演說詞。而首任正副元首就職是在民國37年5月20日。

<sup>192</sup> 本期內刊總統就職演說詞後半部，因而認定為37年發行的7月號之理由同前一期。